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73.3
48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德 国 农 民 战 争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02491

F. Engels
DER DEUTSCHE BAUERKRIEG

本书正文是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所
载译文排印的，原译文是由熊得禄德文本译出，洪耀校订。其余
各篇译文的出处和译者，均在文末注明。

恩 格 斯
德 国 农 民 战 争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 插页 4 · 字数 136,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400 定价（六）0.90元

统一书号 1001·540

目 录

序 言.....	1
德国农民战争	17
一.....	17
二.....	30
三.....	51
四.....	66
五.....	71
六.....	97
七.....	107

附 录

一 恩格斯：馬克	117
二 恩格斯：[論普魯士农民的历史].....	136
三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 (摘录)	148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1856年4月16日)	148
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148
恩格斯給拉薩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51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1882年12月15日).....	154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1882年12月16日).....	155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	158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1895年5月21日)	159
四 恩格斯手稿	161
[論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	161
关于《农民战争》	172
关于德国的札記	173
《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篇手稿(摘录)	180
注 釋	182

插 图

德国农民战争图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图(1525年)

序 言^①

这部著作是我于 1850 年夏天，即当刚刚结束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登载于 1850 年在汉堡由卡·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5 期和第 6 期上。我那些在德国的政治友人请求我把它刊行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可惜它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希图提供出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齐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终究是最好的事实材料汇集。并且，齐美尔曼老人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寄予了很深的感情。驱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都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拥护者讲话的那种革命本能，不久后就使他成了法兰克福那里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落后于时代了。

如果说在齐美尔曼所作的论述中缺乏内在的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视为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始末

① 这篇序言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在 1870 年 2 月为《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1870 年在莱比锡出版）所写的。由于准备第三版的出版，恩格斯又在 1874 年 7 月 1 日写了第二部分作为补充。第三版在 1875 年于莱比锡出版。——编者注

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包含有很多的缺点，那末这一切都是由于这本书出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①。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历史著作中值得嘉奖的一个例外，就当时看来是写得极其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在我的论述中，我企图以只是大致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所有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所采取的立场，这些党派借以企图弄清自己地位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作为从当时各阶级所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后果的战争结局本身；换句话说，我是企图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论等，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海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一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并且他发表于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那些专论 1848—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他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也是以这个历史观为立论基础的。

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间的类似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而外，即除了在前后两种场合都是由同一诸侯军队把各种地方起义相继镇压下去之外，除了当时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都是相同得令人可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

^① 齐美尔曼著的三卷集《伟大农民战争史》第一版是于 1841—1843 年间刊行的。——编者注

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奧地利與普魯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諸侯背后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諸侯背后，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后的是無產階級。”^①

很可惜，我不得不指出，我的這個論點是未免把德國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的確，它無論在奧地利或普魯士都是曾有可能“靠國債迅速控制”君主國的。可是，它無論何時何地都沒利用過這個可能。

由於 1866 年戰爭的結果，資產階級獲得了奧地利作為禮物。但是，它不善于統治，它懦弱無力并庸碌無能。它只會做一件事，即當工人們剛一動作起來，它就施行對他們瘋狂的攻擊。它所以還在掌握政柄，僅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這樣作。

而在普魯士呢？固然，國家債務是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了，財政赤字已成了經常的現象，國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了，資產階級已在議院里占有多數，非經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賦稅，也不能訂借債款，——但是，它對國家的統治何在呢？還在幾個月以前，當國家又面臨財政赤字的窘境時，它的地位是極為有利的。它甚至只要稍加堅持，就能迫使國家作很大的讓步。而它是怎樣做法呢？它認為它所取得的足夠的讓步，是政府允許它獻款約九百萬，並且不只是一年，而是此後永遠每年捐獻。

我並不想來苛責那班在議院中坐着的可憐的民族自由黨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是曾被那些站在他們背后的人們即資產階

^① 見本書第 112 頁。——編者注

級大众拋棄了。这个大众不願进行統治。他們还記得 1848 年的教訓。

至于德国資產階級为什么表現得这样畏首畏尾，我們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論断在其他各方面也完全证实了。我們看見，从 1850 年起，各个小国家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供普魯士和奥地利进行傾軋陰謀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魯士彼此間发生日趋激烈的爭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 1866 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結果是奥地利保留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魯士直接或間接地实行統治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国家暂时还被拒于門外。

在这全部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階級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已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議會。

第二，普魯士以吞并三个天定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現在，甚至民族主义者也不相信普魯士在这个行动之后还保留有仿佛它先前掌握过的完美无缺的天定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只存在有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魯士政府。

第四，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已經應該給自己提出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問題：他們究竟是願意作什么人——是作德国人还是作奥地利人呢？究竟是什么對他們更珍貴些——是德国呢，还是雷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屬小块地区呢？早已就很清楚，他們必須二中取一；但是这点一直是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蒙蔽起来的。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和人民党双方热烈討論对象的其他有关 1866 年的重要爭論問題，那末随后数年的历史已充

分证明了，这两种观点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局限性的两个相反极端而已。

1866年在德国社会关系中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办法——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并且都是局限于官僚所圈定的范围内——也还是没有达到其他西欧国家资产阶级早已具备的成就，并且丝毫也没有触犯到主要的祸害——官僚监护制度。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仅仅那通常的警察实践也已使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等法律成为完全虚幻的东西了。

比1866年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加速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而且二十年来比以前整个一世纪内所带来的成果还要多得多。只有到现在，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意义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高涨的投机事业已充分表现出来，它已把各公爵和伯爵系于它的凯旋车上。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向英国企业请求过援助，现在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则已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为什么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而却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用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隆的时期，正是其他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引进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

級来进行統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 1849 和 1850 年間，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有把自己的政权让給了路易·波拿巴和軍隊后，才能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經无限增长的条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經衰敗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确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与一切其他先前占統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轉折点，經過这个轉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資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益沒有能力进行政治統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增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統治的能力；它在自己周围寻找同盟者，把自己的統治权分給他們，或是斟酌情况，甚至把統治权完全让給他們。

在德国，对资产阶级說来，这个轉折点在 1848 年就已来到了。誠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說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說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 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已很义憤填胸，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鋒芒就被摧折了。德国资产阶级已在找寻同盟者，不計价格多少都要把自己卖給他們，然而一直到今天还是沒有絲毫进展。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具有軍隊和官僚的

王权，这就是大封建贵族，这就是小气的外省容克，这最后就是牧师。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们都締結了合同和協議，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狗命，一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开始觉得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极端拙劣的战略在薩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更为拙劣的（这是多么奇怪）战略时，很难說是誰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薩多瓦同样也被击败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的资产者。

我們的大资产者在 1870 年的行动，与 1525 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人和小店主，他們則將永远是仍旧不变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挤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害怕被推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去。他們彷徨于希望和恐惧之間，在斗争时就会力求救全自己贵重的狗命，而在胜利后就一定会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們的本性。

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是与 1848 年以后的工业高涨并駕齐驅的。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职工会、合作社組織、政治組織和會議中，在选举以及所謂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完全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具有极大的荣誉，因为唯有他們才得以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工人或英国工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未能达到这点。

但是，就連无产阶级也沒越出可与 1525 年相比的那种处境。完全和經常靠工資过活的阶级，还远未占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必須有同盟者，而这种同盟者却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間找到。

关于小資产者，我們已經說過了。他們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在获得胜利时才是例外；这时他們是在啤酒館中高声欢呼，喧嚷不堪的。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动联合工人的很好的分子。

流氓无产階級是各階級墮落分子的糟粕，集中于各大城市，它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班家伙完全是卖身求荣和非常令人討厭的。如果法国工人們在每次革命中都在牆壁上写着 *Mort aux voleurs!* ——杀死盜賊！——并且枪毙了一些，那末这并不是由于他們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們正确地認識到首先必須除去这个匪帮。任何一个工人領袖只要利用流氓无产者作为自己的近卫軍或依靠他們，就已是证明他是运动的叛徒了。

小农——富农属于資产階級——是成分不一致的：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們是还必须为自己的慈悲主人服劳役的。在資产階級已失掉机会把他們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它的职责）时，不难令他們信服他們只有依靠工人階級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我們这里所有的关系大部分是与爱尔兰相同的。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維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在收成不好时，他們因饥寒交迫而濒于死亡，不能交納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地位。資产階級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好事。如果他們不指望工人来拯救，还能指望誰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經營的。他們大多数是抵押負担如此沉重，以致他們所处的依賴高利貸者的地位，就像佃农依賴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一样。而他們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十分菲薄并且由于收成变动而极不稳定的收入。他們絕對不能对資

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剥削他们。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很热爱自己的财产，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也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典押债务变成欠给国家的统一债务，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实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就是农村中人数是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佃户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方案，一定也会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工具和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那首先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富豪的农民和——更富豪的——封建主私有范围中夺出来，而变作农业工人合作社集体耕作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自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国际巴塞尔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公共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首先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规模土地所有制以及与其相联结的在大田地上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是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的。可是，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大会的决议，恰好对于德国是犹如对于英国同样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村雇农，是供给各邦君主军队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靠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派到国会去的阶级。

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們处在同样的生活条件，而且甚至处境比他們更貧困的階級。这个階級因零星分散而軟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貴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竭力使学校腐敗不堪，让它仍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喚起这个階級并吸引它参加运动，这就是德国工人最切近和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村工人大众学会了解自己切身利益时，在德国就会不能有任何反动的——不論是封建的、官僚的或資產階級的——政府存在了。

上面那一段文字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現在还有其意义。在薩多瓦战役及德国分裂后是真实的東西，在塞当战役及普魯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見，所謂高級政策“震撼世界的”演出，是很少能使历史运动方向发生什么变化的。

这个演出只能促进这个运动的过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发动人无意中得到的成果，大概是极不合他們自己的心願的，但不管願意与否，他們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經把旧普魯士根本震动了。在1848年以后，使西部各省騷动的工业成分——無論是資產階級的还是无产階級的——重新遵守旧紀律，已是費了不少力气；这件事終究还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与軍队的利益一起，重又在国家中占了統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成了普魯士的了。姑且不說普魯士的天定王权已因吞并其他三个天定王权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損失，——現在帝国的重心已显著地移到西方去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

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盟間接兼并归附进来。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結果在“新帝国”中，跟1450万旧普魯士人（在易北河东部的六个省份里，那里还包括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魯士容克封建制度的約2500万人。因此，正是普魯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魯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益感到不堪忍受了。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把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間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是由君主国保持了均势的。但是从問題已經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卫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轉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魯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轉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論住宅問題》，第二篇，第26頁及以下）曾研討过。但是在那里我可以不談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轉变是普魯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見，普魯士是多么落后于现代发展的。它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無論如何則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魯士应当决心消灭内部封建制度无数的残余并牺牲容克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Immer langsam voran»^① 韵調下作出的。譬如，臭名昭彰的州区条例就是这样。它廢除个别容克在他領地范

① 意即“永远循序渐进”。——編者注

園內的封建特權，但這不過是為了用全體大土地所有者在整個州區上的特權這一形式來恢復上述特權。事情的性質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語言翻成資產階級的語言而已。舊普魯士容克迫不得已被變為與英國大地主類似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無須乎特別反抗這件事，因為兩者都是同樣愚蠢的。

所以，一個特殊命運降臨到了普魯士頭上，即於本世紀末，以令人欣慰的波拿巴主義形式，完成在1808至1813年開始了的，並在1848年前進了一步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如果一切都很順利，世界將安靜地等待着，我們自己又能長壽的話，那末也許我們到1900年時會親身看到，普魯士政府確實消滅了一切封建機構，因而普魯士終於達到了法國在1792年時期所處的地位。

消滅封建制度，若用肯定的形式來表示，就是確立資產階級制度。隨着貴族特權的廢除，立法也成為資產階級的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資產階級對待政府的態度的基礎。我們已知道，政府是被迫實行這些緩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資產階級面前把每一個這種小讓步都描繪成對它所作的犧牲，描繪成費很大力氣從國王手中爭得的恩惠，而認為資產者自己也應當對政府作某些讓步。於是，資產者對真相雖然十分了然，但卻自甘去受這種欺騙。由此就產生了在柏林不公開地成為國會和普魯士議院各次討論基礎的默契：一方面政府極緩慢地修改法律以利于資產階級，消除各種封建的和由於劃分成小國家而造成的阻撓工業發展的障礙，確立統一的幣制和度量衡，確定營業自由等，准許遷徙自由而使德國的勞動力受資本無限支配，保護貿易和投機事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使政府保留全部實際政權，批准賦稅、公債和征兵制，並協助它這樣來制訂一切新改良法，務使控制那些不稱心人

物的旧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棄自己政治权力的代价，換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驅使资产阶级表示願意接受这种協議的主要动机，不是由于害怕政府，而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們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現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認，它在工业和貿易方面終於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貿易的高漲，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萊茵—威斯特伐里亞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說来簡直是空前的現象，就类似本世紀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那样。在薩克森和上西里西亞、在柏林、汉諾威和沿海各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們終於有了世界貿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現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們这里并发生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据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中斯皮赫棧、馬尔斯拉土尔和塞当等地战役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一貫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經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驗，即波拿巴的战争挑撥及其自然的結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的热忱。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沒使自己誤入迷途。他們沒有表現过絲毫的民族沙文主义。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們保持了冷靜，要求“与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公正和平并且不割取任何領土”，就連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們沉默下来。不論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論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偉大”的論調，在他們中間都找不到反应；他們唯一的目標仍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再沒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如此輝煌地經受住

了这样艰巨的考驗。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审問叛国、侮辱帝王和侮辱官吏等罪，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厉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經常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館編輯員同时关在監獄里；其他报纸也是处于同样的境况中。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說家每年至少有一次必到法庭受审，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沒收、解散會議等接二連三的发生，但一切都无效果。凡有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时，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凡有一个會議被解散时，立刻就有两个新會議召开起来；橫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殘或至少制服工人党，而且只是給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組織。工人不論在他們对政权或对个别資产者作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現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別在他們与所謂“雇主”发生冲突时证明了工人們現在已是有教养的人，而資本家則是愚昧无知的人。并且他們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这种幽默态度就是他們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別現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全欧洲各处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与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較起来，有两大优越处。第一，他們属于欧洲最有理論修养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謂“知識階級”几乎完全丧失掉了的理論思想。如果先前沒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創立起来。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思想，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永远不会像現在这样深入于他們的肺腑。而

这个优越处之无限重大，則有如下两件事實可作证明：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組織，但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因原始式的蒲魯东主义傳播而发生着混乱与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由于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魯东主义傳播而发生着混乱与动摇。

第二个优越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正如德国理論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記它是依靠着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偉大思想家，依靠着这三位虽其学說含有十分虛玄和非常空想性质，但終究是自古迄今最大智士并英明地預示了現在我們用科学方法证明其正确的无数真理的思想家而确立了起来一样，德国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忘記它是依靠着英法两国运动而发展了起来，它能簡單利用英法两国运动用高价换来的經驗，在現時避免当时它們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沒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种偉大推动，那末我們現在便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須承认，德国工人之善于利用自己所处地位的这些优越处，真是罕見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經濟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之强有力而不可战胜，也就是由于这一种可說是配合举行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有这种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英国工人运动有其島国的特点，由于法国工人运动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德国工人現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导地位。事变究竟容許他

們把這種光榮地位占據多久，這是不能預斷的。可是，當他們還占據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大概是能好好執行這個地位所加於他們的種種責任的。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都加倍努力。領袖們特別必須愈加增進他們對於各種理論問題的知識，愈加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慣例詞句的影響，而時刻注意到，自從社會主義成為科學以來，它就要求人們去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瞭的意識，用有加無已的熱忱傳布到工人羣眾中間去，必須日益加緊團結黨組織和職工會組織。雖然社會黨人在一月所爭取來的選民就已是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但是他們還遠不是德國工人階級的多數，而且，在農民中宣傳的成就雖然很令人振奮，但正是在這方面還應作無數事情。因此，不能在鬥爭中懈怠下來，而必須接連不斷地奪取敵人的城市和選區。但是首先必須維護排除產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並歡迎無產階級運動中任何民族的新進展的真正國際主義精神。假使德國工人將來也會照舊前進，那他們雖不能說會在運動頭前行進（要某一個國家中的工人在運動頭前行進，這並不符合運動的利益），但一定會在戰士行列間占著光榮地位，而將來如有意外嚴重患難或偉大事變要求他們顯出更高度的勇氣，更高度的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是定會穩有把握，應付自如的。

1874年7月1日於倫敦

（譯文採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卷，第615—629頁）

德国农民战争¹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傳統。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說不定会創造出多么偉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計劃，常常使他們的后代之为惊惧。

斗争已經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現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偉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頑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們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階級和那些階級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經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見于奥頓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話，那末这无論如何不能說是現代暴动的优点。

我們現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紀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 14 和 15 世紀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較远的市場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織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門；就是比較精細的毛織品和亚麻織品以及絲織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紡織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門也特別兴盛起来了，它們是靠中世紀末期僧侶的和世俗貴族的奢侈生活来維持的，例如金銀工，雕刻，雕花，銅版雕刻，木板雕刻，鍛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輝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①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隨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² 壟断了海上航路 100 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紀的野蛮状态。就是从 15 世紀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經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經過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絲織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紐倫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国矿工在 15 世紀已是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紀的簡陋状态中解脫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輸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較細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漲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漲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

^① 現在已經毫无意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欧洲。（恩格斯在 1875 年版上加的注）

來米^①和英國之後，而在海外貿易中，英國人，尤其是荷蘭人却已經開始排擠德國人。人口依然還很稀少。在德國境內，只是在幾個工商業中心及其附近地區才有文明可言。就是這幾個中心的利益也極為紛歧，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點。南部有另外的貿易聯系和銷售市場，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什麼往來。沒有一個城市像英國的倫敦一樣發展成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以及由奧格斯堡和紐倫堡經過科倫到尼德蘭，經過愛爾福特到北方的幾條通商大道。遠離這些內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較小城市，這些城市與大量的貿易往來無緣，繼續停滯在中世紀末期的生活條件下而與世隔絕，只需要很少的外來商品，也只輸出很少的產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貴族才能與外界接觸，才有新的欲望；農民群眾從來不會超出最鄰近的地方關係以及與此相應的地方眼界的範圍。

當時英法兩國工商業的成長促使整個國家中各種利益聯成一氣，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在德國，這個過程卻只是環繞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區歸併成許多利益集團，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離。緊跟着又因德國被排擠出世界貿易之外，於是這種分崩析狀態很快就鞏固下來了。隨着純粹封建帝國的解体，統一的紐帶斷了，大采邑領主們幾乎變成了獨立的諸侯，一方面是許多帝國城市結成聯盟，另一方面是帝國騎士們結成聯盟，忽而互相對抗，忽而與諸侯對抗，忽而與皇帝對抗。自己對自己的地位認識不清的帝國當局，動搖於帝國的各種分子之間，因而日益喪失威信。帝國當局企圖像路易十一那樣實行中央集權化，尽管用盡一切計謀和強力手段，除了維繫住當時的奧地利世襲土地外一無成就。

① 即今比利時北半部地區。——譯者注

在這種混亂局面中，在相互交錯的無數沖突中，誰最後得到勝利而且一定得到勝利呢？得到勝利的，就是主張保持帝國分崩離析狀態而却要實行中央集權的人們，也就是主張在地方省區實行中央集權的人們，也就是諸侯們。這些諸侯與皇帝分庭抗禮，皇帝的地位日益變成與諸侯相似的一個諸侯了。

在這些情形之下，從中世紀保留下來的各階級的狀況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新階級已經在舊階級之旁形成了。

從高級貴族中出現了諸侯。他們幾乎完全脫離皇帝而獨立，並已掌握最大部分統治權。他們自行宣戰和媾和，擁有常備軍，召開省議會，征收賦稅。他們已經把很大一部分低級貴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他們還不斷使用一切手段要將其餘的帝國直轄城市及男爵領地吞併。他們對於這些城市和低級貴族實行中央集權，而他們對於帝國政權却是反中央集權。他們對內部的統治已是很專橫的。他們多半只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召集等級會議。他們任意地征課賦稅和搜刮金錢；等級會議對征稅的批准權很少得到承認，更不見諸執行。就是在等級會議執行征稅批准權的時候，諸侯照例總是通過騎士和上層僧侶兩個等級而擁有多數，這兩個等級都是既免稅而又分享稅收的。諸侯們由於奢侈生活，宮廷耗費，常備軍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賦稅重擔有加無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權的保護而免担此重負；於是整個稅賦的重擔就落到農民身上了，既落在諸侯們的農莊雇農身上，也落在農奴、依附農以及隸屬諸侯的騎士們的佃農身上^①。在直接稅不夠用的地方，間接稅就實施了；財政上用盡一切巧立名目的辦法，以求填滿國庫漏洞。如果一切都無濟于事，再沒有什麼可資彌補，也再沒有帝國自由市願意借債，那末他們就在市制上使出最骯髒的

手法，鑄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視国庫的方便为轉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錢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諸侯們司空見慣的謀取收入的財源。司法也是諸侯們經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視的貨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滿足諸侯們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紀封建等級制度中的中級貴族几乎完全絕迹。中級貴族不是已經上升为独立的小諸侯，就是下降到低級貴族的行列中。低級貴族，即騎士等級，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騎士已經完全貧困而只靠从軍或任文职为諸侯服务来維持生活；另一部分騎士还对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調遣；更小的一部分騎士是直屬皇帝的帝国騎士。軍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都把騎士們这种笨重騎兵在軍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們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紐倫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騎士們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騎士等級需用金錢这件事本身对于騎士等級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官墙內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場上的豪华風尚，武器和馬匹的价格，都隨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騎士或男爵們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

- ①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剝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剝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輕，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襲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騎士們的佃农和諸侯們的农庄屬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譯者注

劫，以及諸如此類的高貴職業，都日漸變成太危險的事情^①。他們自己屬下的臣民提供的貢賦很難比往日增多。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需要，這些尊貴的老爺們不得不採取和諸侯們一樣的手段。貴族榨取農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農奴們被榨至最後一滴血，依附農們在各種各樣的借口和名稱之下被加上新的桑捐和貢賦。徭役，地租，桑捐，接租費，死亡稅，保護金³等等，都不顧舊契約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絕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賄敲詐的勾當。騎士們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農民的錢財時，就把農民不問青紅皂白地投入牢獄，然後再強迫農民把自己贖回。

低級貴族和其餘各等級同樣地不能和睦相處。諸侯所封的采邑貴族想直屬帝國，帝國騎士想保持不受諸侯干涉的獨立地位，因此他們都和諸侯不斷衝突。僧侶等級當時高傲的形象，在騎士們眼光中，已完全成為多餘的等級。騎士們妒羨僧侶等級的巨大莊園，妒羨他們由於獨身和教會規章而積累起來的財富^②。騎士們和城市不斷發生糾紛，他們對城市負債；他們靠洗劫城市所轄地區，靠搶劫城市商旅，靠在衝突中從城市擄來的人質的贖金過活。金錢問題越是成為騎士等級生死攸關的問題，騎士等級反對其餘等級的鬥爭也越激烈。

僧侶是中世紀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代表，他們所感受到的歷史轉變的影響也不算小。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商業發展的迫切需要，不僅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而且也改變了只有

① 當時的“強盜騎士”引起城市以及諸侯的痛恨。有許多憤劫的騎士的城堡都被諸侯的或城市所組織的軍隊進剿搗毀。——譯者注

② 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侶封建主可以娶妻，產業常常通過后代繼承而脫出教會的掌握。這道令下以後，產業脫出教會掌握的可能性逐漸絕。——譯者注

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的狀況。在知識領域中也出現勞動分工了。新出現的法學家把僧侶們從一系列很有勢力的職位中排擠出去了。僧侶從此也就多半變成了多余的人；他們日益無所事事和愚昧無知的狀況使他們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越是變成多余的人，他們的人數倒越來越多，這是由於他們擁有巨大的財富，而他們還在用一切手段不斷增殖財富。

在僧侶中間有兩個極其不同的階級。僧侶中的封建特權階層形成貴族階級，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長，副院長以及其他高級僧侶。這些教會顯貴或者本身就是帝國諸侯，或者是在其他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擁有許多農奴和依附農。他們不僅像貴族和諸侯一樣肆無忌憚地榨取自己屬下的人民，而且在辦法上還更加無恥得多。除了使用殘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詭計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嚇外，一切驅逐出教和拒絕赦罪的威嚇也實行了，此外還濫用懺悔牧師進行一切詭計圖謀，總之是要從所屬人民身上敲出最後一文錢，以增添教會的產業。偽造文書是這些尊嚴的人們經常喜用的欺騙手段。雖然他們除通常的封建征課和貢賦而外還要抽取什一稅，但是所有這些收入還是不夠揮霍。製造靈異的聖像和聖徒遺物，組織超渡禮拜場，販賣赦罪符，這些都被用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長時期內收到最好的效果。

這些高級僧侶使用修道士來從事政治性的詭詐和宗教性的詭詐，他們的詭詐行為日益推廣，他們的修道士婁羅也不斷增多。這些高級僧侶以及他們的無數修道士婁羅，正是人們痛恨的對象，不僅是人民痛恨的對象，並且是貴族痛恨的對象。如果他們是直屬帝國的話，他們就總同諸侯們過不去。肥碩的主教們、修道院長們以及他們的修道士婁羅們的放蕩生活激起貴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憤

怒，人民不得不担負他們这种生活的重担；他們讲的道越是和他們的生活成鮮明对照，人民的憤怒就越大。

僧侶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傳教士和城市傳教士組成的。他們不屬於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們的工作，上級不大过問；虽則他們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視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內的修道士娄罗們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們的待遇就坏得多，他們的俸給多半都很微薄。他們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們尽管身居僧侶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們中間却是很普遍的。他們为运动貢獻出理論家和思想家，其中許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說話，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侶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們。

正如在諸侯和貴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級僧侶和低級僧侶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納“公捐”⁴，即帝国稅，对教皇也要納一般教会稅，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稅中去开支羅馬宮廷的豪华生活費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沒有像在德國——伙特僧侶人多勢大——征收教会稅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別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納上任年貢⁵时，征收教会稅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費的增加，斂錢的新花样，如販賣聖徒遺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費等等都發明出来了。大宗錢財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國流入羅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們对僧侶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識，特別是激起了貴族們的民族意識，貴族們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級。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紀城市最初的城廂市民中发展

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貴家族**，即所謂“**名門望族**”。他們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職的全是他們。因此他們不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們倚仗其財富，倚仗其久經皇帝和帝國承認的貴族地位，以各種方式來剝削城市公社以及隸屬於城市的農民。他們用糧食和貨幣來放高利貸，把各種壟斷權據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場的一切權利一步步取消了，並把這些森林和牧場直接用來為自己的私利服務。他們擅自在大路上，橋頭上，城門口抽收關稅，還抽收其他捐稅。他們出賣行會特權，師傅權，市民權，還出賣法庭裁判權。他們對待城郊農民並不比貴族和僧侶寬厚些，剛剛相反，城市派在鄉村的官吏們，全都出身望族，他們在徵稅工作中除了有貴族的殘酷和貪婪外還帶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嚴格性。這樣搜刮來的城市收入，經管得極其隨意。市政會計，其實純粹是官樣文章，也草率 and 紊亂到了極點；侵吞和虧空成了家常便飯。這個在一切方面都擁有特權、人數較少、靠親戚關係和利害關係緊密結合起來的階級，在當時是如何輕易地從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飽，我們只消回想一下1848這一年在許多城市管理機構中揭露出的那種種侵吞詐騙的現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貴族們會想盡辦法，到處使城市公社的權利不發生作用，特別是在財政事項中不發生作用。後來是這些老爺們的欺詐行為太不像話了，各公社才又行動起來，以求至少要監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數城市中，公社也確實恢復了自己的權利。但是，由於各行會間鬥爭不已，由於城市貴族不肯甘休，並且還由於帝國以及與他們聯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護，這些名門望族的官爺們很快又在實際

上恢复了他們旧有的独占統治地位，有时是靠詭計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紀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門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們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們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無論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則要求对名門望族的貴族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貴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們中間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門望族中有不滿情緒的沒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較激进的反对派合計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溫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紀的运动中扮演著和他們的后代門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⁶。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侶，僧侶們的腐化生活和放蕩行为使他們深恶痛絕。他們要求对这些尊貴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們要求廢止僧侶审判权和僧侶免稅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沒落的市民和沒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沒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較低阶段就出現的人数众多的雛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現的現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領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潰，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像 16 世紀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間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屬於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鎮伏农民的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結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們頹廢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記，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純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沒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賤和墮落的地步。

可見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沒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現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尙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結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連；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僕，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間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則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資格的师傅。

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依附于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陶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陶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曇花一现。他们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

被当作牛馬，甚至比牛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末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約規定的法定負担已經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負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須以絕大部分時間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繳什一稅，地租，杂捐，賦稅〔Bede〕，远征稅（战争稅），本邦稅，帝国稅。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錢，非但不能娶妻，連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蝸牛壳，驅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漁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踐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許眼睜睜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場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預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斬首。加洛林納法典⁷中的各章論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斬首”，“車裂”，“火焚”，“夹火鉗”，“四馬分尸”等等，其中沒有一項沒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誰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是貴族，僧侶，城市貴族，律師，他們深知拿了錢就該办什么事。帝国官場中各等級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們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們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們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協議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傳，习于順从；在許多地区，已經戒絕使用武器；剝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輕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們在中世紀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國——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

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諸侯，貴族和城市的有組織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陣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級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級一齐剝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們联合呢？

可見 16 世紀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級——諸侯，貴族，僧侶，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龐杂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錯綜复杂。每一等級都妨碍着另一等級，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級处在繼續不断的明爭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經出現过，在目前最先进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現，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級剝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現。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貴族，资产階級，小资产階級，农民和无产階級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們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階級結構竟鬧成什么样的混乱現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見解和各种企图的攪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絕，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級要归并成較大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較大規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傳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級贊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級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級把全民集結成

(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事实,那末在16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好像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知,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辩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

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藏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末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表现

(韦尔登派⁸)，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⁹，伯利霞的阿尔诺德^①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博尔^②，皮卡尔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¹⁰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12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 [廉价的政府] 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 *église à bon marché* [廉价的教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

① 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拉德的弟子。1136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棄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1146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

② 约翰·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瓦特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

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會中一切糟蹋錢的事情。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國，雖則還處於君主保護之下。這些城市在對教皇權力進行攻擊時，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主張：資產階級統治的正規形式是共和國。城市異教對一系列教條及教會戒律的敵視，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來說明，一部分可由當時城市生活條件來說明。為什麼城市異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對教會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沒有人比薄伽丘^①透露得更清楚了。代表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國有布里西亞的阿爾諾德，在法國南部有阿爾比派，在英國有約翰·威克利夫^②，在波希米亞^③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¹¹。為什麼反對封建制度的反對派在這裡只是以反對僧侶的封建主義的反對派姿態出現呢？其中道理很簡單，因為各城市都已被承認為等級，因為各城市在反對世俗的封建主義及其特權時，已經能夠用武力或在等級會議中居于有力地位去進行反擊了。

在此我們已經可以見到，在法國南部，在英國和波希米亞都有絕大部分的低級貴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進行反對僧侶的鬥爭，加入城市異教。這種現象，可以由低級貴族依賴於城市的地位來說明，還可以由低級貴族和城市對待諸侯和高級僧侶時利害一致來

① 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詩人。他的名著《十日談》是一部寫實小說集，描寫1348年黑死病流行時期佛羅倫薩的社會生活。他在此作中에서도以最深刻雋永的筆鋒描寫了牧師僧侶的風俗。——譯者注

② 約翰·威克利夫(1320—1384)是牧師，並為牛津大學教授，對物理學、邏輯和哲學都有研究，曾將聖經為英文，主張用民族語言禮拜。他駁斥沒有教皇，教會即不能存在的說法，認為教皇無權從英國收取貢物，建議政府沒收教會土地。他宣稱“國王的王國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張簡化禮拜儀式，減低禮拜費用，並把教會改革為不依賴任何外國力量的民族組織。他的号召在倫敦市民中很得人心，並成為15和16世紀一切反天主教會的改革者的先聲。後來的羅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們建立的。

③ 即捷克。——編者注

說明。这种現象我們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見到。

另一种異教則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異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現，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結合着的。这种異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階級異教关于僧侶、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員間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則。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論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經多少推論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貴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貴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稅，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結論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異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異教分別开来，但在14和15世紀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異教鮮明不同的党派見解了。在14和15世紀，农民平民異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現，与市民異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約翰·博尔出現，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¹²出現。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經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現了共和制傾向，这种傾向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異教形式結合着，例如鞭笞派^①，罗拉德派¹³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繼續

① 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斃的癡人，11世紀出現于欧洲，盛行于13、14、15世紀，自意大利傳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贖免罪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15世紀的鞭笞派揭穿僧侶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開始被教会迫害了。——譯者注

保持着革命傳統。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擠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階級。他們处于封建組織之外，也处于市民組織之外。他們既无特权，又无财产，連像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負担的产业也沒有。他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們的生活和当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會他們。他們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現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驅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釋，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們——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經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現什么迹象的現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一切建筑在階級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問題。早期基督教中錫利亚式的狂想¹⁴就和这类想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現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試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許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結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曖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預見，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現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預見。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釋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預見，最初是出現在德意志，出現在托馬斯·閔

采尔及其党人里。誠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經存在过一种錫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純粹軍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閔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閔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閔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騷乱中都出現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紀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統治者日益加紧束縛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統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維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侶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諸侯，富裕貴族，高級僧侶，城市貴族。聚集在市民階級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級貴族，市民階級，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沒收僧侶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脫离帝国羈絆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則團結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論都由閔采尔最鮮明地表現出来了。

路德和閔采尔，就理論說，就性格說，就出現姿態說，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 1517 到 1525 这几年間所經歷的轉變，恰恰就是現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 1846 到 1849 年所經歷的轉變，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經歷的轉變。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領導运动时，一轉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 1517 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場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場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階級異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

何更為激進的思潮，它也不能這樣做。因為在最初時機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對派分子團結起來，不能不表現出最堅決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異教的全部群眾來與天主教正宗信仰對抗。我們的自由派資產者恰恰就是這樣，在1847年還是革命的，還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還熱中於工人階級解放事業。路德的健壯的農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動的最初階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聲疾呼。

“如果他們（羅馬僧侶）^①還要繼續妄逞狂暴的話，我以為除了國王和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這些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並且不用語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們的罪行而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和藥方去對付他們了。我們既用刀劍懲治盜賊，絞索懲治殺人者，烈火懲治異教，為什麼我們不運用百般武器來討伐這些身為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而又傷風敗俗不配為人師表的羅馬罪惡城的蛇蝎之群，並且用他們的血來洗我們的手呢？”¹⁵

但是早期的這種火一般的革命熱情沒有維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閃電引起了燎原之火。整個德意志民族都投入運動了。一方面農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對僧侶的號召和關於基督教的自由的說教看成起義的信號，另一方面較溫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級貴族參加了他的運動，甚至諸侯們也被卷入了這個潮流。農民和平民相信和他們的一切壓迫者算賬的日子來到了。市民、貴族和諸侯只想打破僧侶的權力，打破羅馬的羈絆，打破天主教等級制度，並沒收教產而從中漁利。各種派別形成起來了，並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擇。他怎樣抉擇的呢？這位托庇于薩克森選帝侯保護之下的維登堡名教授，這位一鳴驚人聲勢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躊躇地抛棄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貴族和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馬的号召銷声匿迹了。路德的調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見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貴族书》¹⁶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請去貴族密謀反对僧侶与諸侯的中心爱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見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願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語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語言来維持的，也还是要靠語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們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轉变时起，更正确些說，从路德較明确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場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討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場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謀詭計、妥协让步，其結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¹⁷，这也就是由討价还价而得的經過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議会，妥协議会，宪法审查會議以及爱尔福特議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嘔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階級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鮮明不过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傳合法的前进，是自有緣故的。多数城市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級貴族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諸侯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說已有保证，至少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繼續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蕩都必然促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諸侯、貴族和

一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結果呢，或者是市民階級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者必居其一。資產階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風波和复辟的風波之間极力順風轉舵，这种情况我們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結果都必然有利于諸侯，必然加强諸侯勢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階級的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諸侯的控制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諸侯的奴僕了，而人民也很懂得應該怎么办。人民說，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諸侯的僕人了，人民在奧拉閔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諸侯和資族絕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調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們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們，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們。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褻瀆上帝的，違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調解建議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諸侯、貴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階級“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閔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設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起来，也許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階級的改良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

之下，羅馬罪惡城的奴僕們都成了無罪的羔羊，上帝的馴良兒女；市民和諸侯，貴族和僧侶，路德和教皇都團結起來“反對殺人越貨的農民暴徒”¹⁸。

路德喊道：“無論誰只要力所能及，無論是暗地里也好公開地也好，都應該把他們戳碎，扼死，刺殺，就像必須打死瘋狗一樣；所以，親愛的先生們，想想辦法吧，救救局勢吧，無論誰只要力所能及，都來刺殺他們，擊斃他們，扼死他們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沒有比你還死得其所的了。”絕不可對農民亂發慈悲。誰憐憫那些為上帝所不憐憫的人，為上帝所要懲罰和毀滅的人，誰就是置身於叛徒之列。如果只要農民拿出一頭牛來，而其餘的牛他們還可以安然享用的話，他們還得好好感謝上帝呢。諸侯們將要從造反事件中學會認識賤民頭腦里想的是什麼，這些賤民是只有用強力來統治的。“聖人說：Cibus, onus et virga asino [驢兒只曉得吃草，負重和挨鞭]，農民只有滿腹糟糠，他們既不聽話，又愚蠢，所以他們必須聽鞭聲和槍聲，這樣做對他們正合式。我們應當要求一件事，而這件事乃是為他們好，這件事就是，他們乖乖地過日子；要不然的話，那就沒有多少可客氣的了。那就讓他們尝尝槍林彈雨的滋味吧，否則他們還會干出千百倍的壞事來呢。”

我們以往的社会主義的、博愛的資產者們恰恰就是用的這樣的腔調。當無產階級在三月革命的日子裏出來要求共享勝利果實時，他們的談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樣。

路德因為翻譯了聖經，于是就給了平民運動一個強有力的武器。路德在聖經譯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幾世紀的純朴基督教和當時已經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鮮明的對照，使得一個不知層次重迭的、人為的封建教階制度為何物的社會和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形成鮮明的對照。農民們利用這個武器來從各方面反對諸侯，貴族，僧侶。於是路德把這個武器掉轉過來反對農民，他從聖經中拼湊出真正的贊美詩來歌頌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這是舐食專制君主殘羹的臣僕從來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的。神授君權，忍耐服

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聖經認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侶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聖經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連市民階級的运动也出賣給諸侯了。

最近資产者又給了我們許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还用得着——列举嗎？

現在再拿平民革命家閔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馬斯·閔采尔約在 1498 年¹⁹ 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相傳他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閔采尔早在 15 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組織秘密团体反对馬格德堡大主教，并一般地反对羅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淵博知識使他早得博士学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見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前非常蔑視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圣餐酒餅化为基督血肉之詞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話來說，他是以前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紀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約阿西姆^① 的錫利亚式的著作。据閔采尔看来，約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繪的千載天国以及对堕落的教会和敗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蕩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說的教义在当地周圍地区获得巨大同情。1520 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說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碰上有錫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許多地区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順与世无爭的宗派，然而骨子里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

① 約阿西姆是 12 世紀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願誓的學說。——譯者注

成長為一個反對派，並且這個反對派此時也越來越公開和堅決地在廣大群眾之間加強鼓動了。這個宗派就是再洗禮派²⁰，是由尼克拉斯·施托黑^①領導的。他們宣說審判末日和千載太平都臨近了，他們有“幻想，有狂熱，有預言的靈明”。不久他們就和茨威考當局發生衝突；雖然閔采爾從未無條件地參加這一派，倒是這一派還受了他的影響，但閔采爾挺身而出保衛他們。當局採取堅決行動來反對他們；他們不得不離開此城，閔采爾也和他們一同離去。這是1521年底的事。

閔采爾來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黨取得聯繫，力圖在此取得立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亞。1522年他任圖林根的阿爾斯特德城牧師。他在此已開始對禮拜儀式進行改革。路德還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來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在規定念禮拜日福音書和使徒書信的時候，他也不只念這兩部分而是全部聖經都選念。同時他又組織了附近地區的宣傳工作。人民從四面八方來歸附他，不久阿爾斯特德就成為整個圖林根下層人民反對僧侶的運動的中心。

此時閔采爾主要還是神學家；他的攻擊對象幾乎還只是僧侶。但是他卻不像路德此時那樣去提倡平心靜氣地辯論和和平地前進了，他不是這樣，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說教繼承下來了，并号召薩克森諸侯和人民起來用武力對付羅馬僧侶。

“基督就說：‘我來並不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但是你們（薩克森諸侯）^②要刀劍干什么呢？你們如果要做主的僕役，那末沒有別的任务，就是去

① 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縫，以宣傳宗教的共產主義著名。閔采爾也受他的影響，認為他了解聖經高出一切牧師之上。1522年施托黑在圖林根和閔采爾一同成為農民戰爭的領袖。——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驅除妨害福音的惡魔。基督十分嚴肅地在路加福音第19章27節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敵拉來，在我面前殺了罷’……不要有這種淺陋的看法，認為主的力量應當勿需你們刀劍之助就可做到這件事，果真如此，你們的刀劍就要在鞘中生鏽了。凡是違背主的啟示的人們，都必須毫無慈悲地消滅掉，就像希西吉亞，居魯士，約西亞，丹尼爾和伊利亞消滅巴爾的劣僧們一樣，否則基督教會就不會回復本來面目。我們必須在收穫的時節在主的葡萄園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記第7章說過：‘你們不可憐恤不跟從主，事奉別神的人，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偶像，我決不怒斥你們。’²¹

但是對諸侯們的要求並無結果，而革命情緒在人民中間却一天比一天增長了。閔采爾的理想越來越明朗化，也越來越果敢，於是他就堅決地和市民階級宗教改革分道揚鑣，從此之後他就同時是直接以政治鼓動家的姿態出現了。

他的神學哲學理論不僅攻擊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論點，而且也一般地攻擊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論點。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傳布一種泛神論，他的泛神論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²²相當接近，個別地方甚至着了無神論的邊際。他既否認聖經是唯一的啟示，也否認聖經是無誤的啟示。照他看來，真正的、生動活潑的啟示應是理性。理性是已經存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還要繼續存在下去的啟示。把聖經同理性對立起來，這就是以文字毀滅精神。因為聖經所宣說的聖靈並非吾人身外之物；聖靈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別的，只不過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躍的表現，因此非基督徒一樣可以有信仰。通過這種信仰，通過生動活潑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須在此生中尋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國在現世上建立起來。既無所謂來世的天堂，當然亦無所謂來世的地獄或萬劫不復的地獄。當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無所謂魔鬼。基督也會和我們一樣

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師表。他的聖餐其實只是簡單的回省宴會，在宴會上大家享用的餅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學曾經在一段時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詞令外衣之下，閔采爾宣說上述這些教義也同樣是大半掩藏在這些基督教詞令之下來進行的。但他那極端異教的基本思想到處都從他的著作里透露出來。可以看出，這件聖經外衣在閔采爾這裡遠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爾門徒那裡那麼重要。然而在閔采爾和近代哲學之間却隔着 300 年之久。

閔采爾的政治理論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觀點緊密相連的；他的政治理論遠遠超出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條件，就如同他的神學遠遠超出了當時通行的看法一樣。正如閔采爾的宗教哲學接近無神論一樣，他的政治綱領也接近於共產主義。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許多近代共產主義派別擁有的理論武庫還不如 16 世紀“閔采爾派”的武庫那麼豐富。閔采爾的綱領，與其說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匯，不如說是對當時平民中剛剛開始發展的無產階級因素的解放條件的天才預見。這個綱領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早經預言的千載太平之國；建立天國的途徑是恢復教會的本來面目并廢除與這種似乎是原始基督教會而實際上是嶄新的教會相沖突的一切制度。閔采爾所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所有當時政權，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應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財產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須實行。為了不僅在整個德意志，而且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來貫徹這一切，須建立一個同盟。諸侯和貴族都須邀來參加；如果他們拒絕，同盟就須在最初的時機用武器去推翻或消滅他們。

閔采爾隨即着手組織這個同盟。他的說教越來越帶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質；除了攻擊僧侶而外，他還以同樣的慷慨激昂情緒來猛襲諸侯，貴族，城市貴族。他以火辣的筆調刻畫出當時的壓迫並把他想像中的社會共和平等的千載太平之國和當時的壓迫對照起來。同時他寫的革命小冊子一個接一個地發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爾斯特德及其周圍地區進行組織同盟的工作。

這種宣傳的第一個成果，是破壞了阿爾斯特德附近梅勒爾巴赫的聖瑪麗禮拜堂，這是按照聖誡而行事的：“你們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偶像，因為你歸耶和華上帝為聖潔的民。”（申命記第7章6節）薩克森諸侯親自到阿爾斯特德來平息這次騷亂，並傳喚閔采爾到城堡去。閔采爾在此發表了一段說教，這一段說教是諸侯們從路德這位“維登堡的行尸走肉”（閔采爾給路德的稱呼）口里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他主張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統治者，特別是那些把福音弄成異教的僧侶和修道士都應該杀掉，他引新約作他的主張的根據。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該有活着的權利，除非得到上帝選民的恩赦。如果諸侯們不消滅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末上帝將從他們手里奪去寶劍，因為用劍之權屬於全體教徒。諸侯和貴族就是盤剝偷盜的禍首；他們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植物，通通攬歸私有。然後他們却要來向窮人們宣說清規戒律：你不應該偷竊。他們自己却是見東西就拿，見農民和手工業者就掠奪剝削，而農民和手工業者只消誤取一絲一毫，就得上絞索，於是路格納^①博士就對這一切祈禱

① 俏皮話，「Lügner」——「說謊者」（閔采爾指路德）。——編者注

一声：阿門。

“穷人仇恨貴族，这是貴族們自己造成的。他們不願意去掉騷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們，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壺破罐横扫一道，該是多么好啊！我說了这些話，会有人說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見齐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頁）

閔采尔把这篇說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薩克森約翰公爵的懲罰被逐出境，閔采尔自己被迫令將一切著作交付魏瑪公爵政府檢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²³拿到帝国自由市繆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衰衰諸公亵渎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他用下述的話来結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須忍受一次大震蕩；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賤的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錘的托馬斯·閔采尔”写了一段警語：

“請你注意，我已把話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們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潰，顛复，同时还能去建設，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諸侯、僧侶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們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閔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閔采尔沒有事先問他即已实施的。路德抱着溫和改良派對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閔采尔的行动。1524年春閔采尔即已写信給梅兰希通——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纏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責他和路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們只是要以死背聖經字句的方式来找

杀运动，他們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們，勿再等待与躊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門前。幸勿与不敬上帝者为友，他們妨害寡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們的諸侯，否則你們自身将与他們同归于尽。你們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見責，我实不能不如此。”²⁴

路德不止一次邀約閔采尔公开辯論；但閔采尔任何时刻都願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維登堡大学有偏見的听众面前作神学的爭吵。他不願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有誠意的話，就請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閔采尔的承印人的迫害，取消檢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論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开。

在上述閔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現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发閔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薩克森諸侯书》²⁵中他称閔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驅逐出境，其理由是他們不以宣說邪恶教义为滿足，他們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閔采尔被傳到魏瑪宮廷在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活动作答辯。許多揭发他的事实當場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們的組織的联系也被发觉。當場已有人用充軍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薩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經离开了此城的話，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間，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憤懣的情緒使得閔采尔的宣傳活动格外順利。閔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寶貴的伙友一起进

行宣傳活動。再洗禮派本來沒有確定的教條，只是靠反對一切統治階級這一共同目標以及再洗禮派的共同象徵而結合起來的；他們在生活習慣上是力修苦行，在宣傳鼓動上則狂熱不倦，勇敢無畏；這一派人越來越多地團結在閔采爾周圍。再洗禮派本身的需要和願望是由閔采爾替他們明確下來，並形成他們的新教義的。他們因為被搜捕的關係，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於是流浪全德，到處講說他們的新教義。無數的再洗禮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於其他酷刑之下，但是這些密使的勇敢堅毅是無可動搖的；在人民的慷慨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他們的活動所取得的成就是無法估量的。因此閔采爾從圖林根逃跑出來的時候，到處都找得到準備好的立足之地，他隨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處。

閔采爾首先來到紐倫堡²⁶。約一個月以前，此城附近剛剛有一次農民暴動還沒有開始就被鎮壓下去了。閔采爾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動；馬上就有一些人出來擁護他的肆無忌憚的神學主張，都認為聖經不必有絕對約束力，七種聖禮是無聊的，並且宣稱基督也不過是一個人，而世俗官廳的作威作福乃是褻瀆上帝的。路德大叫：“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沒了，阿爾斯特德的妖精！”閔采爾把答路德書在紐倫堡付印²⁷。他率直地指責路德獻媚諸侯，指責他虎頭蛇尾，扶持反動派。儘管如此，人民仍將獲得解放，那時路德博士的處境將如被擒之狐。——這篇文章由當局下令沒收了，閔采爾又被迫離開紐倫堡。

閔采爾於是穿過士瓦本到亞爾薩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這地區，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禮派密使促成的起義，爆發已有數月。閔采爾的宣傳旅行，顯然對人民黨派的組成，對人民黨的要求能夠獲得明確的提法，對起義終於在1525年4月全面爆發，都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閔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語言是宗教的預言；閔采尔就用这种語言對他們說話，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們，閔采尔能當面和他們暢談他的最終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閔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圍，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間，而且也有些是低級僧侶，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領導秘密組織；此时閔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薩克森，图林根經過法蘭克尼亞，士瓦本直到亞爾薩斯以及瑞士邊境的組織聯系工作，并把下列这些南德鼓動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師，吸收為他的門徒，吸收來作同盟的領導者，如瓦爾茨胡特的胡布馬伊埃，蘇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貝爾，格利森的弗蘭茨·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爾，萊普海姆的雅科布·韋埃和斯圖加特的曼特爾博士。閔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沙福康森邊境的格利森，由此出發巡遊赫部和克勒部等地區。驚惶失措的諸侯和統治者們到處對這些新的平民異教進行血腥的迫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揚，團結更加堅固。閔采尔在德国南部進行鼓動將近5個月之久，並在密謀接近實現的時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此親自領導起義，其詳情後面再談。

可以看出，兩個黨派首腦人物的性格和行徑都恰恰反映出各自黨派的态度。路德動搖不定，當運動日益嚴重時反而害怕，終至投效諸侯。這一切和市民階級兩面搖擺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閔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斷則在平民和農民的最先進的一派中完全再現出來。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階級大多數人的想法和願望就已滿足，因而輕易地在本階級內擁有了十分廣大的群眾基礎；

而閔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 60 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①。

1476 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玛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

^① 我们在自己的大事记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充分资料不能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求。——恩格斯原注

斯巴達式嚴格平等原則，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必經的階段，如果不經過這個階段，社會的最下層是決不能發動起來的。社會的最下層要發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確自己與社會其他一切階層對立的地位，要集結成一個階級，必須從何下手呢？必須把自己還可以和現存社會制度妥協調和的一切完全拋棄；必須把那種使他們備受壓迫的生活有時尚堪忍耐的些微享樂，甚至最殘酷的壓迫也不能剝奪掉的些微享樂，完全拋棄掉。這種平民的和無產階級的禁欲主義，無論就它的狂熱形式或它的內容看來，都和市民階級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國清教徒（和獨立派²⁸以及更激進的諸教派有別）所傳佈的市民階級禁欲主義大不相同；市民階級禁欲主義的全部奧秘不過是市民階級的節儉而已。顯而易見，這種平民無產階級的禁欲主義隨着下述兩種情況的發生而喪失其革命的性質，一方面是隨着近代生產力的發展，消費資料無止境地增產，因而使斯巴達式的平等成為多餘之事，另一方面是隨着無產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無產階級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這種平民無產階級的禁欲主義就逐漸從群眾中銷聲匿跡，就是在那些堅持此種禁欲主義的宗派徒眾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為市民階級的吝嗇，或者流為一種自鳴清廉的美德，然而實際上仍然不過是一種小市民氣的、行會手工匠式的省吃儉用而已。無產階級大眾既然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拋棄的，所以禁抑之說也就沒有什麼必要向他們宣傳了。

吹鼓手漢斯的懺悔說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義預言者都用他的懺悔說教來開始活動。事實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拋棄了全部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無聯繫、散居四方、並且從小就慣于盲目服從的農民發動起來。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

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说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禱像对神圣祈禱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撕取一絲絨毛，仿佛就像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4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馮·通費尔特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

們的弟兄和伙伴都約來，有多少約多少。但來時不要拿着朝聖手杖，而要帶着武器和武裝，一手拿燭，一手拿劍和矛或戟。到時聖母將要把她要你們做的事向你們宣告。”²⁹

可是在農民大批來到之前，主教^①的騎兵已在夜間把這位反叛預言者捕獲，帶到維爾茨堡宮里去了。在指定的這一天，來了34 000名武裝農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這些農民大為沮喪。絕大部分散去了；較堅定的一部分集結了將近16 000人，在孔茨·馮·通費爾德和其子米哈埃爾率領之下一同來到宮前。主教用諾言勸說他們回家；但當他們剛剛開始散去的時候，即遭到主教的騎兵的襲擊，很多人被捕，兩個人被斬首，吹鼓手漢斯本人則被焚死。孔茨·馮·通費爾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財產交給了修道院，才許他回來。到尼克拉斯豪森朝聖這件事仍繼續了一些時，然而最後也被禁止了。

在這第一次謀反未成之後，德國又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平靜。直到90年代末，新的農民起義和密謀才又開始。

1491年至1492年的荷蘭農民起義是在黑姆斯凱克一戰中才被薩克森的阿爾勃萊希特公爵鎮壓下去的；同一時期在士瓦本北部肯普騰修道院轄區農民也進行過起義；1497年前後夏爾德·埃爾瓦領導的弗里西安起義也是被薩克森的阿爾勃萊希特鎮壓下去的；所有這些起義，我們都不詳論了。一則因為這些起義離真正的農民戰爭的戰場太遠，再則因為這些起義直到此時為止還都是自由的農民反抗別人要把封建制度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鬥爭。我們現在就來敘述為農民戰爭作了準備的兩大秘密結社：“鞋會”和“窮康

① 魯道夫二世。——編者注

拉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1493年在亚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50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50至60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 *Bundschuh*，这就是同盟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20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1493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

亡命者都變成了密使，這些密使到處發現同樣的壓迫引起同樣的起義情緒，因而就乘機把“鞋會”傳播到現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農民，堅韌不拔，從1493年起，密謀造反，歷時30年之久，把他們因住地分散而造成的種種困難都一一克服，並在無數次潰散，失敗，首領被殺之後，總是再接再厲重整旗鼓，直到最後大規模起義的機會來到——這樣的頑強堅韌，實在令人敬佩。

1502年斯拜爾主教轄區還包括布魯赫薩爾地區在內，當時在這個轄區里秘密農民運動已露形迹。“鞋會”在這地區的重整旗鼓工作確實獲得巨大成就。大約有7000人被組織起來，以布魯赫薩爾和魏茵加騰之間的溫特爾格羅姆巴赫為中心，其分支在萊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地帶，上游直達巴登侯爵領地。他們的綱領規定：不再向諸侯，貴族，僧侶繳納任何捐稅，什一稅，雜稅，賦稅；廢止農奴制度；沒收寺院及其他教會產業分給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認任何其他君主。

這是農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產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統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國的兩條要求。從此時起，這兩條要求經常在農民和平民進步集團中一再出現，直到托馬斯·閔采爾把瓜分教產的要求轉變成沒收教產以行財產公有制的要求，把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要求轉變成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的要求。

重整旗鼓後的“鞋會”和原先的“鞋會”一樣，有秘密的集會地點，有保密的誓約，有入會的儀式，有“鞋會”旗幟，上面寫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動計劃和亞爾薩斯“鞋會”的計劃相似。計劃規定，要突然奪取布魯赫薩爾，那里的大多數居民都入會了，要在這裡組成一支“鞋會”軍隊，並把這支軍隊派遣到周圍的諸侯領地去發揮流動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謀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懺悔時把計劃告訴了懺悔牧師，這個牧師就把計劃告發了。各地政府立即採取對策。“鞋會”組織分布之廣，從亞爾薩斯各帝國等級以及士瓦本聯盟³⁰都很震驚一事即可看出。他們調集軍隊，大肆逮捕。馬克西米利安皇帝，這“最後一個騎士”，頒布了最殘忍的懲治法令來對付農民們的計謀。農民們曾在各處集合，進行武裝抵抗，可是分散的農民隊伍終不能持久。謀反者有些被處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所以大部分會員，甚至包括領袖在內，都還能留在本地或鄰近的領主地區里，完全沒有受到驚擾。

在這次新的失敗之後，又出現一段較長的階級鬥爭似乎趨于平息的時期。其實鬥爭仍在暗中繼續着。16世紀最初幾年“窮康拉德”已經在士瓦本建立組織，它顯然是和四散的“鞋會”會員的活動有聯繫的；在黑森林區，“鞋會”以单个的小組形式繼續存在着，直到10年以後，一個有魄力的農民領袖出來，才將各處線索重行聯繫起來，組成一個巨大的密謀團體。兩個密謀團體前後緊隨出現在公眾面前，都是在1513—1515這幾年動蕩時期裏的事。在這時期裏，瑞士農民，匈牙利農民和斯洛文尼亞^①農民同時進行了一系列規模巨大的暴動。

恢復萊茵河上游的“鞋會”的人是溫特爾格羅姆巴赫的約翰·弗里茨，1502年密謀中的逃亡者，曾經當過兵，是一個在各方面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後，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間許多地方逗留過，最後在布萊斯部^②的夫賴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來，甚至

① 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譯者注

② 部是地理區域名稱，這個名稱在本書第五章將出現多次。布萊斯部是今德國西南角與法國瑞士接壤一片地區。——譯者注

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頓組織的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組織，法庭偵查文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詳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謀家具有外交天才和百折不撓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階級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騎士，僧侶，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入組織到許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謀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較老練的信使化裝成五花八門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約斯和乞丐头子們直接往来并通过他們把为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們在他的密謀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樣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蕩，指称女孩脚受了伤，进行乞討；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締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紅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針的节鞭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倫亭的名义化緣，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頂紅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許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異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經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們在亚尔薩斯，在巴登侯爵領地，在布萊斯部同时放火，并在薩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着他們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傭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揮，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會員之間，一处一处的聯絡站已經建立起来了，約斯·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費尔（夫賴堡人）不断地騎着馬巡迴各地，并在夜間檢閱新入伙的人馬。关于“鞋会”在萊茵河上游和黑

森林散布情况，法庭偵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會員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記錄。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少数貴族，牧师（勒亨鎮本鎮的牧师就在內），以及失了业的雇傭兵。我們从这些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約斯·弗里茨領導之下已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謀的分支組織遍及亚尔薩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直到維尔騰堡和美因河。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討論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領們的集会往往也約当地的會員以及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的哈特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綱領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見）而外不承认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維爾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問宗教事項；凡是所付息金已經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漁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侶每人只能領一份薪俸；沒收僧侶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軍費；廢止一切不公平的賦稅和關稅；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稅；夺取一个坚固城市——夫賴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結起来，立即和皇帝进行談判，倘若皇帝拒絕，就和瑞士談判——以上就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們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預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約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圈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

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襲击夫賴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風声；还有宣傳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賴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綫索，最后由于两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謀被泄露了。侯爵，夫賴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①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許多“鞋会”會員被捕获，被刑訊，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脫了，約斯·弗里茨也在內。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許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繼續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漸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尔薩斯政府最为殘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斬首、車裂、四馬分尸等极刑。約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內萊茵河河岸，但是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會員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說明。次年就是1514年，該年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結果竟然扫除了貴族政府和貴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們还爭到一些特权。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們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統治者，但却被諸侯們有組織的大軍击败，而这种大軍正是在瑞士不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維尔騰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謀組織。档案证明这个組織从1503年起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爾格罗姆巴赫潰敗以后，用“鞋会”的名称过于危險，因此这个組織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

^① 即南阿尔薩斯和布萊斯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总督府。——編者注

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烏爾利希公爵政府的無耻壓迫和促成1513年與1514年騷亂的連年飢饉都使入盟的人數擴大，新頒行的酒稅、肉稅、面包稅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資本稅成了騷亂爆發的導因。朔恩多夫城鑄刀匠卡斯巴爾·普雷吉策爾的家是密謀的首領們集會之處，這個城預定要先奪取過來。1514年春，起義爆發了。3 000——說是5 000——農民開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民用溫和諾言勸說撤退了。烏爾利希公爵在許諾廢止新稅之后就隨帶80騎趕來，而這時由於有了諾言的緣故，一切都已歸于平靜。他許諾召集省議會來審查一切控訴。但是密謀的首領們深知烏爾利希只不過是在對人民行緩兵之計，只待招募到足夠的軍隊并把这些軍隊調集在一起，他就要毀約并強制收稅。因此他們就在卡斯巴爾·普雷吉策爾的家，也就是“勞康拉德總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會的工作，向各處要求派人來參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動這個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義的成就提高了運動在各地人民中間的威信，文書和密使到處受到歡迎，所以5月28日溫特爾圖爾克海姆大會有維爾騰堡所有各地區派來的很多代表參加。大會決議從速繼續進行鼓動，一有機會就在雷姆斯河谷發難，并從此地出動把起義向四面擴大。正當德廷根的一個退伍士兵班特爾漢斯和維爾廷根的一個有聲望的農民辛格爾漢斯勸導汝拉山的居民加入同盟的時候，起義就從各方面爆發了。雖然辛格爾漢斯被襲擊而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溫能登，馬克格倫寧根等城都落入與平民聯盟的農民手中了，從魏茵斯堡到勃勞貝倫，從勃勞貝倫到巴登邊境全部地區都公開暴動了；烏爾利希不得不讓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集省議會，同時却寫信向四鄰諸侯和自由市求

援平亂，信中說騷亂危及帝國境內所有的諸侯和權貴，而且“有儼如‘鞋會’的舉動”。

在這期間，省議會，即各城的代表和許多要求在省議会上也享有席位的農民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圖加特開會了。高級僧侶們還沒有到達，騎士們根本沒有被邀。斯圖加特的城市反對派以及近在咫尺聲勢逼人的利奧堡和雷姆斯河谷兩支農軍都支持農民的要求。農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議會了，會上決議把公爵手下8個為民痛恨的顧問朗帕爾特、薩姆、洛歇爾罷免處死；決議由4個騎士，4個市民，4個農民組成一個參事會輔助公爵，決議給公爵固定的薪俸，決議沒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財產以充國庫。

烏爾利希公爵用政變的手段來對付這些革命的決議。他于6月21日率領他的騎士和顧問馳赴杜賓根，高級僧侶們也隨即趕到這裡。他命令市民們也到這裡來，市民們也照辦了。于是他就在這裡繼續舉行沒有農民參加的省議會。市民們在這裡處於軍隊威脅之下，就出賣了他們的同盟者——農民。7月8日達成了杜賓根協議，這個協議規定公爵的將近100萬債務由國家歸還，而公爵權力則應受若干限制，可是他從未遵守這些限制；協議用一些空泛言詞來搪塞農民，並且以嚴禁暴動與結社的懲治法令來對付農民。至於農民在省議會中的代表權當然更談不上了。農民們聲討這種翻案行為；但是公爵自從等級議會承擔了他的債務以後又能借到款項了，所以他立即招募軍隊，而他的鄰邦，特別是普法爾茨選帝侯，也派來支援部隊。所以到7月底杜賓根協議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誓也重新作過了。只有“勞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進行抵抗；公爵又親身馳赴該地，幾乎被殺。農民營寨在卡培爾堡建立起來了。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數起義者都因缺乏糧食而自行散

去，殘余部分也因為和幾個省議會議員達成一個模稜兩可的協議而回家了。這時各城市因為自己的要求已經達到，就掉過頭來在熱地反對農民，這些城市甘願派一些隊伍去支援烏爾利希的部隊，於是烏爾利希就毀約襲擊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鎮劫掠一空。1600個農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斬首，其餘的大多數被判處沉重的罰款以歸烏爾利希的財庫。很多人長期禁錮獄中。嚴厲的懲治法令頒布了，禁止重新結社，禁止農民的任何集會。士瓦本貴族組織了一個專門的同盟來鎮壓一切起義的企圖。“勞康拉德”的主要首領們幸而都逃到瑞士，並且大多數都在幾年後又從瑞士零散地回家來了。

和維爾騰堡的運動同時，在布萊斯部和巴登侯爵領地也出現了新的“鞋會”活動的征象。6月間在比爾附近曾有起義，但立即被侯爵菲力浦擊潰，為首的古格爾-巴斯提安在夫賴堡被捕并被斬首。

就在1514年這一年春天，在匈牙利也爆發了一次全面的農民戰爭。當時正進行着一場十字軍討伐土耳其的宣傳，並且和往常一樣，凡是參加十字軍的農奴和依附農都可獲自由。將近6萬人集合起來，由格奧爾格·多札任指揮。他是塞克列人³¹，曾在以往的土耳其戰爭中顯露頭角，並因此取得貴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騎士和貴族們都極不願有十字軍討伐之舉，因為討伐之舉不免奪去他們的財產和農奴。他們向一些農民隊伍追趕上來，用武力把他們的農奴搶回去，並加以虐待。當這件事在十字軍中傳開時，被壓迫的農民們怒不可遏。兩個最熱烈的十字軍傳教牧師，拉弗連齊和瓦爾納瓦的革命講演在軍中更加激起對貴族們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隊一樣痛恨反叛的貴族；十字軍變成了革命軍隊，他親

自来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里的晚膳³²，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五路。两路被派到匈牙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①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扎波路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②进发。但是，正当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

① 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

② 罗马尼亚称作，的密察拉。——编者注

敗了，約翰·扎波路率領特兰西瓦尼亞軍隊向多札進擊。農民隊伍被扎波路擊潰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燒紅的寶座上炙烤，他的部下都被強迫來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饒命。潰散了的農民被拉弗連齊和霍蘇重新集結起來，但是又被擊破，所有落入敵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絞死。成千的農民屍體沿路掛起，或者掛在一片焦土的村落入口處。據說，被死或被殺的農民有6萬人。貴族們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議會上把奴役農民再度定為國法。

同一時期中在“文地什邊區”(就是克倫地亞，克萊納和施梯里亞)①爆發的農民起義是由一個“鞋會”一類的秘密團體組織起來的。這個地區慘遭貴族和帝國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鐵騎的蹂躪，受盡飢饉之災，早在1503年就建立了這個秘密團體，並且曾引起起義。這個地區的斯洛文尼亞農民和都國農民一樣在1513年就又舉起«stara prava»(“舊權利”)的戰旗。這一年他們再度接受招安了。在1514年，當他們更加聲勢浩大地集結起來的時候，由於馬克西米利安皇帝聲明同意恢復“舊權利”，他們又接受勸告四散回家了。可是1515年春，一再受騙的人民就格外憤激地起來展開復仇戰爭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樣，各處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搗毀，農民法官將被俘的貴族判罪斬首。在施梯里亞和克倫地亞，欽命將軍迪特利希施坦把起義很快就撲滅了。在克萊納，只是在襲擊賴因城(1516年秋)以後又採用了不亞於匈牙利貴族的無恥行為的奧地利式的殘忍手段才把起義鎮壓下去的。

① 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亞的別名。克倫地亞和施梯里亞兩地都是今奧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邊境地區；克萊納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奧地利邊境地區。——譯者注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1517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始终把1513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4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³³提出的纲领就像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詠诗作家³⁴，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纲领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显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

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色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圍繞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貴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團結在路德周圍；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出場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間的尖銳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閔采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諸侯、騎士和城市的軍隊（絕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傾向路德的分子組成的），則击潰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貴族即企图以反对諸侯和僧侶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經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間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經讲过 16 世紀初叶德国貴族处于何种地位。他們正在淪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諸侯和僧侶諸侯的附庸。同时他們也看出，正和他們沒落的步調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沒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許多独立自主的諸侯王国。他們明白他們的沒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沒落是一致的。还須指出，貴族，尤其是帝国直轄貴族，由于他們的軍人职业以及他們在和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級。当时貴族是最有民族意識的等級；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統一，他們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騎士等級普遍地不滿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滿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軟弱无力，这种軟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繼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連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滿意外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滿意德国的諸侯勾結外国。

反對帝國政權。貴族們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總合成改革帝國這一要求，而改革帝國就要以諸侯和高級僧侶作犧牲品。進行這個總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貴族理論方面的代表人物烏爾利希·馮·胡登，他是和貴族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蘭茨·馮·濟金根一起進行這個工作的。

胡登以貴族的名義提出的改革帝國的要求是很明確很激進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廢除一切諸侯，要將教會主權和產業全部還俗，要建立以君主為首的貴族民主制，大約就像從前的波蘭共和國極盛時代的情況一樣。胡登和濟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軍人階級即貴族的統治建立起來，把分裂國家的禍首即諸侯都廢除，把僧侶的權力都取消，把德國從羅馬教權統治下解脫出來，就可以使帝國重新統一，自由和強盛。

以農奴制為基礎的貴族民主制，例如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國在最初幾百年間所存在的那種形式略有不同的貴族民主制，都是屬於最原始的社會形態中的一種形態，以後都很自然地發展成為完備的封建等級制度，而封建等級制度顯然已經是更高的階段了。所以純粹的貴族民主制在16世紀的德國是不可能的事。貴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為在德國已存在著強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國那種使封建等級君主制轉變成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低級貴族和城市的聯盟。德國的舊貴族都保存下來了；英國舊貴族卻被薔薇戰爭³⁵消滅得只剩下28家，並為資產階級出身和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新貴族所代替了。在德國，農奴制還依然存在，貴族們的收入財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國，農奴制幾乎完全廢除了，貴族就是單純的資產階級地主，其財源是資產階級性的收入，地租。最後，專制君主

的中央集權制，在法國自路易十一以來就由於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產生並且日臻完備；而這種中央集權制在德國則絕不可能，因為在德國根本沒有或只有極不完備的實行民族中央集權制的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胡登越努力實際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須作的讓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國改革計劃的輪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貴族與諸侯周旋，日益顯得無能為力，可見得貴族靠自己是不夠力量完成改革大業的。貴族需要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農民以及聲威遠播的改革運動理論家。但是城市深深領教過貴族，絕不會信任貴族，絕不肯和貴族建立任何聯盟。農民身受貴族敲骨吸髓的剝削和虐待，理所當然地要認貴族為他們的死敵。那些改革運動的理論家不是跟着市民、諸侯走，就是跟着農民走。貴族們主張帝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貴族的地位，那末他們能夠有什麼好處許給市民和農民呢？在這種情況之下，胡登也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在他的宣傳文件中絕少提到或絕口不提貴族，城市和農民將來的相互關係問題，他把一切罪惡都歸之諸侯和僧侶以及對羅馬的依賴關係，並且勸說市民為自身利益計也應在未來的諸侯和貴族的鬥爭中至少要保持中立。關於廢除農奴制以及農民對貴族的負擔，胡登都一字不提。

— 當時德國貴族與農民的關係間 1830 年和 1846 年的暴動中波蘭貴族與他們的農民的关系完全一樣。和現代的波蘭的起義中的情形一樣，當時在德國只有一切反對黨派結成聯盟，尤其是貴族要與農民聯盟，才能使運動成功。但是恰恰這種聯盟在兩方面的情況中都是不可能的。貴族既沒有到不得不放棄政治特權以及在農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權利的地步，革命農民也不會根據還很渺茫的

希望就和貴族，也就是壓迫他們最厲害的這一等級結盟。和1830年波蘭的情形一樣，1522年的德國貴族已爭取不到農民了。除非完全廢除農奴制和依附農制，取消一切貴族特權，才有農村人民和貴族聯合的可能。但是貴族和一切特權等級一樣，絲毫不願自動地放棄特權，放棄特殊地位，放棄其收入來源的絕大部分。

於是到鬥爭爆發的時候，貴族畢竟是以孤軍與諸侯搏鬥。諸侯在過去兩百年間不斷奪取貴族的地盤；在這一當也就輕而易舉地制服貴族，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鬥爭過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認為德國中部貴族政治軍事首領的濟金根於1522年在蘭都組成一個以6年為期的萊茵、士瓦本、法蘭克尼亞貴族同盟，聲稱是為自衛而組織的。濟金根一半靠自己籌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騎士聯合起來組成了一支軍隊，他在法蘭克尼亞，萊茵河下游，尼德蘭和威斯特伐里亞組織了招募兵員和部隊增援的工作，並於1522年9月向特利爾選帝侯大主教宣戰，開始敵對行動。但當濟金根進抵特利爾城郊的時候，他的增援部隊被諸侯迅速出兵截斷，黑森伯爵和普法爾茨選帝侯都馳援特利爾，濟金根不得不退守蘭德施土爾城堡。胡登和其友竭力求援，可是聯盟的貴族被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動吓倒，食言不救濟金根。濟金根身負重傷，然後放棄蘭德施土爾，隨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並於幾個月後死於蘇黎世湖中的烏福瑞島上。

鬥爭失敗，兩位領袖身死，貴族力量作為一個不依附於諸侯的獨立集團被粉碎了。從此以後，貴族只得為諸侯服務和聽從諸侯指揮。此後不久即爆發的農民戰爭迫使貴族更深地投入諸侯直接的或間接的庇護之下，同時也證明了德國貴族寧肯在諸侯統治之

下繼續剝削農民，却不願意公然和解放了的農民結盟來打倒諸侯和僧侶。

五

自從路德對天主教會等級制度宣戰，把德國一切反對派分子都發動起來的時刻起，沒有一年農民不起來照樣重提自己的要求。從1518到1523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農民起義接踵而起。自從1524年春天以後，這些起義都帶有系統性了。這一年4月馬赫塔爾修道院的農民拒絕徭役和貢賦；5月聖布拉濟廷農民拒絕履行農奴義務；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農民宣告不願繳納什一稅以及其他賦稅；7月和8月圖爾部農民起義，但是一則由於蘇黎世人的調停，再則由於瑞士當局處決了很多人，進行殘酷鎮壓，起義又被平息下去。最後在伯爵領地施圖林根爆發了一次更為堅決的起義，這次起義簡直就可算作農民戰爭的開始。

施圖林根農民突然拒絕向伯爵繳納貢賦，集合成強大隊伍並在布爾根巴赫的漢斯·彌勒統率下於1524年8月24日開往瓦爾茨胡特。他們在此和市民聯合創立了一個新教兄弟會。這些市民所以很願意促成此種聯合，是因為他們當時正在反對奧地利邊区政府³⁶對他們的牧師巴爾塔扎爾·胡布馬伊埃進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馬斯·閔采爾的友人兼弟子。這個同盟組織規定每星期要收3個克里澤的盟捐，就當時而值論是巨大的數目，還派遣密使到亞爾薩斯，摩塞爾，整個萊茵河上游以及法蘭克尼亞去到處吸收農民入盟，宣告同盟的目標是要消除封建統治，破壞所有城堡寺院，消滅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統治者。盟旗是德意志三色旗。

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貴族恐慌万状，他們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們无計可施，只好借談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即以“燒杀擄掠”³⁷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詭計，就已开始了。貴族和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間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們对付散漫而难于組織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諸侯，貴族和帝国城市結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却沒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繼續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烏拉赫和福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3500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貴族可以調动的不过1700人，而这1700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貴族被迫进行停战談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这成停战協議。貴族答应与农民訂立善意的条約，或者直接由双方訂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訂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查所有的申訴。貴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協議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些条款都很温和。他們要求廢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賦稅和一般的領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貴族又要求他們繼續履行全部在爭議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決定。农民当然拒絕这个要求，并要这些領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問題。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諸侯和貴族也集中了他們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部之外深入到維尔騰堡地区。瓦尔梅堡的格奥尔格·特魯赫澤

斯就是農民戰爭中的阿爾巴^①，他統率的軍隊監視農民，襲擊個別增援隊伍，但不敢進攻主力。格奧爾格·特魯赫澤斯和農民首領進行談判並且還零星地達成了一些協議。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開始審理案件。農民對法庭全由貴族組成提出抗議，而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讀了一份皇帝的詔書³⁸。審理拖延時日，而貴族，諸侯，士瓦本聯盟當局都在這期間休整備戰。此時斐迪南大公除統治着當時還是奧地利的世襲領土外還統治着維爾騰堡、巴登黑森林和亞爾薩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殘酷的手段對付造反的農民。他下令要對農民加以拘捕，嚴刑拷打，定殺無赦，用盡一切方法消滅他們，要把農民的家業燒毀，要把農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見諸侯和貴族是如何實行停戰，而他們所了解的善意的調停和審查農民的申訴究竟是什麼了。斐迪南大公從奧格斯堡富豪威爾塞家族借來款項，急速地整頓軍備，士瓦本聯盟還規定要分3期募齊捐款和兵員。

以上這些起義恰恰發生在托馬斯·閔采爾在南方高原地區³⁹逗留的5個月期間。關於他對運動的爆發和進程會有影響這一點，固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這種影響間接地完全可以證實。農民中較堅決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擁護他的理想。當時的人都認定“十二條款”和高原地區農民的“書簡”(Artikelbrief)都出自閔采爾之手，其實至少十二條款肯定不是閔采爾制訂的。閔采爾在回圖林根的途中還發出一個堅決革命的文告給起義的農民⁴⁰。

這時自從1519年起就被逐出維爾騰堡的烏爾利希公爵也想借農民之助實現他的奪回本邦疆土的陰謀。他自被逐以來就力圖

^① 阿爾巴是尼德蘭屬西班牙時西班牙派來壓迫尼德蘭人民的統治者。——譯者注

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1520到1524年间在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森林-赫顿农军和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1525年2—3月），2月9日，农民就在乌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在舒森，由于斋戒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满分子，上阿尔部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7000人之多。肯普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2月26日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此已经暴露出来。3月7日12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尔部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部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波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在下阿尔部，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德

堡地區，在特魯赫澤斯領地，農民也起義了，而且早在3月初就發動了。這支下阿爾都農軍有7000人之眾，駐在烏爾察赫附近。

這4支農軍都接受了梅明根條款，這個梅明根條款比赫部農軍的條款還要溫和得多，而且在牽涉到武裝農民對貴族和政府的態度的各點上也表現得顯然缺乏果斷。農民有時也有的一點果斷，都是在戰爭過程中，當他們對敵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領會之後，才表現出來的。

與這些農軍同時，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農軍。農民從烏爾姆直到多瑙維特的整片地區，從伊勒，羅特，比伯爾幾條河谷來到萊普海姆，並在此建立了營寨。15個地方的有作戰能力的男人都來了，從117個地方派來了增援部隊。萊普海姆農軍的領袖是烏爾利希·雪恩，他的講道牧師是萊普海姆牧師雅科布·韋埃。

所以在3月初，士瓦本北部6處營寨約有3萬至4萬起義農民武裝起來了。這些農軍的品質是很複雜的。革命派——閩采爾派——在各軍中都只占少數。這一派人數雖少，可是在各處都形成農民陣營的核心和骨幹。農民希望以威脅態度去迫使貴族讓步；只要貴族對農民保證讓步，農民群眾總是願意和貴族達成協議。再則當事情曠日持久而諸侯軍隊又迫近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戀戰，而那些手中還有些東西怕受損失的農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還有到處流浪的流氓無產階級大批加入農軍，這些流氓無產階級分子敗壞紀律，敗壞農民士氣，而且經常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就此已足以說明為什麼農軍一開始就各處都只取守勢，各營寨都士氣低沉，說明這些農軍即使撇開他們戰術的缺陷和良將稀少兩點不論也絕對不是諸侯軍隊的敵手。

還在農軍進行集結期間，烏爾利希公爵就帶着募集的軍隊和

一些赫部農民從霍恩特威爾向維爾騰堡襲擊。如果農民此時從另一方面進攻瓦爾德堡的特魯赫澤斯·馮的軍隊的話，士瓦本聯盟就完了。但是由於農軍只取守勢，特魯赫澤斯竟能立即和巴爾特林根農軍，阿爾部農軍以及湖軍協議停戰，進行談判並訂期于Judica〔鳩迪加〕禮拜日（4月2日）⁴¹這一天解決此次事件。在這期間他就能夠進擊烏爾利希公爵，占領斯圖加特，並迫使烏爾利希公爵于8月17日就已重行撤離維爾騰堡。然後他回師直指農民，但是在他自己的軍隊中的僱傭兵竟抗命拒絕進擊農民。特魯赫澤斯對嘩變士兵加以安撫，穩定了軍心，於是將軍隊開往烏爾姆，在烏爾姆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監視部隊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爾赫海姆。

士瓦本聯盟終於抽出手來並糾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攤的兵員，於是拋棄假面具，宣稱它“決心依指武器和上帝的幫助來對付農民們的無法無天的舉動”⁴²。

在這期間農民們嚴格遵守停戰協議。他們為Judica禮拜日的談判擬定了他們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條款”。他們要求由公眾來選舉和罷免僧侶，廢止小什一稅，並將大什一稅⁴³除了支付傳教士俸給之外其餘數目都用于公共事業，廢除農奴制、漁獵特權與死亡稅，限制過分的徭役、賦稅與地租，歸還強占公眾及個人的林地、牧場與特權，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為現象。由此可見在各農軍中溫和妥協派還大占優勢。革命派以前在“書簡”中早已提出綱領。這封致全體農民的公開書簡要求全體農民加入“基督教同盟與兄弟會”，要求他們或者通過和平手段——“這大概是辦不到的”，或者通過暴力來取消一切負擔。書簡還用“世俗的斥革”來威脅所有拒絕加入的人，這就是說，誰拒絕加入就和誰斷絕

社交，斷絕他和同盟成員的一切來往。所有的宮城、寺院和教堂都須同樣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來處理，除非貴族、僧侶和修道士們自動離開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們一樣遷住普通房屋並且還加入基督教同盟。這項激烈的宣言顯然是在1525年春起義之前擬定的，它的主題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現存統治階級，而“世俗的斥革”僅意味着壓迫者和叛徒應該處死，城堡應焚毀，寺院教堂沒收，其所藏財寶均須換成現金。

然而在農民還未及把十二條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們已聽到士瓦本聯盟毀約而且軍隊已經迫近的消息。他們立即採取措施。阿爾部人，巴爾特林根人和湖軍農民在蓋斯伯倫召開了一次大會。4支農軍混合起來，改編成4個縱隊；還決議沒收僧侶財產，變賣他們的財寶以充軍費，焚毀他們的城堡。於是“書簡”也和正式的十二條款一起成了他們指導戰鬥的準則，而約定要來締結和約的Judica 禮拜日却成了總起義的日期。

各處群情日益激昂，農民和貴族之間的地方性衝突繼續不斷地發生，6個月來在黑森林的暴動日益擴大並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區和雷赫河地區的消息，這一切就足夠說明何以在德國^{3/4}地區農民暴動會迅速地接二連三地發生。同時，所有各處的暴動同時發生這一事實就證明領導運動的人們就是通過再洗禮派以及其他密使來組織運動的那些人們。在維爾騰堡地區，在尼喀河下游，在奧頓瓦爾德，在下法蘭克尼亞和中法蘭克尼亞都是在3月後半月就已爆發騷亂了；而各處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4月2日這個Judica 禮拜日為總暴動的日子，各處都已在4月的第一星期裏實行決定性的出擊，實行群眾起義。阿爾部農民，赫部農民，湖軍農民也於4月1日用敲警鐘和群眾大會的辦法把所有有作戰能力的男人

都召集入營，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开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6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起义。在諾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的革命党派以**安东·福尔奈尔**为首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日至7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去。在洛騰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騰堡城里名門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馮·門欽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曖昧的。在**维尔茨堡**教会⁴⁴轄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在**班騰**主教轄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內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集結成强大的**比尔德豪騰**农民陣营。

在**奧頓瓦尔德**，風暴在3月26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領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貴族，曾任**霍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倫堡**的旅店主。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騰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加入了。在各处援軍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梅茨勒**統領全軍于4月4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尼喀河谷**的农民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肯根**的旅店主**叶克来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們于**Judica** 礼拜日在**弗萊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希普勒**率領一批党羽騰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

来了。在雪恩塔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組織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組成华美军。华美军約 8 000 人兵力，有炮和 3 000 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华美军并且組成黑軍，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騰堡和艾林根地方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組成的精銳部队。

維尔騰堡官方派駐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維希·馮·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問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剛剛来到的莱普海姆农軍敗北、雅科布·韦埃被杀、特魯赫澤斯的殘暴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盖尔猛攻，此城經苦战之后被攻下，路德維希伯爵与許多騎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 4 月 17 日，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和农軍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訊这些俘虏，并判处其中 14 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 front，驅赶他們从刺杀着的核鏢行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們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領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貴族們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們参加了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們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立刻把要他們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領們商量是否要拥圭茨·馮·貝利辛根为領袖，“因为他可能把貴族們拉到他們这一边来”。这个建議获得贊同；而弗洛里安·盖尔在农民和首領們的这种情緒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黑軍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流动在維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毀城堡和僧侶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軍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

的帝國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門望族對峙的是市民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反对派。这个革命的反对派和农民有秘密瞭解，他們在一次騷亂过程中于4月17日就已打开城門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农民領袖們帶領他們的人占領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盾現款，还提供了一队志願軍。只有僧侶們和条頓騎士团⁴⁵的产业遭到洗劫。22日，农民們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地农軍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軍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結成联盟的名門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上风，他們对任何坚决的步驟都加以阻撓，只等待着諸侯軍隊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張胆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頓瓦尔德进发。4月24日，圭茨·馮·貝利辛根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沒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后来又去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白軍（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軍相对而言）总指揮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們不放心地監視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領們的意見行事，不許他作任何未得首領們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帶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赫，他們在此从4月30日停留到5月5日并掀起整个美因茲地区的叛亂。貴族們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們的城堡；只有寺院都被焚燒洗劫了。农軍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們都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占領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貴族妥协的农軍中

呆下去。急欲和貴族諒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組农軍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傭兵，取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經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訓練而又武装起来了的兵員。可是全軍大会把这两点建議都否決了；农民們已經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当，既然如此，雇傭兵的竞争对他們就不合适，而且他們只要把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顧問汉斯·柏林要求农軍的首領和顧問們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有的一些尖銳詞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順請願的口吻。这一次这件事情連农民們都受不了；农民們大嘩，拒絕同意这个“陈情书”，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間維爾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轉折。4月初农民暴动剛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維爾茨堡附近設防的弗勞恩堡并馳书各方求援无效，終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代表出席的省議會。但在任何結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证实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議會立即散会，造反的市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間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盖尔和黑軍就已来到維爾茨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軍，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洛騰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組成的。5月7日圭茨·馮·貝利辛很也率領華美白軍来到，并开始圍攻弗勞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8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軍，即盖尔多夫农軍或称普通華美軍。这支农軍来勢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許多寺院和城

堡都燒毀，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還強迫所有的農民跟着走，強迫所有的貴族，甚至連林普爾格的酒保們，都加入基督教兄弟會。6月初這支農軍向維爾騰堡進擊，但被勸誘撤退。德意志小國林立的割據狀態在當時也和1848年一樣，很少給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動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塊領土上的蓋爾多夫農軍，在這塊土地上戰勝了一切反抗之後，必然要自趨瓦解。他們和格繆德城達成協議，並只留下500武裝農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普法爾茨，4月下旬就在萊茵河兩岸都有農軍建立起來。他們破壞了許多宮城和寺院，並於5月1日占領哈特高地的紐施塔特，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來的布魯赫萊茵農民已經迫使斯拜爾城締結協定。馮·哈貝倫元帥僅有少數選帝侯部隊，無法對付農民，5月10日，選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農民締結協定，他在協定中向農民保證要開一次省議會來祛除農民的各種負擔。

在維爾騰堡，起義很早就在個別地區爆發了。在烏拉赫阿爾卑斯山區，農民們早在2月間就已結成同盟來反對僧侶和領主，8月底，勃勞貝倫農民，烏拉赫農民，閔辛根農民，巴林根農民，羅森斐爾德農民，都起義了。蓋爾多夫農軍在戈賓根附近，叶克來恩·羅爾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擊敗的萊普海姆農軍殘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侵入維爾騰堡境內並掀起農村人民的騷亂。在其他地方也爆發了嚴重的騷亂。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不得不向農民投降。奧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狽不堪。這個政府根本沒有錢，軍隊也很少。各城市各城堡處境極劣，既無守軍，又無軍火。甚至阿斯貝爾山也幾乎高無防禦。

政府企圖征集各城市的後備軍來對付農民，結果倒使它自己陷於一吋手足無措之境。4月16日波特瓦征集的後備軍拒絕開

拔，不去斯圖加特，却走上波特瓦^①附近的弗倫施坦山，他們在此形成一個市民農民陣營的核心，而且發展迅速。同一天，查伯爾部的暴動也爆發了；毛爾布朗寺院被洗劫，許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為平地。許多增援隊伍從鄰近的布魯赫萊茵趕來入伙。

弗倫施坦山上農軍首領由馬特恩·費爾巴哈爾擔任。費爾巴哈爾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對派領袖之一，富於妥協性，是出於不得已才跟農民走的。在此期間他仍然還是很溫和，他阻止對各城堡實行“書簡條款”，他處處謀求農民和溫和派市民之間的融洽一致。他阻止維爾騰堡農民和華美白軍聯合，後來還勸說蓋爾多夫農軍退出維爾騰堡。由於他傾向於市民，他曾於4月19日被撤換，但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為首領。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4月22日叶克來恩·羅爾巴赫帶着200名堅定的弟兄來加入維爾騰堡農民隊伍的時候也沒有其他辦法，只有讓費爾巴哈爾留任下去，由他自己來嚴格監視他的行動。

4月18日政府試圖和弗倫施坦山上的農民們進行談判。農民堅持政府必須接受十二條款，而政府的全權代表們自然不能同意這個要求。於是農軍開始行動。20日農軍抵勞芬，並在此地最後拒絕了政府代表的提議。22日，農軍有6000人之眾進抵比梯海姆，並威脅着斯圖加特。此城政府官員大半逃走，由一個市民委員會來主持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樣，存在着名門望族、市民反對派、革命平民三派。後面的兩派於4月25日向農民打開城門，斯圖加特立即被占領。此時維爾騰堡暴動農民已自稱為華美基督教農軍，這支華美基督教農軍的組織工作就是

① 亦即格羅斯-波特瓦。——編者注

在斯图加特城完成的；薪餉，战利品分配以及給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規章。脫伊斯·格爾伯領着一队斯图加特軍来加入了农軍。

4月29日，費尔巴哈尔率領整支农軍去抵擋在朔恩多夫附近侵入維爾騰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軍，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因而就劝說盖尔多夫农軍撤退了。費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农軍中由罗尔巴赫領導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顧忌的盖尔多夫农軍会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到特魯赫澤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魯赫澤斯，并于5月1日駐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軍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們細述其他各批农軍情况（图林根与黑森，亚尔薩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們不可不先报道特魯赫澤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特魯赫澤斯在这个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軍作战，后来就得到許多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們曾叙述到特魯赫澤斯到达烏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3月末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監視部队由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揮以后，即轉往烏尔姆。特魯赫澤斯的軍团在招集了到烏尔姆来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1万人之众，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軍队。各增援部队汇集烏尔姆进行得很迟緩，一部分原因是在騷乱各邦中征募困难，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錢，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要塞和城堡，所以极难調动。至于不屬于士瓦本联盟的諸侯和城市所能調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我們早已見到。所以一切都視格奥尔格·特魯赫澤斯率領的联盟軍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間，巴尔特林根农軍已开始在里德周圍地区搗毀城堡

和寺院，特魯赫澤斯首先就轉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軍。农民們在联盟軍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繞道逃出沼澤地带，渡过多瑙河，奔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軍队主要力量的騎兵和大炮对农民們无可奈何，特魯赫澤斯就不再追他們了。他进击莱普海姆农軍。莱普海姆农軍有5000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在敏迭尔河谷，有6000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們正掀起全区暴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3支队伍进取烏尔姆。看来此时在这些农民中間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軍作战也沒有什么把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魯赫澤斯进行談判。但是特魯赫澤斯这时已有足够的軍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軍主力并完全击潰了它。雅科布·韦埃和烏尔利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領袖被俘斬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經過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征服了。

特魯赫澤斯的雇傭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額外粮餉而嘩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魯赫澤斯的軍事行动，一直到4月10日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軍，这支农軍在这期間正侵入他的領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圍攻他的各处城堡。特魯赫澤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間是分裂的，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軍也完全击潰了。农軍殘部由僧侶弗洛里安率領向湖軍方面撤退。于是特魯赫澤斯又轉而进击湖軍。在这期間，湖軍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13日在薩勒姆寺院召开大軍事會議，決議迎击特魯赫澤斯。各处立即响起警鐘，在伯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1万人，还有被击败的巴尔

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部农军和赫部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于是他于4月17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部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25 000—30 000人的4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赫部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部农军也被他们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部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略河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我們曾經敘述到由馬特恩·費爾巴哈爾率領的維爾騰堡農民駐在特克附近的基爾赫海姆，而由特魯赫澤斯留在此處交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揮的監視部隊則撤到烏拉赫去了。費爾巴哈爾在一度企圖攻取烏拉赫沒有成功之後即轉往紐廷根，并向鄰近所有暴動農軍求援，以便進行決定勝負的一戰。果然從維爾騰堡平原地區以及從葛伊都有可觀的增援部隊來到。特別是有兩支強大的農軍開拔前來了，這兩支農軍是由葛伊農軍以撤退到維爾騰堡西部的萊普海姆農軍殘部為核心集結起來，並從整個尼喀河谷和納哥爾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奧堡都掀起暴動，他們於5月5日在紐廷根和費爾巴哈爾會師。特魯赫澤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這些聯合起來的農軍接觸。他們的人數，他們的大炮和他們的陣地都使特魯赫澤斯震驚；特魯赫澤斯立即用其慣技開始談判並和農軍們締結了一個停戰協定。當農民們的警惕性剛一受到麻痹的時候，他就於5月12日還在停戰協定期間襲擊農民，迫使農民進行決定勝負的一戰。農民們進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後由於市民階級的叛變，伯勃林根落入特魯赫澤斯之手為止。農軍左翼因此失却根據地而陷入包圍之中。於是勝敗之局決定了。沒有嚴格紀律的農民們陷入混亂狀態中，隨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聯盟的騎兵殺戮或俘虜的人也丟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華美基督教農軍完全瓦解了，整個維爾騰堡的暴動也隨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脫伊斯·格爾伯逃往埃斯林根，費爾巴哈爾逃往瑞士，叶克來恩·羅爾巴赫被俘，並被解至涅卡爾加塔赫，特魯赫澤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圍堆滿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燒死，特魯赫澤斯本人和他的騎士們在旁宴飲取樂，欣賞這種貴族的活劇。

特魯赫澤斯從涅卡爾加塔赫侵入克萊赫部以支援普法爾茨選

帝侯的軍事行動。普法爾茨選帝侯在此期間集結了部隊，在接到特魯赫澤斯獲勝的消息後立即對農民毀約而於5月23日襲擊布魯赫萊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後攻下并燒毀了馬爾施，洗劫了許多村子并占領了布魯赫薩爾。特魯赫澤斯同時還襲擊艾賓根并俘獲當地運動的領袖安東·埃森胡特，選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12位農民領袖一起處死。布魯赫萊茵和克萊赫部於是被平定，還被勒索了將近4萬盾。特魯赫澤斯的軍隊經歷以上各戰役之後減為6000人，選帝侯的軍隊是6500人，這兩支軍隊聯合起來向奧頓瓦爾德前進。

伯物林根失敗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處在起義者之間散布開來。陷於農民高壓之下的各個帝國自由市忽然又都輕鬆起來。海爾布朗是第一個採取步驟和士瓦本聯盟妥協的帝國自由市。海爾布朗有農民辦公室，各農軍代表正在這裡商討以全體起義農民名義向皇帝和帝國提出的建議。這些商談本來是要達成一個普遍適用於整個德國的建議案，在這些商談過程中再度表明沒有一個等級已經發展成熟到足以能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來革新整個德國局面，連農民等級也沒有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事情捩得很清楚，要達到上述目的，不得不爭取貴族，尤其是不得不爭取市民等級。文德爾·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談的領導權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爾·希普勒在運動的所有領袖們中間是最正確地認識到現狀的。他不是像閔采爾一樣的有遠見的革命家，也不是像梅茨勒或羅爾巴赫一樣的農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經驗，他在實踐中得到的對於各個等級相互間的地位的知識，都使得他不會只代表卷入運動的等級中的一個等級來反對其他等級。閔采爾是當時處於現存一切正式社會關係之外的那一階級的代表人物，也就是無產

階級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爾·希普勒可以說是全民族的一切進步勢力的中間狀態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闕采爾預測到共產主義的情形一樣，文德爾·希普勒預測到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他所主張的一些原則，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雖然都不是立刻可以實現的，但是他的這些原則和要求卻是封建社會的當前解體狀態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結果；而農民們一旦決心來為整個帝國制定法律草案的時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這些原則和要求而外別無他法。所以農民們所要求的中央集權制就在海爾布朗採取了一種更為確定的形式，這種形式與農民們對中央集權制的想法有天淵之別。例如，這種中央集權制在統一幣制和度量衡，在廢除帝國境內關稅等方面規定得更仔細些，簡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遠比符合農民的利益為多的各種要求上規定得更仔細些。所以對貴族作了許多讓步，這些讓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贖買辦法，其最終目的是要轉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總而言之，農民的要求一經概括到一個“帝國改革”方案中去以後，這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階級的當前要求為依歸，也必然是從屬於市民階級的最終利益。

正當這個帝國改革方案還在海爾布朗進行辯論的時候，“十二條款陳情書”的作者漢斯·柏林已離城迎接特魯赫澤斯，以名門望族和市民階級的名義談判本城投降問題。城里反動派的陰謀活動支持了這一叛逆行動，文德爾·希普勒不得不和農民們一起逃走。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圖在此招集維爾騰堡農軍殘部和少數有戰鬥準備的蓋爾多夫農軍。但是普法爾茨選帝侯和特魯赫澤斯又迫近了，他又不得不離開此地而去維爾茨堡發動華美白軍。聯盟部隊和選帝侯部隊此時征服了整個尼喀河地區，迫使農民們重新宣誓效忠，焚毀了許多村鎮，凡曾逃跑而被他們俘獲的農民都被刺殺或

殺死。為了報復黑爾芬施太因被殺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毀無遺。

在維爾茨堡近郊聯合起來的農軍這時包圍了弗勞恩堡，并于5月15日，在還沒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壘進行勇猛的沖鋒，這次沖鋒失敗了。在戰場里留下了400名最優秀的人員，或死或傷，多半屬於弗洛里安·蓋爾軍中的人。兩天以後，即17日，文德爾·希普勒來到并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他提議只留4000人在弗勞恩堡，而將全部約2萬人之眾的強大主力部隊就在特魯赫澤斯的眼前開到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勞特海姆立下營寨，所有的增援部隊就可以集中到這里來。這個計劃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團結群眾和人數眾多才能希望打敗此時已有13000人之眾的諸侯軍隊。然而農民中軍心渙散和士無鬥志的情形已經過於嚴重，已沒有進行任何堅決果敢的軍事行動的可能。圭茨·馮·貝利辛根在此以後不久就公開變成叛徒，他可能對阻礙農軍的行動出過不少力氣，因而希普勒的計劃就從未實現。計劃沒有實現，而各農軍倒像往常一樣陷入分裂狀態了。直到5月23日華美白軍在法蘭克尼亞農民答允盡速接應之後才行動起來。26日，駐在維爾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軍隊在接到侯爵^①已對農民開始敵對行動的消息以後都被調回來了。圍城軍殘部和弗洛里安·蓋爾的黑軍一起在離維爾茨堡不遠的海丁斯斐爾德陣以待。

華美白軍于5月24日來到克勞特海姆，很少準備戰鬥的姿態。許多人在此地聽說他們的村子在此期間已經投效特魯赫澤斯了，就以此為口實而回家去了。農軍更向尼喀蘇爾姆開去并于5月28日和特魯赫澤斯談判。同時派出驛使到法蘭克尼亞，亞爾薩

^① 統治安斯巴赫和巴萊特各侯國的勃蘭登堡卡季米爾。——編者注

斯和黑森林-赫部农軍处要求火速馳援。圭茨·馮·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开回艾林根。农軍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馮·貝利辛根也在行軍中途不見了；他輕騎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利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魯赫澤斯談过了。在艾林根附近，由于謬傳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慌万状；农軍秩序大乱，紛紛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費了大力才糾集約 2 000 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間，法兰克尼亚征集的 5 000 人的农軍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叛卖目的而安排的从側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軍計劃，这支农軍和華美軍並沒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華美白軍占領着的小城正被特魯赫澤斯圍攻。法兰克尼亚农軍于夜間到达并已看見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領袖們沒有胆量，不敢襲击，而且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們就在这里見到華美白軍殘部。尼喀苏尔姆既无人解圍，就于 29 日向联盟軍投降了，特魯赫澤斯立即处决了 13 个农民，然后追逐农軍，一路燒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魯赫澤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礫，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軍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魯赫澤斯从側翼压迫向陶伯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們有 8 000 人和 32 門炮，他們就在此地严陣以待。特魯赫澤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偷地迫近他們，派遣几路人馬包抄过来，于 6 月 2 日以优势兵力向他們猛烈襲击，結果农民們尽管对各路人馬都进行了最頑强的抵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潰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騎兵来消灭造反軍的，这支騎兵在农民們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們，把

他們完全擊潰，然後一個個地殺死了他們。究竟特魯赫澤斯用他的騎兵進行了怎樣一種戰爭，在農民軍中的300個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可作證明。這300個市民在戰鬥中間被殺得只剩15人，而這15人中有4人後來還被斬首了。

特魯赫澤斯壓伏了奧頓瓦爾德、尼喀河谷和下法蘭克尼亞農民之後，他還進行掃蕩，焚毀所有村莊，處死無數農民，平定了全境，然後開往維爾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蘭克尼亞農軍由弗洛里安·蓋爾和格萊哥爾·馮·布爾格-貝恩海姆率領正停留在祖爾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這支農軍進擊。

弗洛里安·蓋爾自從猛攻弗勞恩堡未成以來主要是從事於和諸侯及各城市，特別是和洛騰堡城及卡季米爾·馮·安斯巴赫侯爵談判他們加入農民兄弟會的事，談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敗的消息打斷。弗洛里安·蓋爾的農軍就和格萊哥爾·馮·布爾格-貝恩海姆率領的安斯巴赫農軍合而為一。這支農軍是新近才建立起來的。卡季米爾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倫方式在他的境內制止農民暴動，一半用花言巧語，一半用大軍威脅。任何外地農軍，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臣民參加，他就對他們完全保持中立。他總設法把農民的怨恨引向教產方面去，然後企圖在一旦教產還俗時從中漁利。同時他不斷準備武裝，伺機而動。伯勃林根之戰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對他境內的造反農民進行戰鬥，劫掠焚毀了許多村莊，殺了許多農民。然而農民迅速集結起來，並在格萊哥爾·馮·布爾格-貝恩海姆指揮之下於5月29日在溫茨海姆附近打敗了他。當農民還正向他追擊的時候，受重壓的奧頓瓦爾德農民求援的消息來到，農民立即向海丁斯斐爾德開去並從此地和弗洛里安·蓋爾一起又開往維爾茨堡（6月2日）。農民在此地很久未得

到奥頓瓦尔德方面的消息，就留下 5 000 人，而以 4 000 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都走散了。他們听信了訛傳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不料就在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魯赫澤斯的襲击，結果大敗。特魯赫澤斯的人馬照例慘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糾集他的黑軍殘部 600 人杀出重圍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鎮。200 人占領了教堂及公墓，400 人占領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軍追击而来，一支 1 200 人的馬隊攻占此鎮并放火焚燒教堂；未被燒死的农民，又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軍把城堡的殘破牆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被掩蔽在一塔內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軍把这第二塔牆也击垮了，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鋒，終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脫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軍包圍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擄 17 人。弗洛里安·盖尔和很少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圍，轉投盖尔多夫农軍，这支农軍这时又集結了 7 000 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傳來，这支农軍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糾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 6 月 9 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軍襲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魯赫澤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給弗劳恩堡被圍者，此时他就向維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軍队于 6 月 7 日就把此城連同駐扎在內的 5 000 农民一起包圍起来，并于次晨不費一兵一彈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門。由于維尔茨堡“名門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軍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領袖都被俘。特魯赫澤斯立即将 81 人斬首。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諸侯接踵来到維尔茨堡，有維尔茨

堡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氓蹂躏，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18个人，在马克特-毕格尔斩了43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冯·门钦根逮捕起来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曖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他们16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13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秩序。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部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部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相当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8000农民集结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哈贝伦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7

月7日魏森堡被占領，此地的起義就告結束。

此時在所有的農軍中只剩下兩支未被征服，赫部-黑森林農軍與阿爾部農軍。斐迪南大公已經用這兩支農軍來進行陰謀詭計。和卡季米爾侯爵以及其他諸侯利用起義來吞併教會領地和諸侯領地的情形一樣，斐迪南大公極力利用起義來擴大奧地利王室的勢力。他已和阿爾部農軍首領瓦爾特·巴赫和赫部農軍首領布爾根巴赫的漢斯·彌勒談判過，要求他倆指使農民宣告加入奧地利方面；兩個首領雖然都是買得通的，可是他倆在農軍中也不能為所欲為，只能做到阿爾部農軍和斐迪南大公協議停戰並對奧地利保守中立，如此而已。

赫部農軍從維爾騰堡地區撤退途中破壞了一批城堡並從巴登侯爵境內取得一些援軍。他們於5月13日向夫賴堡進軍，於18日開始襲擊此城，28日此城投降，他們高舉旗幟開入城內。他們由此地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爾開去並與兩城守軍長久進行小規模戰爭，但無戰果。兩城以及貴族和鄰近各城都根據魏茵加騰條約乞援于湖軍農民，而湖軍中以前曾造過反的農民竟有5000人之眾起來反擊自己的盟友。這些農民的地方狹隘性竟強烈到如此地步。只有600人拒絕戰鬥，要加入赫部農軍而被殺害。然而赫部農軍也被買通了的布爾根巴赫的漢斯·彌勒誘使放棄圍攻，漢斯·彌勒隨即逃走，而農軍也大半潰散。殘部借希爾青根隘道深溝高壘以自衛，7月16日，在此被抽調前來的官軍擊敗並被消滅了。瑞士數城出面為赫部農軍斡旋繙成和約，然而和約終未能使漢斯·彌勒免于殺身之禍。漢斯·彌勒雖有背叛農民之功，仍在勞芬堡被捕斬首。在布萊斯部，夫賴堡也於此時（7月17日）背棄了與農民的同盟，而且派軍隊來對付農民；然而由於諸侯軍力微

弱，在此也于9月18日締成奧芬堡條約⁴⁶，宗德部亦參加在內。黑森林的8個集團和克勒特部農民都還沒有解除武裝，此時為馮·祖爾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起義，于10月間被擊潰。11月13日，黑森林農民被逼訂立條約⁴⁷，12月6日，萊茵河上游起義的最后一个堡壘瓦爾茨胡特城陷落。

阿爾部軍自從特魯赫澤斯撤軍以來又向各寺院城堡進擊并對聯盟軍隊的蹂躪進行猛烈的報復。他們遇着的官軍為數不多，這些軍隊只能進行零星小規模的襲擊，決不能深入森林追擊他們。6月，在一向還相當中立的梅明根城爆發了反對名門望族的運動。這次運動只是偶然碰上幾支聯盟部隊臨近，並且及時趕來支援這些城市貴族，才被壓制下去了。平民運動的傳教士和領袖沙佩勒爾逃往聖加倫。此時農民開抵城郊，正欲襲擊城垣，適接特魯赫澤斯從維爾茨堡發來的消息。6月27日，農民分兩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奧伯君茨堡迎擊特魯赫澤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圖把農民爭取到奧地利王室一邊來。他根據他和農民締結的停戰協定，要求特魯赫澤斯不要再向農民挺進。可是士瓦本聯盟命令特魯赫澤斯進攻農民，只是不許放火濫燒；然而特魯赫澤斯心中有數，儘管他很有可能把這些從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連三暴行慣了的雇傭兵控制住不許放火，但是他決不放棄他的這種首要的而且最起決定性作用的戰爭手段。農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①河為掩護設防，有23000人之眾。特魯赫澤斯面對農民陣綫布陣，有11000人。兩軍陣地都很堅強。馬隊在當前地勢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說特魯赫澤斯的雇傭兵在組織、軍需供應和紀律方面優于農民，那末阿爾部

① 今稱洛伊巴斯。——編者注

农军却有大量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經驗的軍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7月19日联盟軍开始炮轰，20日双方繼續炮战，都无战果。21日，格奥尔格·馮·弗龙茲堡率領3000雇傭兵来加入特魯赫澤斯的队伍。弗龙茲堡認識农軍中許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軍官，他就和他們联系商談。在軍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巴赫，許多旧軍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們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彈药儲藏毁于炮火，并劝說农軍作迂迴运动。但是农軍刚一离开原来的坚固障地，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魯赫澤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謀預設的埋伏。农軍的指揮者就是这些叛徒，他們此时托詞进行偵察离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軍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軍全被击潰，第三路农軍是由路易巴斯的克諾普夫率領，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路农軍在肯普騰附近的柯倫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魯赫澤斯包围起来了。特魯赫澤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們，他切断农軍的給养綫，并即放火焚燒周圍約200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士气。飢餓和眼見家室被焚的景象，終于迫使农民降服了(7月25日)。立即被处死者有20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諾普夫是这路农軍的唯一領袖，他不堅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經過长期监禁之后，被处被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結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托馬斯·閔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自2月底或3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繆尔豪澤，

此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爆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而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⁴⁸。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

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⁴⁹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政府的经验——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⁵⁰——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繆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

了的。可是在實際上繆爾豪森仍然還是一個共和制帝國直轄市，擁有幾分民主化的政體，擁有一個處於市民大會控制之下的由普選產生的參議會，擁有一個草草組成的貧民救濟機構。當時的新教市民們一聽說推翻現社會都談虎色變，所謂推翻現社會，事實上從未超出提前建立後來的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軟弱而不自覺的嘗試的範圍。

閔采爾本人似乎感覺到了他的理論和他的直接周圍的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他的天才看法在他的大批擁護者的不開通的头腦中越是遭到歪曲，他就越發不能不覺察出這條鴻溝。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熱忱來組織並擴大運動；他向各方面發出書信，派遣心腹使節。他在書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熱，這股狂熱與自己早期的寫作相較也很令人驚訝。閔采爾所寫的革命小冊子中青年天真的風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慣用的思想家的平靜練達的筆調也再看不到了。閔采爾此時已完全成為革命的預言者；他不斷煽動群眾對統治階級的仇恨，他激發最狂野的熱情，並且只用舊約預言者吐露宗教狂熱和民族狂熱的那種猛烈的語調來說話了。從閔采爾此時努力以求的作風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響的民眾究竟是處於什麼樣的文化水平了。

繆爾豪森的榜樣以及閔采爾的鼓動都迅速傳播遠方。在因林根，在艾希斯費爾德，在哈茨，在薩克森公爵領地，在黑森與富爾德，在上法蘭克尼亞，在福格特蘭德；農民到處起義，集結成農軍並焚毀城堡寺院。閔采爾一般被公認為整個運動的領袖，而繆爾豪森仍然是運動的中心。此時在愛爾福特有一個純市民的運動獲得勝利，在此占統治地位的黨派仍然繼續對農民採取搖擺不定的觀望態度。

在图林根諸侯們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4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利浦邦伯，新教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加谴责。菲利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5月3日击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赫和朗根萨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穆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8000人，有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都极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諸侯們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①的这座山上，以车垒⁵¹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了。諸侯們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諸侯們的要求。

^① 即战斗山。——編者注

一个騎士和一个僧侶表示贊成投降；閔采尔立刻將兩人帶到圍圈中間，當場斬首。堅決革命的人們歡呼贊成這一當機立斷的恐怖行動，這一行動使農軍又略為鎮定一些；但若不是發現諸侯雇傭兵在包圍全山之後不顧停戰協議而以密集隊形攻上山來的話，那末農軍最後還是會絕大部分不戰而逃的。農軍在車輛後面迅速展開陣勢，但是炮彈和槍彈已向半無防禦而又不慣作戰的農民射擊，雇傭兵已進抵車壘前面了。經過短暫的抵抗之後，車輛陣綫就被突破，農民的大炮被奪，農民被擊潰了。他們狂奔亂竄地逃跑，結果就更加容易落入包圍部隊和騎兵的手中，這些部隊殺他們橫尸遍野，血流成河。8 000 農民中有 5 000 人以上被殺；其餘逃往弗蘭肯豪森城中，而諸侯的騎兵也和他們同時進城。此城失守。閔采尔頭部負傷，在一間房子裡被發現而就擒。5 月 25 日，繆爾豪森也投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費爾逃走了，但在愛森納赫地區被擒。

閔采尔在諸侯面前被嚴刑拷問，然後斬首。他以生平的大無畏精神從容就義。他被害時至多不過 28 歲。普法伊費爾也被斬首，此外還有其他無數的人也被斬首。在富爾德，那位“博愛的”黑森的菲力浦，開始製造血案；他和赫克森諸侯下令用劍殺死造反的人，在愛森納赫殺死 24 人，在朗根薩爾查殺死 41 人，弗蘭肯豪森戰役以後殺死 300 人，在繆爾豪森殺死 100 人以上，在蓋馬爾附近殺死 26 人，在丘恩格達附近殺死 50 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殺死 12 人，在萊比錫殺死 8 人，至於只被打成殘廢的，受刑更輕的，以及城鎮村莊被洗劫被焚毀的事，就不必提了。

繆爾豪森喪失了帝國自由市主權而被併入薩克森領土，正如富爾德修道院轄區被併入黑森邦伯領地一樣。

諸侯們率軍穿行圖林根森林，此時從比爾德豪森營寨開來的法蘭克尼亞農民已經在此和圖林根農民會合，並焚毀了許多城堡。雙方會戰於梅寧根城下，農民被擊敗，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閉門不納他們，並要從背后进攻他們。軍因盟友的倒戈而驚惶失措，於是向諸侯投降，並且還在談判過程中就已潰散了。比爾德豪森陣營早已解散，因此這支軍潰散以後，薩克森，黑森，圖林根，上法蘭克尼亞的暴動隊伍的最后殘余就被消滅了。

亞爾薩斯的起義比萊茵河右岸的起義爆發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轄區的農民快到4月中才揭竿而起，他們起來之後，上亞爾薩斯和宗德部農民就跟着起來。4月18日，一支下亞爾薩斯軍洗劫了阿爾多夫寺院；另外幾支軍在艾伯斯海姆和巴爾附近以及在維勒河谷和烏比斯河谷建立起來了。這些軍很快就集中起來組成了下亞爾薩斯農民大軍，並開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壞寺院。各地每8個男人就要征一人編入軍。這支軍的十二條款較之士瓦本法蘭克尼亞軍的要激進得多⁵²。

下亞爾薩斯軍的一路人馬於5月初集中在聖伊波利特附近，企圖奪取此城而沒有成功，但於5月10日取得貝爾肯，13日取得拉波茨魏勒，14日取得賴辛維爾。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下取得的。此時第二路人馬由艾拉茲姆·格爾伯率領出發奇襲斯特拉斯堡，但沒有成功，於是這路人馬轉向佛日山進發，破壞了毛爾閣斯泰爾寺院並進攻薩比林，此城於5月13日向軍投降。他們由此地向洛林邊境進發，並在毗連邊境的這一部分公爵領地上引起騷亂，同時他們就在山區各關隘布防。在薩爾河畔的哈爾比茨海姆附近和紐堡附近都有龐大的營寨建立起來；在薩爾格閣德附近有4000洛林德國農民布防；最後還有兩支軍先頭

部隊掩护前綫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軍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支是克勒堡农軍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則延伸到上亚尔薩斯农軍所在地。

上亚尔薩斯农軍从4月20日开始行动，已于5月10日迫使祖尔茨，12日迫使格布魏勒，15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結盟。奥地利政府和周圍的帝国直轄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們，但是力量太弱，不能對他們进行頑强的抵抗，更不消說向他們进攻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薩斯到5月中旬都落入起义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薩斯农民的官軍已經迫近了。这些官軍是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貴族統治复辟了。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領一支3万人的軍队出发了，这支軍队里有法国貴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倫巴第，希腊，阿尔巴尼亚援軍。5月16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4000农民接触，不費气力就把农民打败，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領的薩比林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軍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協議就被撕毀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傭兵襲击，絕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亚尔薩斯农軍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薩斯农軍进击。上亚尔薩斯农軍曾經拒絕开到薩比林支援下亚尔薩斯农軍，此时就在舍尔維勒附近遭到洛林官軍全軍猛击。他們抵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30000对7000——而許多騎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賴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們虽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薩斯农軍被彻底击败而潰散了。于是公爵以习用的殘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薩斯全境。只有宗德部未蒙公爵光顧，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

爵請到國內來，威脅本國農民於6月初締結恩集斯海姆協定。但是奧地利政府自己立即又破壞了這個協定并把運動的宣教者和領袖成批地絞殺。農民們於是重新起義，這次起義到宗德部農民加入奧芬堡協定時(9月18日)才告結束。

現在只剩奧地利阿爾卑斯地帶的農民戰爭還須報道。這些地帶以及毗鄰的薩爾茨堡大主教轄區都是自從恢復 *stara prava* (舊權利) 運動以來始終處於反對政府和貴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義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橫征暴斂促使起義爆發。

薩爾茨堡城在農民和礦工支持之下，自從1522年以來就因本城的城市特權以及宗教爭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結怨了。1524年底，大主教以募得的雇傭兵襲擊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異教宣教者。同時他還征課新的苛稅，因此激怒全體居民達于極點。1525年春，全境農民和礦工與士瓦本，法蘭克尼亞起義和圖林根起義同時突然起事，組成農軍，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澤爾為首領，解放了此城，并圍攻薩爾茨堡城堡。他們和西德農民一樣結成一個基督教同盟，并把他們的要求編成條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條⁵³。

在施梯里亞，上奧地利，克倫地亞和克萊納，新的非法的捐稅，關稅和告示嚴重地損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農民也於1525年春起義。農民們奪取了許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敗 *stara prava* 運動的征服者老將革迪特里希施坦。雖然政府故弄玄虛，居然招安了一部分起義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團結，并和薩爾茨堡農民聯成一氣，因而整個薩爾茨堡地區以及上奧地利，施梯里亞，克倫地亞，克萊納等地的絕大部分都在農民和礦工的掌握中。

在提羅耳，改革教義同樣深入人心。關采爾的密使在此地曾經進行活動，其成效甚至比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其他各地更多。

斐迪南大公在此地區也迫害新教義的宣教者，並也以新的專橫的財政措施侵犯居民權利。結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樣，起義也在1525年春爆發。起義者的最高首領是閔采爾派，名蓋斯邁爾，他是全部農民首領中唯一具有軍事天才的人。起義者們奪取了許多城堡並嚴厲懲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①地區是如此。弗拉爾堡農民也起義並參加了阿爾部農軍。

大公從各方面受到壓力，於是接二連三地對造反人民讓步，這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還要用燒殺擄掠的手段加以消滅的呢。他決定召開各世襲領地的省議會，並在議會開會前這個時期和農民締結停戰協定。在這期間他就集結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另外一套語言來對付這些“罪惡多端的人們”。

這個停戰協定自然沒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錢財耗尽了，他開始在公爵封土內進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隊和馬札爾族部隊又肆意對居民進行無恥的蹂躪。於是施梯里亞人民又起義了，他們在7月2日到3日的夜間襲擊迪特里希施坦將軍于施拉明格，把所有不說德語的人都殺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農民們開了一次陪審法庭，並且從俘虜中提出40個捷克貴族和克羅地亞貴族來判處死刑。他們都立即被斬首了。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應了5個公爵封地（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施梯里亞，克倫地亞，克萊納）內各等級的一切要求。

在提羅耳，省議會的要求也獲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堅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議會的軟弱決議，仍然沒有放下武器。在12月里，大公才在這裡用武力恢復了秩序。他毫不猶

^① 意大利稱作：阿迪杰。——編者注

豫地將落入他手中的許多暴亂煽動者和領袖處死了。

8月初，格奧爾格·馮·弗龍茲堡率領1萬巴伐利亞兵向薩爾茨堡開來。這支強大兵力以及農民間出現不和的情況，迫使薩爾茨堡起義者與大主教締結協定，協定在9月1日訂立，也已被大公接受。然而這兩個諸侯在此期間加強軍力到足夠的程度，登時破壞協定，因而又迫使薩爾茨堡農民重新起義。起義農民支持過了冬季，蓋斯邁爾在春季里來到他們這裡，並即對從各方面迫近的官軍展開輝煌的戰鬥。在1526年五六兩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連三地把巴伐利亞軍，奧地利軍，士瓦本聯盟軍和薩爾茨堡大主教雇傭兵都打敗了並且迫使各敵軍長久不能匯合。在這期間蓋斯邁爾還找到機會去圍攻拉德施塔特。最後由於被優勢敵軍從各方面包圍起來，他不得不退却，殺出重圍，率領殘部由奧地利阿爾卑斯山中穿過到達威尼斯境內。威尼斯共和國和瑞士成了這位不屈不撓的農民領袖進行新密謀的據點；他活動了一年之久，想把這兩國卷入對奧戰爭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是重新掀起農民起義。可是正在洽商這件事的過程中，他竟死於刺客之手。只要蓋斯邁爾還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薩爾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們收買了一個匪徒，這個匪徒竟於1527年使這位危險的造反人物脫離人世了。

七

蓋斯邁爾退到威尼斯地區以後，農民戰爭的最後一幕就告結束了。各處農民重新陷入他們的教會領主、貴族領主或城市貴族領主的奴役之中，各處和農民締結的協定都被撕毀，勝利者對戰敗

者極盡掠奪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當的負擔更加重了。德國人民進行的最偉大的革命嘗試，以忍辱失敗而告終了，而且暫時還使壓迫倍增。然而從長遠看來，使農民階級處境更加惡化的還不能說是起義被鎮壓下去這件事。凡是貴族，諸侯，僧侶們能夠年復一年地從農民身上榨取到的東西，在戰前就都已榨取到了；當時德國農民從自己的勞動產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額，僅限於維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續後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資料，這一點是和現代無產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說來農民身上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榨取的了。許多富裕中農自然是破產了，大量依附農淪為農奴，整片的公社地產被沒收，大批農民由於家宅被毀，田園荒蕪，飽經禍亂，流浪四方，或變為城市平民。但是戰爭和禍亂成為當時的家常便飯，農民階級痛苦已深，而捐稅還在增加，使他們的生活狀況繼續惡化。以後各次宗教戰爭以及連綿不斷毀滅生命財產的三十年戰爭使農民遭受災難之慘重遠遠超過農民戰爭；尤其是三十年戰爭把用於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勞動力消滅了，同時又有許多城市被破壞了，因此，農民、貧民和破產市民都長期陷入最艱苦的愛爾蘭的貧困境地。

遭受農民戰爭的打擊最大的是僧侶。他們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毀了，他們的金銀財寶被搶劫，不是賣給外國，就是被熔化了，他們的儲備物資都耗盡了。在各處都是他們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針對着他們。其他等級，即諸侯，貴族和市民階級，甚至眼見眾怒所指的高級僧侶處境困難而暗中稱快。農民戰爭使教產還俗以利農民成為通俗的想法，世俗諸侯以及一些城市則極力設法使教產還俗按照對他們最有利的方式來進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級僧侶的產業很快就轉入諸侯或城市貴族手中。

就是僧侶諸侯們的權勢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諸侯們很善于在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們曾看到富爾德修道院長如何從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領主地位降為他的臣屬的情況。所以肯普騰城竟強迫諸侯修道院長將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權廉價地賣給此城了。

貴族也大受打擊。他們的城堡大半被毀，很多最體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諸侯維持生存。他們在農民面前無能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們到處都被擊敗；被迫投降；只有諸侯的軍隊才挽救了他們。他們日益喪失其帝國直屬等級的意義而淪為諸侯的臣屬。

整個看來，城市也沒有從農民戰爭得到什麼好處。名門望族的統治幾乎到處都重新鞏固起來；市民階級反對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舊有的城市貴族的成規慣例繼續維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礙着工商業的發展，一直拖到法國革命時期。諸侯們還認為市民或平民黨派在鬥爭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暫時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對此事負責任。從前已經屬於諸侯領土的城市，於是不得不支付巨額賠款，城市特權被剝奪，在諸侯們奴役之下聽凭勒索（如弗蘭肯豪森，阿倫施塔特，施馬爾卡爾登，維爾茨堡等等），帝國直轄市被併入諸侯領土（例如繆爾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鄰的諸侯的托管，許多法蘭克尼亞的帝國直轄市就是如此。

在這些情形之下，歸根到底從農民戰爭取得好處的只有諸侯。本文一開頭即已談到德國農工商業的發展很差，使德國人統一為一個民族國家沒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區的中央集權化，因而在分裂割據狀態之下代表這種局部的中央集權勢力的諸侯，形成了從當時社會政治關係的任何變動中都必能得到好處的

唯一等級。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侶轄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緩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說，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級从屬於諸侯統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結束的时候只有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諸侯們不仅由于僧侶，貴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們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級拿到 *spolia opima* [主要战利品] 而得到絕對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們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貴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們的統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錢流入他們的金庫，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們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結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敗的原因。

我們已經見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級与等級集团。諸侯和僧侶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貴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貴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級。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們已經見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終于經過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級还是一反条件所許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級发生冲突，而且也和其他反对派等級发生冲突，終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

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服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 $\frac{1}{10}$ ——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

他們自己之間又不一條心，因而一事無成，而且對左右兩面同是反對派的人們都持反對態度。最後可以這樣說：1525年農民之間的地方狹隘性並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之間的地方狹隘性還更嚴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緊跟着也有成百的順利進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國林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後還會夢囈聯邦共和國，那末他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到瘋人院里去。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16世紀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儘管完全類似，却也大有本質的區別。1848年的革命如果沒有證明德國的進步的話，那末卻證明了歐洲的進步。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奧地利與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國地方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如果德國已是分崩離析的話，那末歐洲就更加分崩離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國地方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一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窄狹範圍之內，甚至不是局限於一個大洲的窄狹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為此次革命舞台的這些國家，對於此次革命的發生，恰恰起作用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覺又無心無

意的原料，要在現在全世界都參加的這一次運動的進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這一次運動在我們的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它結果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從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

弗·恩格斯寫於1850年夏

載於1850年《新萊茵報》
《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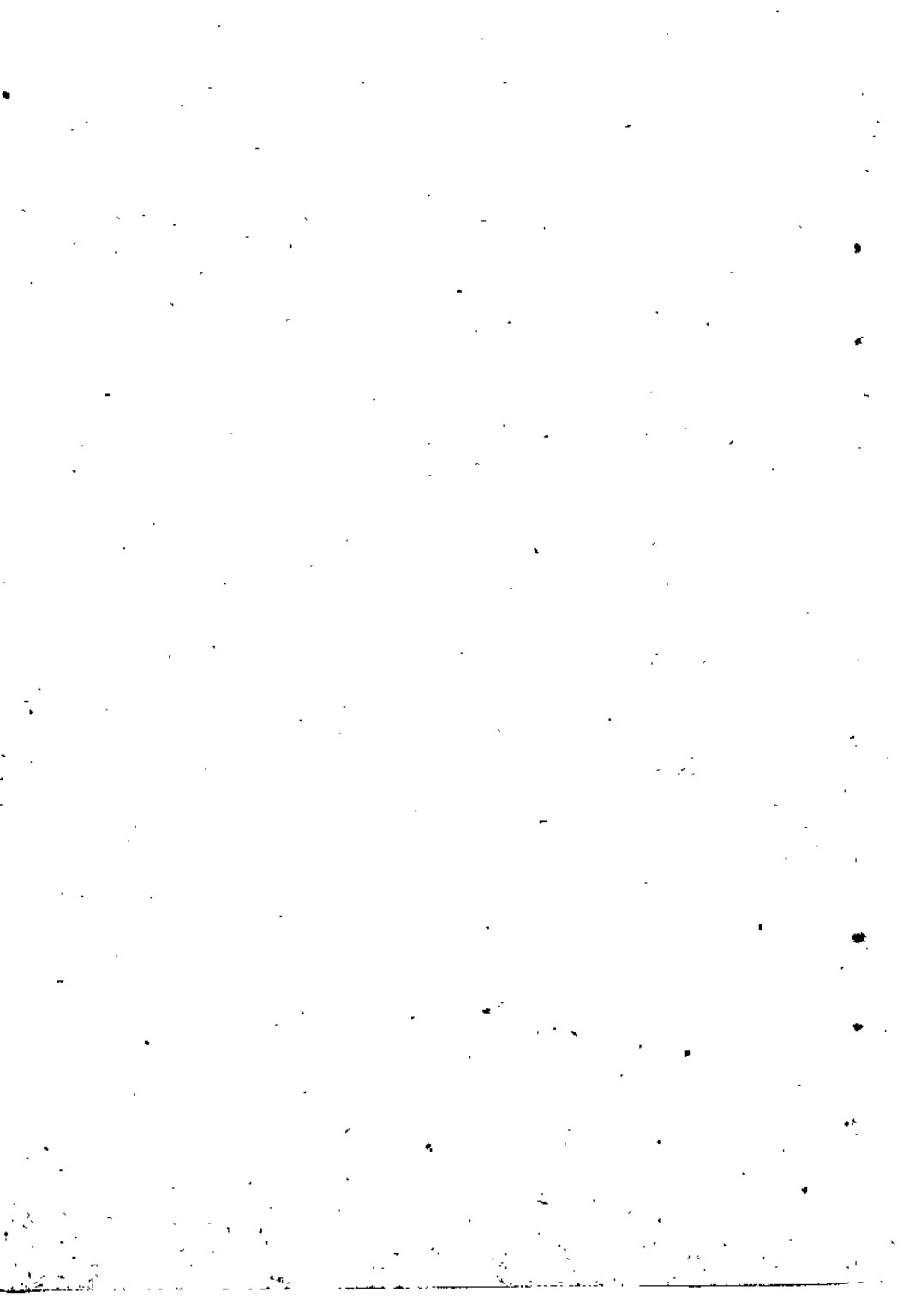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1875年版，該版
原文并根據《新萊茵報》
《政治經濟評論》的原文和
1870年版校對過



附 录



恩 格 斯

馬 克

在德国，一直到現在，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靠着种地来生活，像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相信社会主义的工人，并且通过了他們，还有农民們，就有必要弄清楚，当前的土地所有制度，不管地产的大小，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就有必要拿当前雇农的貧困和当前小农的債務奴隶境遇，跟古代的财产共有制来对比一下。那时，土地是一切自由人的共同财产，是一种祖傳的自由土地，这对于他們大家來說，真正可以称得起是一个“祖國”。

所以，我打算对那远古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簡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虽然只有少数可怜的殘迹延續到我們这个时代，但在整个中世紀里，它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而且，那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但在傳意志，就是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底納維亞，也都为它的精神所浸透了。可是，它却全然湮沒于遺忘之中了，直到最近，毛勒(G. L. Maurer)才算把它的真实意义，重新发现出来。

两种自然发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民族太古的历史：一是民族按亲屬关系来編制，二是土地的共有。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既然这种按部落、亲族、氏族的組織方法是他們从亚洲带

来的，既然在羅馬時代他們的戰鬥序列還是如此構成的，就是，凡屬有近親關係的人總是並肩作戰，所以，當他們占領萊茵河以東和多瑙河以北這一帶新領土的時候，也是同樣受着這種組織方法的支配。在這個新的地區里，每一個部落都定居下來了，但他們的定居，決不是任意地或偶然地，而是像凱撒所明明白白指出的那樣，系依據部落成員的血統關係住下來的。血緣關係較近的一個較大的集團，分配到一定的地區，在這個地區里面，包括着若干家庭的一個一個氏族，又按村落的形式定居下來。幾個有親屬關係的村落，構成一個百戶(Hundertschaft,在古高地德意志語為 huntari,在古北歐語為 heradh)；幾個百戶構成一個區(Gau)；全部的區合在一起，便是民族(das Volk)自身了。凡是村落沒有占有的土地，都歸百戶支配；凡是沒有分配給百戶的土地，都歸區掌握；此外，如果還有可以自由處理的土地——這在多數場合之下，面積都是很大的——則歸全民族直接占有。例如，我們在瑞典，就可以看到這幾種層次不同的土地共有制同時并存着。每一個村落都有村落共有地(bys almänningar)，村落共有地以外，還有百戶共有地(härads)、區或州共有地；最後，還有，作為全民族的代表者，由國王所占有的民族共有地，在這裡，叫做 konungs almänningar [王有地]。不過，所有這些，連王有地在內，都無差別地稱為 almänningar, Allmanden, 即共有地。

古代瑞典的這種共有地制度，就它在劃分等級的細致這一點來看，顯然是屬於較晚的發展階段的；如果說，在這種形態之下，它曾經在德國存在過，那它一定早就消滅了。由於人口急劇的增加，在劃歸每一個村落的很廣闊的地面上，也就是說，在每一個馬高(Mark)里面，母村之外，不久又產生出一批女村來，這些女村，作

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較小的村落，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馬克公社。因此，我們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都是由較多或較少的村落联合起来，构成一个馬克公社的。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戶或区那样較大的馬克团体；最后，整个民族，为了管理留給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領土以内的下級馬克，从最初的时候起，便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大規模的馬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帝国征服了萊茵河东岸德国土地的时候为止，馬克公社的重心似乎都是在区这一級，区似乎就成了那时的真正馬克公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夠說明，为什么在帝国正式划分地方行政区域的时候，会有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馬克，又以法院管轄区的名义，重新出現。不过，此后不久，古老的大馬克就开始分裂了。但是，在迟至 13 世紀或 14 世紀的法律，即在所謂“皇律”（Kaiserrecht）里面，通例还是，一个馬克包括六个到十二个村落。

在凱撒时代，至少大部分的日耳曼人，即所謂苏汇維人，还没有定居下来，他們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这所謂共同耕作，从其他民族的情形加以类推，就是包含着若干具有近亲关系家庭的各个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給它們的土地，并把收获到的产物分配于各个家庭，不过这土地还是要年年更換的。但苏汇維人在我們公历纪元开始前后，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凱撒之后一百五十年）只說到土地是由各个家庭分別耕种的。分配給各个家庭耕种的土地，期限也只是一年，一年之后，土地还要重新分配、重新更換。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們在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高林山

脈 (Hochwald) 之中,在所謂 Gehöferschaften [合亩制]^① 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已經不是一年分配一次了,但是每隔三年、六年、九年或十二年,总要把全部垦种的土地,不論是耕地或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的«Gewanne» [大块],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的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給有权的人。所以,每一个成員,在每一个大块之中,也就是說,在每一位置与土质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到了現在,这每一块份地,由于折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經是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份地,依然构成了一个标准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半份、四分之一份、八分之一份等等份地而积的大小。沒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是共同占有、共同利用的。

这样的太古制度,一直到本世紀 (19 世紀) 初叶,还保存在巴伐利亚莱茵普法尔茨 (Rheinpfalz) 的所謂抽签摊分地 (Losgütern) 这种制度之中;自从那时以后,其中的耕地,业已变成各个成員的私有财产了。就是在合亩制之中,人們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那种周期的分配,把交替的占有权,变做私有财产,对他們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四十年之内,纵然不是全数,至少大多数的合亩制,都已經死灭了,变成了耕种小块私有土地农民的普通的村落,只不过还共同利用森林和牧场而已。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乃是宅地。住宅的不可侵犯性——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开始于游牧民族的篷車,經過了定居农民的木屋,然后才逐渐轉变为一种对于家宅的完全所有权。这在

① 合亩制,是我国海南島黎民原有的一种近乎原始共产制度的名称,因和古代日耳曼人这种制度内容相近,故拿来作为它的譯名。——譯者注

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了。自由的日耳曼人的家宅，一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从馬克之中分离了出来，因而馬克的公职人員不許进去，成为逃亡者安全的避难所；这是我们在后世的馬克章程里可以看到的，而且，有一部分，在由 6 世紀到 8 世紀之間陸續写定的民族法典里，老早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

在塔西佗死后四百年到五百年之間，我們在民族法典中看到，耕种的土地，虽然还没有成为个别农民绝对的自由财产，但已经可以世襲了，农民有权自由处理，或者出卖，或者用其他方式轉移产权。关于此种转变的原因，我們找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日耳曼尼亚本土的范围以内，除了上述实行完全土地共有制的閉鎖的村落以外，还有另一种村落，在这种村落里面，不单是宅地，就是耕地，也从共有财产中，从馬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襲财产，分配給个个的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說，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柏喜山岳地带的狭谷里，或者在窄狭而平坦的山背上，两边都是沼澤地，像威斯特伐里亚那样的情形。以后，在奥登林(Odenwald)山脉之中以及在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情形也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村落都是由分散的孤立的庭院构成的，每一个庭院的四圍，都为它所有的耕地圍繞着。就是在现在，也还是这样。耕地的互换，在这里，簡直可以說是不可能的。所以，留給馬克的，只有周围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后来，当自由处理家宅和庭院的权利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可以把它們轉让于第三者的时候，这类庭院的所有者便占到了很大的便宜。想要同样享受到这种利益的心願，可能促使那实行耕地共有制的許多村落也渐渐停止了习惯上的定期分配办法，因

而使馬克成員們的各块份地，同样地成为可以继承和轉让的产业。

第二，征服的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羅馬的領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的财产（而且还是羅馬法上所說的那种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的征服者，絕不可能把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土地占有形式完全廢除。耕地与草地之世襲的私人占有制跟羅馬法之間的关系，至少在旧日的羅馬領土上，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为它出面作证，那就是，一直保存到我們这个时代的耕地共有制的残余，恰恰都是发现在莱茵河左岸，換言之，都是在被日耳曼人所征服、而且业經彻底日耳曼化了了的地区。当法兰克人5世紀时在这里住下的时候，耕地共有制一定还保留在他們中間，否則我們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合亩制和抽签摊分地了。不过，就是在这里，私有制不久也占了上風，因为，就可耕地而言，我們在第6世紀里普阿銳人的民族法典里，发现它所举出的土地所有形式，也只有这一种。并且，在日耳曼尼亚內地，我已經說过，耕地不久也变成私人所有了。

不过，日耳曼的征服者，虽然采用了耕地与草地的私人所有制，也就是說，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棄了重新互換耕地的办法（因为問題的实质就在于此，除此以外，并无其他重要的地方），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到处把他們日耳曼族的馬克制度，連同森林和牧場的共有制，还有馬克对于已經分配的土地的監督权，介紹了进来。这不但发生在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的盎格魯撒克森人中間，而且也发生在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安人、法兰西南部 and 面西班牙的西哥德人和意大利的东哥德人及兰哥巴带人中間。不过，在后面所举出的这几个国家里面，就我們所知，差不多只有在高山之中，馬克制度的痕迹才能保存到今天。

在放棄了按期重新分配已耕土地的办法以後，馬克制度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形態，關於這，不僅在第5世紀到第8世紀的古代民族法典里，就是在英國和斯塔底納維亞中世紀的法律書籍里，在13世紀到17世紀的許多日耳曼的馬克規程（即所謂判例集）里和法蘭西北部的習慣法（*Coûtumes*）里，我們都可以碰到它。

馬克公社雖然放棄了在各個成員中間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權利，但它對於它在這些土地上面的其他權利，卻一條也沒有放棄。而這些權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轉交給個人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把它用作耕地和割草地，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的目的。超出這個限度以外，個人的占有者是沒有任何權利的。所以，在地下所發現的財寶，如果它們所埋藏的地方，深到犁頭所不及，那就不歸他所有，本來就是屬於大家的。採掘礦苗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權利，情形也一樣。所有這些權利，以後都叫領主和君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擅自侵占去了。

而且，就是耕地與草地的利用，也是要受到公社的監督和指導的。監督與指導採取如下的形式。凡是實行三田制的地方——事實上，差不多到處都是實行這種制度的——，村落中全部的田地總是分成三個大小相等的農圃，在這三個農圃之中，每一個農圃總是輪流着，第一年用於冬播，第二年用於夏播，第三年休耕。所以，村落每年都有它的冬作田、夏作田和休耕田。在分配土地的時候就注意到，每一個成員的份地都要平均地分配到三個農圃之中，這樣，才能使每一個人都能適應公社耕地強制（*Flurzwang*）的辦法，而不至於感到困難。例如，按照這種辦法，他只許在他的冬作地里進行冬播，等等。

每一年的休耕地，在休耕期間，又成為共同的財產，作為牧場，

供整個公社來使用。並且，其他兩個農園，只要收穫一過，也同樣成為共同的財產，當作公共的牧場來利用，直到下次播種的時候。草地在收穫過第二次干草以後，也是如此。所有用來放牧的田園，占有人應當把上面的籬笆統統去掉。這一種被喚作牧地強制（Hutzwang）的辦法，當然也就限定了，不論是播種或者收穫的時間，都不是可以留給個人自由決定的，必須要由公社或者由習慣為大家作出統一的規定。

一切其他的土地，也就是說，除去家宅與庭院或者已經分配過的村有地以外的土地，還是和原始時代一樣，依然是共同所有、共同利用的。這裡面有森林、牧場、荒地、沼澤、河流、池塘、湖泊、道路、橋梁、獵場和漁場。正如每一個成員從耕地馬克中分到的份地當初都是大小相等的，他們利用“共同馬克”的權利也是相等的。此種利用方法，是由全體成員共同決定的。耕地分配的方法，也是如此；如果一向耕種的土地，不夠用了，大家就可以決定，從共同馬克中再劃出一部分土地來，開墾耕種。共同馬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羊群和用橡實來喂豬。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墊草、漿果和菌蕈；如果有沼地，它就可以供給泥炭。牧場如何利用，木材如何分配，關於這一類問題的規定，構成了從不同的時代里留傳下來的許多馬克判例集的主要內容；這些律例，都是在那古老的不成文的習慣法開始成為爭論對象的時候，陸續寫下來的。依然保留到今天的那些共有森林，就是這些古老的、沒有被分割的馬克的一些可憐的殘余。我們還有這個時代遺留下來的另一種殘余；至少在德國西部和南部，在人民意識中，有一種深深地扎下了根的观念，認為森林乃是共有的財產，在森林里面，每一個人都可以採集花卉、漿果、蘑菇、山毛榉實等等，並且，一般地說，只要他不圍出

什么乱子，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他的主意，他用他那著名的关于采集浆果的立法，硬把德国西部各省拖到了那腐朽不堪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的水平上。

正如馬克成員具有平等的土地份額和平等的用益权，他們当初在馬克以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上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在一定时期，他們在露天之下举行集会，如有必要，还要举行更多的临时集会，商定馬克的事务，并裁判对于馬克的犯罪行为 and 紛爭。这是具体而微的原始日耳曼人的人民大会，而所謂人民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大規模的馬克集会而已。有时也通过法律，不过只在极少的紧急情形之下。也推举公职人員，也檢查公职人員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司法方面。主席只須把問題提出来，至于判决，是由到会的全体成員共同作出的。

馬克制度，在原始时代，在那些沒有国王的日耳曼部落里，可以說唯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貴族，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或在其后不久，沒落下去了，但在他們沒落之前，是很容易配合到这种制度里面去的，这正如伴随这种制度一同自然生长起来的一切东西一样，正如克勒特的氏族貴族，迟至 17 世紀，还能那样容易地适应爱尔兰的土地共有制。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中已經扎下了那样深的根，以致我們在我們民族发展史的任何一个步驟上而，都能够看到它的脚印。在原始时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单单限于司法权力的，而这种权力就是寄托在百戶、区和全部落的民众集会上面。但是，这样的一个民众法庭，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馬克法庭，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它所处理的案件，不单是馬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公共权力范围以內的事情。就是在地方行政区的制度形成以后，虽然国家的地方法庭和普通

的馬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裁判的权力，在这两种法庭里面，还是照旧保留在人民手里的。只有到了古老的人民自由权利已经大部丧失，而且出席法庭和兵役一起，已经成为贫穷了的自由人民难堪的负担，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多数的地方，在地方法庭里，拿陪审法庭^①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对于馬克法庭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影响。恰恰相反。它甚至于还成为中世纪封建庄园法庭的典范。就是在领主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提出问题的人，至于判决者则是臣僕們自己。村落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村落馬克的馬克制度；只要村落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城壕和城墙防守起来，村落制度也就变成城市制度了。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最初的城市馬克制度中演变出来的。最后，中世纪的无数自由结社，尤其是自由行会的组织规程，也都是模仿馬克制度的，虽然这些团体并不是以土地共有制为基础。赋予行会以特权，让它独占一种行业经营的权利，这一种处理方法，和对待一个普通馬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在行会里，也跟在馬克里一样，总是以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还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成员在共同的收益来源上所取得的份额，完全相等，或者至少要尽可能地接近平等。

馬克制度，在这里，在公共生活的极其不同的领域里和对各色各样的要求所发展起来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也同样表现在农业发展过程之中，表现在它跟新兴大土地私有制度的斗争之中。它是随着日耳曼人之定居于日耳曼尼亚而发生出来的；在那个时

^① 这种陪审法庭，不能跟俾斯麦和莱翁哈特(Leonhardt)的陪审法庭混为一谈。在后一种陪审法庭里，判决是由陪审员和律师共同作出的。在古代的陪审法庭里，根本没有律师，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们独立作出的。——恩格斯原注。

候，畜牧还是日耳曼人主要的生活来源，他们从亚洲带来的、已经忘却了一半的农艺，刚刚开始重新抬起头来。通过全部中世纪，在和土地贵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它也终于保存了下来。纵然贵族已经侵占了农民的土地，只要在那里，受奴役的村落的制度还依然是馬克制度（虽然这种制度，由于受到领主的侵蚀，已有很大的改变），在那样的地方，馬克制度总还是需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到下面还要再举出一个例子。只要还有一个共同馬克存在着，它就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可耕地的占有关系；同样，在馬克不复是自由的馬克以后，它也能适应这个共同馬克的极端不同的所有权。它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全部的农民土地，不管是已经分配了的或者还没有分配的，在各国君主自愿的支持之下，差不多全都叫贵族和僧侣们夺去了。但是，馬克制度在经济上显出落伍，作为农业经营形态不复具有生命力，这在事实上，乃是近百年以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农艺成为一种科学、并且引进了完全新式的经营形态以后的事。

馬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全体人民的无限辽阔的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作为礼物，大量的赠送给他们的廷臣、他们的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这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大规模土地占有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了法兰西全境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地说，通过中世纪，在天主教所支配的全部西欧，大体地讲，始终都在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外战，其当然的结果是地产大量的没收，这就把许多农民弄得倾家荡产，所以，早在墨罗温王朝，就已经有许多自由人民不再占有土地了。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了

自由農民的主力。當初，每一個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從軍的義務，並且，不但負責自己的裝備，而且還要在六個月之內，自己維持軍中的生活。毫不足怪，早在查理時代，在五個人中間，事實上，連一個真正能從軍的人，也不容易找到了。在他的後繼者的暴虐的統治之下，農民的自由更加急速地衰退了。一方面，諾爾曼人的侵擾、國王們的永無窮期的戰爭和豪族巨室之間的私鬥，這樣的困境逼迫自由農民一個跟着一個地都去尋找保護主。另一方面，這些豪族們和教堂的貪得無厭，也加速了這種過程；他們用欺詐、諾言、威嚇、暴力，把愈來愈多的農民和農民土地，置於自己權力控制之下。不論在這一種場合或另一種場合之下，農民的土地總是變成了領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不過是叫農民繳納地租、提供徭役，再交還農民來使用。可是，這樣一來，農民卻從自由的土地占有人變做了繳納地租、提供徭役的隸農或者甚至農奴了。在法蘭克王國西部，一般說，在萊茵河西岸，這簡直是通例。反之，在萊茵河東面，卻還有相當多的自由農民照舊保存下來；他們大多數是散居的，只有在極稀少的情形之下，才結合起來，聚居於自由的村落。可是，縱然在這裡，從第10世紀到第12世紀，貴族和教會壓倒一切的優勢，也把愈來愈多的農民逼進奴役境地了。

當一個莊園主——不論是教會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塊農民份地，他同時也就取得了這塊份地在馬克以內的種種權利。這些新的領主，因此就變成了馬克成員；他們對於其他自由的和不自由的成員，甚至對於他們自己的農奴，在馬克以內，原先，在地位、權利上，和大家都是一樣的。但是，不久以後，縱然經過農民執拗的抵抗，在許多地方，他們在馬克以內都取得了種種特權，並且往往迫使整個馬克從屬於其領主的統治。不管怎樣，舊有的馬克

公社仍然延續下来，虽然是在領主监护之下。

在那个时候，馬克制度对于农耕，甚至对于大規模的土地占有还是如何绝对地必要，这可由夫利时人、尼德兰人、撒克森人和莱茵法兰克人向勃兰登堡及什莱西亚的移殖而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人們，从12世紀以后，就在領主的土地上，以村落的形式定居下来；而且，还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也就是說，按照古代的馬克法律而进行的；只要这样的法律还在領主的庄园上保留下来。每一个人都分到了家宅和庭园，在村有地中，有他們的份地，份地的大小全都相等，誰分哪一份，是根据古代的抽签方法决定的；每人都有森林和牧場的用益权，这多半是領主的森林，很少是特別的馬克。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世襲的；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領主的，移住者对于領主，必須世代代提供一定的地租和力役。但这种負担是那样地有限，所以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起德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民来，都要好些。也就因为这个緣故，当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們仍然不声不响。因为他們对于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关系如此漠不关心，他們后来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到了13世紀中叶左右，各处发生了一种对农民有利的决定性的转变。为此事做了准备的，是几次的十字軍远征。許多出征的領主，公开地宣布將他們的农民解放了。其他的領主，有的死亡了，有的失踪了，数以百計的貴族之家消灭了，他們的农民也往往得到了自由。还有一层，随着領主需要的不断增加，支配农民的租賦就远比支配他們的人身重要得多。中世紀初期的农奴制，本来是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許多成分在內的，它所給与領主的权利，現在愈来愈加失去了价值；农奴制在不知不觉之間，慢慢死去了，农奴的地位日益接近于單純的隶农。因为农业的經營仍然完全墨守着

旧法，所以領主要想增加他們的收入，只有開墾新土地和設置新村落。但是，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只有經過跟移殖農民好意的商量，不管他們是自己莊園里的隸農或者是外來的人。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農民的負擔到處都有嚴格的規定，在多數情形之下，這種負擔都是很輕的，他們所受到的待遇也是較好的，尤其是在僧侶的領地里。並且最後，新被招來的移民的优越的地位，反轉來又影響到附近隸農的地位，因此，在全部的北部德國，這些隸農，儘管還繼續為領主服役，但卻獲得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只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魯士的農民还是不自由的。但是這一切並沒有保持多久。

到了14世紀、15世紀，城市急速地興起了，而且很快地富裕了起來。它們的美術工藝和奢侈品的生產發展起來了，尤其是在德國南部和萊茵河畔。城市貴族的豪華生活，使粗食粗衣、陳設簡陋的田舍貴族不能安眠。但是，怎麼樣才能弄到這些美好的東西呢？攔路行劫越來越危險，越來越勞而無功了。可是要去購買，就要有錢。錢卻只有農民能供給。於是就對農民開始了新的壓迫，更高的租額和力役，日益迫切地熱心於再度將自由農民變成隸農，將隸農變成農奴，並且把共有的馬克土地變做領主的土地。在這些事情上面，邦君和貴族是得到了羅馬法學家的助力的。他們把羅馬法的條文，硬套在日耳曼的情況上，而這些情況，大半是他們所不了解的，於是這就引起了無邊無涯的混亂，但這混亂也弄得很特別，就是，領主總是從這混亂之中占便宜，農民們總是吃虧。教會的領主，為他們自己打算，方法更簡便，他們假造證件，借以縮小農民的權利，擴大農民的義務。為了抵抗各邦君主、貴族和僧侶們的這種掠奪行為，從第15世紀末葉起，農民屢次發動了孤立的

起义，到了1525年，就发生了那次偉大的农民战争，壯闊的波瀾把什瓦比、巴伐利亚、法兰克都卷了进去，一直泛濫到亚尔薩斯、普法尔茨、莱茵高和杜林根。在艰苦的斗争之后，农民失败了。从那个时候起，在日耳曼农民中間，农奴制度重又占到了普遍的优势。在爆发战争的地方，农民所剩余的一切权利，現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踐踏，他們的共有地变成了領主的土地，他們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德国北部的农民，由于他們的生活条件較为优越，保持鎮靜，沒有加入这次战争，但也受到了同样的压迫，只不过較为慢一些罢了。日耳曼农民的农奴制，在东普魯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什莱西亚，是从16世紀中叶开始的，在什列斯威、好斯敦，則是从16世紀末叶开始的，并且从都时以后，日益普遍地强加到农民身上。

这种新的暴力行动，除此以外，还有它的經濟原因。宗教改革时代战争的結果，只有各邦的侯王扩大了权力。贵族們拦路行劫这样高贵的行业，現在不行了。如果他們不甘心沒落下去，他們只有从他們的地产里設法弄到更多的收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是仿照邦君、尤其是寺院的榜样，自己至少負責經營一部分的地产。这在过去只是一些例外，現在却成为一种必要了。但是成为这种新式經營方法的障碍的，是所有的土地差不多全都交給納租的农民去耕种了。只有先把这些納租的农民，不管是自由农民或隶农，变成十足的农奴，这些領主們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一部分的农民，正如那专用的术语所說的，必須被“安置”，換言之，不是被撵走，便是被貶为小屋农(Kotsassen, Kossaten)，只住一两間小房，耕种一小块田地，而把他們的田产，合并起来，連成一个大規模的領主农場，并且叫新招来的小屋农和剩余下来的旧有农民拿徭役来耕种。不单是大群的农民干脆就这样給赶走了，而且停

留下來農民所提供的徭役也顯著地增加了，並且還繼續不停地增加着。資本主義的時代，在农村中，便是在農奴制的徭役勞動這個基礎之上，作為大規模農業經營的時代而宣告開始的。

不過這一種轉變，在開頭的時候，是進行得相當緩慢的。恰好，三十年戰爭來到了。在整整一個世代里，德意志為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最無紀律的暴兵縱橫反復地蹂躪着。到處是焚燒、搶掠、鞭打、強姦、屠殺。大軍之外，還有小股的義勇兵，其實，倒不如干脆把他們叫做土匪；他們隨隨便便，自由行動——凡屬有這樣匪軍出現的地方，農民是最倒楣的了。物質的破壞，人口的雕零，是無窮無盡的。當和平到來時候，德國已經不可救藥了，已經被踏碎、被撕破，遍身流血，躺到地下了；最可憐的，當然還是農民們。

占有土地的貴族，如今成為农村中獨一無二的主人了。各邦的君主們恰巧那個時候正在着手取消貴族在等級代表會議中的政治權利，所以也樂得叫他們放手收拾農民。農民最後的抵抗力，已經為戰爭所摧毀了。因此，貴族就可以為了恢復他們已經破產的財政，按照對他們最有利的辦法，來安排农村的關係。不但把那已經拋棄的農民田宅，直截了當地跟領主的農場合併起來，而且農民的追放，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真正大規模地、有計劃地進行的。領主自營的農場越大，當然農民的徭役也越重。所謂“無限制的徭役”時代，又來到了。尊貴的領主們可以隨意命令農民、農民的家屬、農民的耕畜為他們工作，次數的多少，時間的長短，完全由他們決定。農奴制度現在成了普遍通行的制度；自由農民的稀少，正如白色的烏鴉。而為了使這些可敬的領主們得以將農民的任何抵抗，即使是極微弱的抵抗，也要在萌芽狀態中就撲滅下去，他們又從邦君那里取得了領主裁判權，也就是說，他們被派為唯一的法

官，得以审判农民任何細微的过犯和糾紛，甚至于在农民和他、和領主爭訟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領主就成为他自己案件的裁判者了！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統治着农村。跟整个的德国一样，德国的农民，这时沉淪到最深的苦海之中了。跟整个的德国一样，德国的农民，也弄到那样地筋疲力尽，致使任何自救之道都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了。

而这终于来到了。法兰西大革命也为德国和德国的农民带来了一个較为美好的时代底熹微的曙光。革命軍刚刚把莱茵河左岸一占領，那一大堆老垃圾——徭役啦，地租啦，对贵族領主各色各样的献納啦，連同領主自己，真像巫师拿起驅魔仙杖一揮舞，轉眼之間，在那里，全都烟消云散了。莱茵河左岸的农民从此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除此以外，他們还在 Code Civil (法兰西民法) 这一形式之下，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部法典，原是大革命期間所草拟的，后来經過拿破侖的修改方才走了样；这套法律，对于他們新的情况是很适合的，而且，他們不但看得懂，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着。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須要长时期地等待着。不錯，在普魯士，在分所应得的耶納之敗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确是宣布廢除了，而且其余的农民負担，在所謂贖买的名义之下，就法律上說，也有取消的可能了。不过，其中的大部分，而且在很长的期間，仅仅是写在紙面上。至于其他的各邦，情形比这还要差。还得另一次的法国革命，1830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能在巴登和跟法国为邻的其他几个小邦里，推行这种贖买的办法。1848年的第三次法国革命，终于也把德国带动起来一同走，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普魯士的贖买工作距离完成的境地还很远，在巴伐利亚境

內，甚至还根本沒有开始呢！这时，自然进行得快些了；农民这一次自己参加了叛乱，他們的徭役劳动当然也就丧失了一切的價值。

所謂贖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領主叫农民付給他一笔錢或割让給他一块地之后，从此，他就應該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自由的沒有負擔的产业。其实，过去属于領主的全部土地还不都是叫他偷盜来的农民土地！不仅如此。在办理此事的时候，負責处理此事的官吏当然差不多总是經常地和領主在一起的，他們住在領主那里，吃他的，喝他的；所以，就是按照法律的条文來說，农民們也是受尽欺詐，吃了大亏的。

感謝三次的法国革命和一次的德国革命，結果我們总算又有了自由的农民。但是，我們今天的自由农民，比起古代自由的馬克成員来，差別有多大啊！他的农場，在多数情形之下，都要小得多；至于未加分割的馬克，除了极少数大大縮小了的、出息极少的公用森林而外，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但对小农來說，沒有馬克用益权，就不能养家畜，沒有家畜就沒有糞肥，沒有糞肥就不能有合理的农作。收稅吏和紧跟在他后面的那叫人胆战心惊的法院执行人員，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馬克成員沒有听說过的。还有那从事不动产抵押放款的高利貸業者，也是那时所沒有的；农民的田产，現在，一个接着一个地，都落在他們的魔爪之中了。面絕妙的是：这批新起的自由农民，他們的农場和他們的翅膀，既已被剪得这样地厉害，恰巧又降生在一切都異常落后的德国，恰巧降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单是农业科学，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老早已經使得那小規模的农业生产，越来越变成一种落伍的、不复具有任何生存能力的經營形态了。正如机械的紡織业早已排斥了手紡車与手織机，这种新式的农业生

产方法，一定要无可避免地摧毁那零細的农业經營，而用大地产去代替它，只要——它能为此而获得它所需要的充分時間。

因为，全欧洲的农业，在它当前的經營形态之下，已經从美洲的大規模谷物生产那里，受到了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竞争者的威胁了。对于美洲这样天然适于耕种而又經過长期天然施肥的土地，在购买的时候，簡直又花不到几文錢，不管是我們負債累累的小农，或者同样深重地陷于債務之中的我們的大地主，都是无法跟它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經營形态，在美洲竞争之下，节节败退了。农业在欧洲只剩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从事社会主义的經營，为社会的利益而經營。

这就是我們农民的前途。而恢复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农民阶级，尽管它是受过侵害的，却有这样的一种好处，那就是，它使农民得以置身于这样的一种地位之上，在这个地位上，他們，得到了他們的天然同志，工人的帮助，就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們懂得怎样作。

（这篇文章是在1882年12月写的，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的附录，第一次发表在1883年初在瑞士苏黎希城发行的德文版里）

（譯文采自恩格斯：《德國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154頁。刘謙然譯）

二

恩格斯

[論普魯士农民的历史]

沃尔夫《西里西亚的十億》一书序言

为了說明沃尔夫这部著作，我认为必須在它前面先写上几句话。

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山和厉森山以北的德意志地方，是中世紀的后半期从侵入这里的斯拉夫人手里夺过来之后，又被德意志的移民日耳曼化了的地方。分得了这块土地的征服者，即德意志騎士和小贵族們遂以村庄的开基者（Gründer）的資格把自己的占有地划分成田地，把每一块田地又分成大小相等的农民的份地，即胡菲（Hufe）；每一胡菲在本村庄中都有带房屋和园子的宅地。这些胡菲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給移住这里的法兰克（莱茵地方和尼德兰的法兰克人）、薩克森、弗里西安的移民，移民必須为此給开基者，即給騎士和小贵族担负适度的、严格規定的代役租和赋役。农民只要尽到这些义务，他們便可以作自己胡菲的世襲主人；而且他們在开基者（后来的領主）的森林中有放牧、采伐、拾櫛子养猪等使用权，同西德意志的农民在他們公共馬克中所享受的一样。开辟好了的田地必須实行强迫輪种制，并且往往按照三圃制——分为冬

耕地、春耕地、休耕地来耕种。休耕地和收获后的地可以同时作开基者的和农民的家畜的公共牧场。村庄中的一切问题都在同庄人 (Hofgenossen)，即胡菲主人的会议上用多数表决的方法解决。贵族一开基者的权利只限于征收贡赋、在休耕地和收获后的地上放牧、享受森林收益的盈余和做同庄人——他们在人格上都是自由人——会议的主席。这便是从易北河到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农民的平均状态。这些农民的情况，一般地说来，比当时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地方的农民好得多；后者那时已为自己的各种老世袭权利同封建领主进行激烈的、翻来复去的斗争；并且有大部分农民沦入了艰苦备尝的依附状态，这种依附状态威胁着他们的个人自由，甚至完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

14—15世纪时，封建领主日渐增长的货币需要，当然也使得在东北德意志发生了违反契约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行为，但是远没有像南德意志所发生的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大的成效。易北河以东，人口还稀；荒地还多；开辟荒地，扩展耕地面积，建立交纳田租的新村庄，在这里仍然是封建大地主最可靠的致富手段，而且在这里，即在与波兰搭界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些强大的国家，如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选帝侯国 (Kursachsen) (西里西亚属于奥地利)，因此，这里比分崩离析的莱茵地方、弗兰哥尼亚和什瓦本能够较好地维持国内安宁，而贵族的纷争和抢掠行为受到强有力的反击。但是在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下，备受苦难的仍然是农民。

只有在与被征服的波兰或立陶宛—普鲁士的田庄为邻的地方，贵族才常常企图使那根据德国封建法迁来的移民屈服于像普鲁士和波兰的臣民所处的那种农奴制依附状态。波美拉尼亚和普

魯士的教團領地也有這種情況，但是在西里西亞却比較少見。

由於這種比較有利的狀態，易北河以東的農民幾乎沒有受到16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16世紀最初二十五年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地方所發生的強大農民運動的影響，當1525年的革命爆發起來的時候，也僅只在東普魯士發生了微弱的反響，並且沒有費很大的事就被鎮壓下去了。易北河以東的農民對於起義的弟兄抱了棄之於患難之中的態度，因此受到了應得的報應。凡是偉大的農民戰爭怒吼的地方，農民就完全淪為農奴，負擔着領主任意加在他們身上的過度賦稅和徭役，他們的自由馬克也整個變成了領主的所有地，只有在領主開恩的時候，他們才有使用這塊土地的權利。德意志貴族在整個中世紀所追求而未到手，而在封建經濟崩潰的現在終於得到了的這種封建土地占有的理想狀態，也漸漸擴展到易北河以東地方來。這時，不僅是使用領主林地的權利，即按契約屬於農民的權利（如果以前沒有被削去），已換成了可以隨時取消的領主的仁慈的賜予；不僅各種賦稅和貢租被非法提高了，而且還增加了如被認為是農奴制標志的接租費（農戶主死亡時向領主交納的貢租）等新負擔，或者使向來相傳成習的負擔具有了不是自由人而是農奴才負擔的那種負擔的性質。這樣，不到一百年，易北河以東的農民起初在實際上，然後又在法律上淪成了農奴。

同時，封建貴族越來越資產階級化。貴族對城市貨幣資本家的負債越來越增長，因之，貨幣對於他們便成了迫切的需要品。但是不能夠從農民，從農奴身上榨取任何貨幣，暫且只能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力和農產品，而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來耕種的農民土地，又只能生產那麼多的農產品，除維持耕種者的最低生活以外，極少剩餘。但是旁邊却有收入豐富、面積廣大的修道院領地，這是

在熟练技术的指导下，用依附农民或者农奴的劳役来为土地所有者耕种的。这样的经营方法，小贵族到现在还几乎不善于运用，而大贵族和诸侯能在自己的领地上运用这种经营方法的也只是例外。现在，国内恢复和平之后，一方面到处都有了可能来从事大规模的经营，另一方面贵族日渐增长的货币需要也迫使他们转向了这样的经营。这样，用农奴的劳役来为土地所有者耕种大领地的方法，逐渐成了贵族的收入源泉，用来弥补他们因停止那过了时的武士抢掠行为而受到的损失。但是这些必需的土地从哪里去获得呢？贵族虽然占有有一定大小的世袭领地，但是这些领地，除了极少的例外，已全部租给了世袭的佃农，这些佃农只要履行所规定的义务，他们对于自己的宅地、胡菲以及对马克共有地（Markberechtigung），便享有同地主本身一样的权利。只好另想办法，首先是要使农民沦为农奴。因为，把农奴从他们的田地房屋中赶出去，虽然同把自由佃农赶走一样是侵害权利和使用暴力，但由于罗马法已经通行，这倒是很容易粉饰过去的。总之，在顺利地使农民沦为农奴之后，他们便按照必要的人数被从土地上赶走，或者把他们作为贫民（Kotsassen），即作为有茅屋和小菜面的零工重新招回到领主的领地上来。如果说从前贵族的坚固城堡已经让位给多少开放了些的城堡，那么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从前自由农民的房屋已经让位给简陋得多的农奴雇工的茅屋了。

领主的农庄——按面里西亚的说法是直领地（Dominium）——建立起来之后，重要的事就是如何运用农民的劳动力来耕种了。于是农奴制度的另一有利的方面立即表现出来。以前契约上严格规定的农民的各种劳役已经完全不适合于这一目的。这些劳役大多是公益事业，如修桥筑路的劳动和修建领主城堡的劳动、

在城堡中从事各产业部門以及个人侍奉的妇女劳动。但是一俟农民淪为农奴，而农奴又被羅馬法家看成同羅馬的奴隶一样的时候，老爷們的声色便完全不同了。現在，他們在法庭上的法律家的支持下，可以随时随地为所欲为地向农民要求过度的劳动。首先要农民搬下自己田地中的工作，甚至让自己成熟的庄稼浸在雨水中也得去給領主劳动：搬运、耕耘、播种、收割。谷物代役租或货币代役租也同样被提高到了极点。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同样高贵的本邦諸侯——易北河以东到处都有这种諸侯——也需要货币，而且需要很多货币。因为他們允許貴族奴役农民，所以貴族也允許他們对这些农民課以国稅——而貴族自己当然是免税的！除此之外，本邦諸侯还准許庄园領主以前在——早已廢除的——自由領地农民法庭上作庭长的权利轉变成領主裁判权和領地警察权的状态。因此，領主不仅成了警察的头目，而且还作了农民的——甚至對他們私人的事务——唯一的裁判官，所以告发只能是向領主告发領主。这样一来，立法权、司法权、执行权便都集中在領主一人手里了，他在自己的領地上完全成了无限权力的統治者。

連俄国都沒有过的这样駭人的状态（因为在那里农民总算还有自治的村社），在三十年战争和救命的耶拿战敗之間的时期曾經达到了頂点。三十年战争的災禍使貴族完成了对农民的奴役；无数农地的荒廢造成了使这些农地与貴族領地中的直領地順利地合并的可能性。在毁灭性的战争中被迫淪为流浪者的农民又轉入定居的这种状态，正好作了貴族把他們作为农奴紧縛在土地上的口实。但是这种情形并不长久。因为在以后的五十年間，战争的創伤刚开始結疤，田地刚开始耕种，人口刚开始增长的时候，高贵的

庄園領主便又垂涎农民的土地和农民的劳动力了。因为領主的直領地不那么大，所以不能吸收还能从农民身上榨出（所謂榨出仅指字面上的意义）的全部劳动力。比較高明的方式是使农民淪为貧民、零工状态。自18世紀初起，这种方式越来越盛行；現在被称为“驅逐农民”（Bauernlegen）。根据情况能驅逐多少就驅逐多少，最初还留下車馬劳役所需要的农民，使其余的都淪为貧民（打禾工、住小屋者、零工及其他具有諸如此类名称的人），他們为了一間茅屋和一块馬鈴薯地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永远在庄園領地上劳动，領取极少的谷物工資或更少的貨币。凡是老爺們富裕得足够設置自有役高的地方，便把剩下的农民也“驅逐”出去，把农民的胡菲并入領主的农庄內。德意志的貴族，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貴族的所有大地产，都是这样地由掠夺农民的土地构成的，所以即便从这班强盜手里把这些土地无任何代价地沒收过来，也不能說他們是充分地受到了应得的懲罰。老实說，除此之外，他們还應該賠償損失。

本邦諸侯漸漸注意到，这种方式虽然对貴族有利，但完全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农民从土地上被“驅逐”之前还向国家納稅，現在呢，从被合并到免除租稅的直領地的胡菲，國家根本就收不到稅了，而从那重新定居下来的貧民也难取得几文錢。被驅逐的农民有一部分对农場的經營是无用的人，簡單地被赶走了，因此变成了自由人，即赤貧的流浪人（Vogelfrei）。平原上农村人口开始减少，而当本邦諸侯必須利用从农民中募兵这种廉价的方法来补充高价雇佣兵的时候，便不得不关心这种事实了。因此，在整个18世紀，尤其在普魯士，一次又一次地頒布了目的在于停止驅逐农民的命令。然而这些命令的命运跟查理大帝的敕令以后

历代德意志政府所写的連篇累牘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廢紙的命运一样，都成了一紙空文；貴族对这些命令毫不理睬，仍然驅逐农民不止。

連法兰西大革命給予頑固的封建貴族的可怕的示儆，也沒有使他們恐慌多久。一切仍然照旧。腓特烈二世沒有作到的事情，而庸懦近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三世更无从实现。但是报应是昭彰不爽的。1806年11月14日整个普魯士国家一天之內就在耶拿和奧尔施塔特复灭了。比起普魯士全国在从摩尔維茨到塞当的胜利来，普魯士农民更有一切理由来庆祝这一天和1848年的3月18日。普魯士政府被赶到俄国国境后，已逐漸了解，靠着每天都有可能被赶出田地房屋的农奴制徭役农民的子弟，无从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兰西农民的子弟。現在普魯士政府終于理會到：农民，可以說，也是人。現在應該立刻采取办法。

但是，締結和約后，宮廷和政府剛一回到柏林，他們崇高的心願便跟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又消失了。1807年4月9日人言嘖嘖的敕令，固然在紙面上把农奴制度或者世襲依附农民制度(Leibeigenschaft oder Erbuntertänigkeit)^①这种名称取消了(这也是好容易从1810年圣馬丁节以后才实现的)，但实际上一切几乎仍然照旧。問題仍然存在。怯懦而且昏慣的皇帝仍然听命于掠夺农民的貴族，甚至从1808年到1810年頒布了四道命令，允許庄园主在好些場合可以違反1807年的敕令，重新驅逐农民。只有在拿破侖对俄国的战争日益逼近的时候，才又想起用得着农民了，

① 17—18世紀时主要发生在西普魯士和东普魯士的一种农奴制依附农民，农民有义务在田地和庄园領地上劳动，农民的子弟则去地主家从事勞役；在法律上規定他們固定于土地上，并且被迫住在解放了的农民的份地上。——編者注

于是頒布了1811年9月14日的敕令，劝告农民和庄园領主在两年內着手和陸地協議如何贖买劳役和賦稅以及領主的直接所有权 (Obereigentums) 的办法，因为两年以后，王家委员会要根据一定的章程强制使協議生效。其基本原则是，农民让出自己占有地的三分之一（或其货币价值），便可以成为他手里的其余土地的自由的拥有者。但是連对贵族如此有利的贖买办法也成了幻想。贵族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迟迟不予执行，而两年以后，拿破侖再度侵入國內了。

在战争恐怖中的皇帝，信誓旦旦地要在将来制定宪法和选举国民代表，可是当拿破侖一旦完全被赶出国境，一切好听的諾言便又被丢在脑后了。1816年5月29日——滑铁卢胜利后还不到一年！——頒布了对于1811年敕令的布告，但布告中說的已完全是另一回事。对封建賦役的贖买在这里已不是通則，而成了例外；它只能适用于那些已記入錢粮册（因之是比較大的）的农地；农民登記为这些农地的主人，在西里西亚是1749年，在东普魯士是1752年，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是1763年^①，在西普魯士是1775年。并且还允許留下播种和收获时期的一些徭役劳动。最后到1817年，贖买委员会认真行动起来的时候，农业立法的前退却比农业委员会的前进快得多。1821年6月7日接着頒布了新的贖买章程，章程中从新确定：贖买权只限于比較大的农户，即所謂 Ackernah-

① 普魯士的狡詐是无止境的。这种狡詐也表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日期上。为什么选择了1763年呢？简单地因为第二年即1764年7月12日腓特烈二世頒布了一个严格的敕令。敕令以严罰指示頑固的贵族，要他們在一年內使1704年，尤其是七年战争开始以后所大量侵占的农地和貧民的土地再住滿相应的經營者。这一敕令是产生了效果的，但在1816年又为了照顾贵族而取消了。——恩格斯原注

rungen(消費农业)①,至于更小的农場的所有者——貧民、少地农(Häusler)、无地农(Dreschgärtner),总之,所有被束縛在領主土地上的零工,他們的勞役及其他封建賦役却明确地永久保存了。从此以后这就成了通例。只是从1845年起,对薩克森和西里西亚才例外地准許用領主和农民双方協議(这当然用不着任何法律)以外的方法贖买这一类的賦役。除此之外,还把用来一下子永久贖回折成貨幣或谷物地租的賦役的款額規定为地租的二十五倍,每次至少得付一百塔来尔;然而早在1809年,在国有土地上却已經允許农民用地租的二十倍贖买了。总而言之,这个“理智的国家”的有名的开明农业立法所追求的只是一个目的,即从封建制度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

实际的結果十分符合这些可怜的措施。农业委员会完全体会了政府的善意,正如沃尔夫所——鮮明地指出的那样,它总設法在贖买时使农民受欺騙,让貴族沾光。从1816年到1848年有共占5 158 827莫根(Morgen)土地的70 582家农户贖出来了,这占有徭役的較大农户的七分之六。然而,較小的农户仅有289 651家贖出来了(其中有228 000戶是在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薩克森)。被贖回的年度賦役日数,計車馬勞役5 978 295日,人身勞役16 869 824日。高貴的貴族因此获得了下面这个数字的報酬,計貨幣18 544 766塔来尔,貨幣地租每年1 599 992塔来尔;实物地租——裸麦——每年260 069謝菲尔(Scheffel),最后是农民让出的土地1 533.050莫根②。因此,除了所有其他各种偿付之外,以前的庄园領主还获得了

① 农户不必到外面去劳动,也无需雇用外人的劳动力而能自行維持生活的一种农业。——編者注

② 关于这个統計数字請看麥岑(Meitzen)的《普魯士国家的土地》,第1卷,第432頁及以后各頁。——恩格斯原注。

过去农民占有地的整整三分之一！

1848年终于使鼠目寸光、夜郎自大的普魯士容克貴族們睜开了眼睛。尤其在有大地产制(Latifundiensystem)和因此农民被迫淪为雇农的現象得到广泛发展的西里西亞，农民冲进了城堡，燒掉了已經訂立的贖买文据，并且迫使地主以书面放棄了以后的各种偿付。这些使当时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階級也感到不快的过分行爲，当然受到了軍事力量的鎮压和招来了严厉的处罰。但是現在連最沒有腦筋的容克地主也了解到，徭役已屬不可能得到了，与其得自这些反叛的农民，还不如完全不要的好！現在問題只是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可是占有土地的貴族的确还是厚顏无耻地要求对这些已屬不可能得到的賦役有所补偿，于是反动势力一感到多少站穩了脚步，就立刻使这种要求得到了滿足。

但是，在这以前还頒布过1848年10月9日的法律，它命令一切还没有結束的贖买交涉和因此产生的訴訟事件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間的其他訴訟事件都暫且停止。因此，自1807年以来一直有名的农业立法受到了这一法律的譴責。但是当柏林的所謂国民會議一被解散，国家改变一成功之后，封建官僚的勃兰登堡—曼特菲尔內閣，便认定自己是有足够力量来为貴族实行有效措施的内閣了。于是在1848年12月20日頒布了一道临时法令，除了很少的例外，它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农民的賦役等等，直到将来調整时为止。这一法令也成了我們的沃尔夫所以要在《新萊茵报》上闡述西里西亞农民状况的动机。

虽然如此，但是在1850年3月2日的最后的新贖买法訂出之前，却費了一年多的工夫。对于現在仍然被普魯士爱国主义者捧上了天的1807年到1847年的农业立法，决不会作出比这一法律

的前言中所作的更尖銳的以至令人憎惡的譴責——何況又是出自勃蘭登堡—曼特菲爾內閣之口！

總而言之，有一些不重要的賦役是簡單地被廢除了，其他賦役的贖買辦法則由法令作了規定；把賦役折成貨幣地租，再把貨幣地租資本化為十八倍。為了辦理繳款手續還設立了地租銀行，而地租銀行應該用遐邇聞名的分期攤還辦法向地主按二十倍繳納地租。同時農民如果在五十六年中把每年應繳的償付清楚，就可以擺脫所有的義務。

內閣在該項法律的前言中，譴責了所有以前的農業立法，而國會委員會又譴責了新法律。這一法律不適用於早被法蘭西革命掃清了一切無用東西的萊茵左岸地方。委員會同意了這一限制，理由是法案的一百零九條中剛有一條大概可以在這裡適用，“所有其餘的規定却完全不適合於這一地方，——而且容易在那裡引起混亂和不必要的波動……，因為關於萊茵左岸地方實行廢除土地賦役的立法，比現時所要作的已先走了一大步”，而且人們也不能期待萊茵地方的居民容許把自己再置於新的普魯士的理想狀態中。

現在終於認真着手廢除封建的勞動形式和剝削形式了。農民的贖買手續進行了數年的工夫。從1850年到1865年年底辦完贖買手續的有：（一）剩下的較大的農民土地所有者，他們僅不過12 706人，却占有352 305莫根土地。（二）包括貧民在內的小土地所有者，在1848年以前，他們繳清贖款的還不到290 000人，而最近十五年間至少有1 014 341人。按照這個來計算，所贖回的屬於大地產的車馬勞役日數等於356 274日，人身勞役等於6 670 507日。同樣，用土地繳納因而由較大的農戶負擔的償付，僅等於113 071莫根，而不得不用裸麥繳納的年租則等於555 522謝菲爾。

同时，占有土地的貴族除了获得 3 890 136 塔来尔新的年度货币地租之外，还获得了最后的資本清偿 19 697 483 塔来尔^①。

全部普魯士庄园領主，包括国有土地在內，为了自願归还以前——一直到本世紀为止——掠夺自农民的土地的一部分而迫使农民从衣袋中交出的款額，根据麦岑（第 1 卷，第 437 頁）的計算是 213 861 035 塔来尔。但是这个数目是太小了。因为这里一莫根耕地“只”是按二十塔来尔，一莫根森林地“只”是按十个塔来尔，一謝菲尔裸麦“只”是按一塔来尔計算的，比应有价值低得太多。除此之外，这里所列入的又仅是十分“确实可靠的协商”，至少沒有注意到所有由当事双方私下所达成的清偿。麦岑本人也說，这里所列举的已經贖回的各种賦役，因之，为这些賦役所付出的賠償金，不过是“最小部分”而已。

因此，我們可以推算农民为求摆脱非法加在他們身上的各种賦役而向貴族和国庫付出的偿付金，至少当有三亿塔来尔，即約十亿馬克。

付出十亿馬克也仅是为了免去賦役而收回四百年前被掠夺的土地的很少一部分！所謂仅能收回很少一部分，是因为貴族和国庫本来把大得多的一部分，以长子继承地及其他騎士領地和国有土地的形式攞为已有了！

弗·恩格斯

1885 年 11 月 24 日于倫敦

（譯文原載《史学譯丛》1955 年第 4 期，
孟式鈞譯。轉載时有改动）

^① 这些数字是麦岑前书（第 1 卷，第 432、433 頁）两个表上总計的差数。——恩格斯原注

三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摘录)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

(1856年4月16日)

……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坏的是，当我展望未来时，我看到那里有一种带着“叛变祖国”气味的情形。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①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这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们是很知道莱茵河对岸那班法国英武弟兄们的呀！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

(譯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2卷，第453—454頁)

馬克思給拉薩爾的信

(1859年4月19日)

……我現在談談《弗兰茨·封·济金根》吧。首先，我应当称

① 馬克思是指美因兹城雅可宾俱乐部的會員，他們曾投靠1792年占領美因兹城的法国革命軍。——編者注

贊它的結構和动作，这是比任何現代德国剧本更高明的。第二，摒开純粹批判的态度，这个剧本在讀第一遍时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對於比我更易动情的讀者，它将有一种更强烈的效果。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

現在且說坏的一面吧。第一——这是純粹形式問題，——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該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些。但是，不管这种粗心在职业詩人們看来是如何可怕，我一般地还是认为这个剧本更好些，因为我們現在的末流詩人留給我們的只是一点儿形式上的光滑。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劇的，而且正好是使1848—1849年革命政党崩溃的最悲劇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贊成把这个冲突作为現代悲劇中心点的这个用意。但是我問自己：你所選擇的主题适合于表現这个冲突嗎？当然，巴尔塔薩尔^①可以这样想像：假如济金根不在騎士內爭的假面具下实行反叛，假如他揭起反对皇帝和向封建諸侯們宣战的旗帜，那他一定是会胜利的。但是我們可以分享这个幻想嗎？济金根（而且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狡詐。他的灭亡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騎士、作为一个垂死階級的代表起而反对現存制度，或者更确切些說，反对現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純粹属于个人的东西，他的特殊的修养、天生的才能等等，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葛茲·封·白里金耿。在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騎士階級对于皇帝与封建諸侯的悲劇的对抗以适合的形式給表現出来了，因此歌德選擇了他^②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因为济金根——在某种程

① 拉薩尔剧本中的人物之一。——編者注

② 指歌德的 Götz von Berlichingen。——編者注

度上胡登也是如此，雖然在他那里，正像在一定階級的一切思想代表者那里，類似的評述應該有巨大的改變——是在向封建諸侯鬥爭（他的反抗皇帝的行動是由于皇帝從騎士的皇帝變成了封建諸侯的皇帝），所以他不過是一個唐·吉訶德，雖然是一個歷史上正當化了的唐·吉訶德。他在騎士內爭的假面具下開始叛亂，這不過是說他以一個騎士開始叛亂罷了。如果不是這樣開始，他就必須立刻直接訴諸城市和農民，就是說訴諸那自己的發展相等于騎士階級的否定的那些階級。

如果你不想把這個沖突變成葛茲·封·白里金歌中的沖突，——這在你的計劃中是沒有的，——那麼濟金根和胡登之不得不滅亡，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完全像 1830 年有教養的波蘭貴族一樣，一方面成為當代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事實上代表着反動階級的利益。因此，那些代表革命的貴族們，——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號背後還隱藏着舊的帝國和強權的夢想，——不應當像在你的劇本中那樣占去了全部的兴趣。相反地，農民（特別是他們）與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倒應當成為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在最純朴的形式中，可是現在除了宗教的自由，市民的統一事實上還是你主要的思想。無論如何你必須更加莎士比亞化，可是現在你的主要缺點我认为是那把個人作為時代精神的單純號筒的席勒主義。你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也像你的弗蘭茨·封·濟金根一樣陷入了把路德騎士的反抗看作高于平民閔采爾的反抗的外交上的錯誤嗎？

其次，在性格描繪方面恰好缺少特征。卡爾第五、巴爾塔薩爾和特里爾的瑞恰爾特是例外。然而還有別的时代比 16 世紀有着

更加明朗的性格嗎？你的胡登，照我看来，表現着过多的一味的“鼓动”，这是很叫人厌烦的。他同时不是聪明而且非常机智的嗎？因此你对待他不是极不公平嗎？

就是你的济金根，——我順便說一句，他也被你描写得太抽象了，——不管他的一切打算而做了这个冲突的牺牲品到什么程度，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傳与城市等等交好，另一方面自己又乐于向城市施用强权……

(譯文采自《馬恩列斯論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年版，第4—9頁。曹葆华譯，周揚校)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1859年5月18日)

……关于历史的内容，你非常明快地而且以嗣后的发展的正确的暗示表现了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当时的运动的两方面：以济金根为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以及人文主义的理論的运动和它后来在神学和教会領域内的发展——宗教改革。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做会使臣和特里尔主教之间的几个場面(在那受有美学和古典著作的教养、在政治和理論上具有远見的世俗的使臣与那心胸偏狭的德国的僧侶封建諸侯的对比上，你成功地給了一幅显然从这些人物的代表性的性格上所获取的卓絕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卡尔的場面上也有着十分动人的性格描繪。关于胡登的自傳(你正当地认为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你无疑地采取了冒險的步驟把这个内容介紹到剧本里。第五幕里巴尔塔薩爾与弗兰茨的對話也是很重要的，在这對話里前者告訴他的主人应当遵守的

真正革命的政策。正是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契机显现了，而且由于意义重大，我觉得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于这方面有比较尖锐些的指出，那里是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办到的。但是我現在又回到次要的問題上来了。

当时城市和封建諸侯的地位在許多地方也表現得很清楚，因此那时的运动的所謂官方的分子就差不多被你描写无余了。但是我认为你不曾充分強調那些非官方的平民和农民的分以及他們附带的理論的表現。农民运动在其方式上恰如貴族运动一样是国民的运动，是反对封建領主的运动；农民运动所經歷的斗争的艰巨，与貴族階級之舍棄濟金根而不顧，重演自己为宮廷做奴隶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輕易，正是一个鮮明的对照。因此我觉得，即使依照你对戏剧的看法（你大概知道那在我看来是太抽象的、不够现实的），农民运动也是值得更多的注意的。那有約斯特·弗里茲的农民場面的确是十分特出的，而且这个“叛逆者”的个性也表現得完全正确，不过它却没有与貴族运动对比起来，充分地表现出农民暴动那时候已經达到的高潮的頂点。依据我对戏剧的看法，我們不應該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介紹那时候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供給十分新的材料以便剧本生动，会給予貴族的国民运动在舞台前部的表演以一幅无价的背景，会使这个运动本身第一次显出真正的面目。在封建关系崩潰的时期，我們从那些腰无半文的統治的國王們、一貧如洗的雇傭的武士們和各种各类的冒險家們中間会发现許多各色各样的特出的形象——一幅伐尔斯塔夫似的背景，它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里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会更富于效果！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对农民运动的这个忽視，足以說明你为什么把貴族的国民运动表現得不正确，問时你看

不出济金根的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皇室贵族之群是没有想到与农民订立联盟的；这是他们必须从被压迫的农民身上获取收入的情形所不许可的。与城市联盟倒是更可能些；不过这并没有实行，或者只实行了一部分。但是贵族的国民革命的实现，只有在与城市和农民、特别是与农民的联盟实现之后才有可能。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恰好是在于：与农民联盟——这个基本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贵族的政策必然变得无足轻重；在贵族要取得国民运动中的领导的时刻，国民大众，农民，就起而反对这个领导，于是贵族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坍台了。你假定济金根与农民有相当联系，这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根据，我是不能判断的，不过这并不是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我所能记忆的，胡登在他的文书中诉诸农民的地方只是轻轻地触到一下贵族的这个麻烦问题，竭力把农民的一切愤怒引到去反对僧侣。但是我毫不反对你有权利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以解放农民为目的的活动家。然而这里就有着悲剧的矛盾：一方面而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他们就站在这两者之间。在我看来，这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忽略了这个要点，你把悲剧的冲突降到了很小的范围，使济金根不立即去向皇帝和皇室官僚们宣战，却只向一个封建诸侯宣战（虽然你以和当的机智在这里引进了农民），而且使他的灭亡仅仅是出于贵族的冷淡和胆怯。但是，假如你原先就更有有力地强调了农民运动的继续增长的威胁，强调了在农民的叛乱和可怜的康拉德之后贵族的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心情，那末这个胆怯就会有完全不问的原因了。然而这不过是可以把农民和平民运动输入到戏剧里的许多方法之一，实际上至少还有同样适合或者更加适合的

十个另外的方法……

(譯文采自《馬恩列斯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1年版，第15—18頁。曹葆華譯，周揚校)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

(1882年12月15日)

……附上關於馬克的附錄。請於星期日寄還，以便星期一修改——對結論的修改今天沒有完成。

這里對中世紀農民狀況以及16世紀中葉以來第二次農奴制出現所表述的見解，我認為整個看來是顛撲不破的。我已把毛勒整本書中所有有關之處重讀過，發現幾乎所有我的主張都在里面，而且還有例證，此外又有恰恰相反的東西，但那或是沒有例證的，或是取自一個恰恰談不上的時代的。特別是《徭役農莊》^①第4卷結論部分如此。毛勒書中有這些矛盾：1. 是由于習慣於把一切時代的證據和例子並列地、交錯地加以引用；2. 是由于法學上一種偏見的殘余，每當涉及理解一種發展時，這種偏見總是阻礙看他；3. 是由于他對暴力及其作用考慮得太少；4. 是由于一種開明的成見，以為自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必定發生一種向更好方面的不斷進步；這不僅使他看不見現實進步中的對抗性，而且也使他看不見個別的反動。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絕不是一氣呵成，而是一個真正的拼湊作品。第一個草稿是一氣呵成的，但可惜是錯的。我逐漸才掌握材

^① 指 G. L. 毛勒的著作：《德國徭役農莊，農民農莊與農莊狀況史》，第1—4卷，1862—1863年愛爾朗根出版。——編者注

料，因而有了这么多的补綴。

附带說一句，普遍再行农奴制是德意志为什么在 17、18 世紀不能振兴工业的原因之一。第一，在各行会中有倒轉过来的分工，这与工場手工业中的分工相反。不在車間之內分工，却在各行会之間分工。这里在英国发生了向无行会的乡間的迁移。但在德国，乡下人和务农的市鎮居民被变为农奴，这种迁移就不能发生。但一来外国工場手工业的競争，行会也终于破灭了。至于在这里共同使德意志工場手工业不得振兴的其他原因，此处从略……

(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历史》柏林狄茨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 卷第 612—613 頁譯出。熊偉譯，李稼年校)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

(1882 年 12 月 16 日)

……关于农奴制在 13 世紀和 14 世紀几乎完全——在法律上或在实际上——絕迹一点，是我最注意的，因为你从前对这一点曾說出过一种異議。就易北河以东之地而論，通过殖民过程，德意志农民的自由是确定了，就什列斯威—好斯敦而論，毛勒承认当时“一切”农民都重获自由（也許在 14 世紀稍后一点）。就南德意志而論，他也承认，正在那时依附农所获的待遇最好。在下薩克逊的情形或多或少也是如此（例如那些新的“管事”^①，事实上是世襲佃

① 这些新“管事”是指中世紀德意志封建主向易北河以东之地殖民，强占斯拉夫地区后移植去的一些德意志农民的头目。他們实际上是封建主与农民的居間人，对封建主要尽义务，但也获一些优惠，如得较大份地与免除徭役等。——譯者注

戶)。毛勒只是反对钦德令格认为农奴制在 16 世紀才出現的意見。但自此以后，农奴制又重新兴起，第二次出現，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麦岑指出首先在东普魯士、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又有农奴可言的年份，即 16 世紀中叶，据孛生指出，在什列斯威—好斯敦也是这样。毛勒把这种现象称为較温和的农奴制，如果是与还繼續实行古日耳曼奴隶制的 9—11 世紀的农奴制相比，他是对的，如果是与主人依 13 世紀法典保有而且以后还保有的对农奴的一些法律权限相比，他也是对的。但与 13 和 14 世紀以及在北德意志还有 15 世紀的农民的实际地位比起来，这个新农奴制决不較为温和。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尤其如此！还有很可注意的是，在中世紀时期，依附农制和农奴制的等級是数不清的，以致 13 世紀的薩克遜法典都不談农奴的权利，到三十年战争以后，也談得非常簡單。总之，我切盼知道你的意見……

(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历史》
柏林狄茨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 卷第 613—
614 頁譯出。熊偉譯，李稼年校)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

(1893 年 7 月 14 日)

……关于該书本身，一般我只能重复我已不止一次隨着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时讲过的話；这是对普魯士国家形成过程的現有一切論述中最好的一种論述，甚至可以說是唯一良好的論述，它在大多数場合連細节都很正确地揭示出了一切相互联系。我感到遺憾的，只是您沒有一下子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

步发展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一定会作到这点,以系统条理的论述描绘出自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起至老威廉为止的整幅情景。须知这一工作您已经预先作过,并且——至少在各主要问题上——甚至可以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而这在整个旧建筑崩溃以前就应作好。把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打破,这即或不是为把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德国还未来得及产生出来,就已经成为过去的阶段了)铲除所绝对必要的前提,却也毕竟是实现这种铲除工作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这样您会有更广阔的场所和更多的单独理由把普鲁士地方史描绘出来,把它作为全德国可怜命运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有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于德国割据原因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见解。如果我将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一书的历史绪论(希望这能在明年冬季实现),那末我就能在那里发挥相应的论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所列举的那些原因不正确,不过我除那些原因而外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原因,并加以稍有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显得十分贫乏的德国历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历史中的相当时代来作比较,才可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跟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由封建国家各个割据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而我们这里却恰好是处于最深重衰落的时期。那里是在全部发展过程中有着罕见的客观逻辑,而我们这里却是日益不可救药的紊乱。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是援助普罗温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民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进行的战争乃是一种“三十年战争”,但这些战争在

那里結果是外國干涉者被驅出國境和南部被北部所制服。隨後是中央政權進行鬥爭反對那依靠國外領地而其作用約與勃蘭登堡—普魯士相當的勃艮第安藩屬國，但這一鬥爭是以中央政權獲得勝利作結并使民族國家形成過程臻于完成的。在我們這裡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志王國”可以稱作民族國家的話），而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遭受掠奪。這對於德國人是個極為耻辱的比照，但它因此也就更有教益，而自從我們的工人重又使德國站到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就能稍微容易地忍受先前的耻辱了。

德國發展方面的另一個極其特殊的特點是在於：帝國所有那兩個最終彼此瓜分了整個德國的構成部分，都不純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奧地利是由巴伐利亞建立的殖民地，勃蘭登堡是由薩克森建立的殖民地；它們所以在德國本國內部取得了政權，僅僅是因為它們依靠了自己國外的、非德意志的領地：奧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說波希米亞了），勃蘭登堡依靠了普魯士。在最受威脅的西部邊境上，這類事情是完全沒有過的；在北部邊境上，保護德國不受丹麥人侵犯一事是讓丹麥人自己去作的，而南部地區是如此很少需要保衛，以致本應保衛國境的人——瑞士人——自己能離開德國分立出去！……

（譯文采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卷，第499—
501頁）

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

(1895年5月21日)

……关于你的书^①，我可以說，我們越讀下去就越好。柏拉图和原始基督教照最初计划看来还談論得太不够。中世紀各教派已經好得多，而且越来越好。塔波尔派、閔采尔、再洗礼派最好。政治事件的重要經濟分析很多，此外也有陈腐的东西，这里显出研究上的缺陷。

我从这本书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我重新修訂农民战争，这本书是一个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据我看来，主要缺点有两个：1. 对完全处在封建等級构造之外，失去階級地位、列在差不多等于下层賤民地位的分子的发展和作用研究得很不够，这些分子无可避免地发生在每一城市形成之时，他們脫离了馬克公社、封建依附关系和工匠行会，形成中世紀每一城市居民中最低下最无权的阶层。这是困难的，但这是主要基础，因为隨着封建束縛的瓦解，这种分子就渐渐变成前无产阶级，这就是1789年在巴黎近郊干革命，把一切被排斥于封建社会和行会团体之外的分子都吸收在內的階級。你談到无产者，这个称謂不恰当，而且你把織工扯进去，至于織工的重要性你描写得完全正确——但是自从有了失去階級地位，不屬於行会的織工奴才以后，而且只有在有了这些人的情况下，你才能把这些人作为你的“无产阶级”。这里还要作許多补充。

2. 你没有充分了解15世紀末德国——如果可以这样說——在

^① 指卡尔·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驅》一书。——編者注

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德国的国际經濟地位。只有这个地位才能說明，为什么在宗教形式下的市民平民运动在英国、尼德兰、波希米亚都曾失敗，而在16世紀的德国却能有一定的成功。这是这个运动的宗教伪装的成功，至于资产阶级內容的成功却留待〔下一世紀〕^①而且留給这时出現的在往新世界市場方向上的〔国家〕^②——荷兰和英国了。这是一个漫长的題目，我希望在农民战争中加以广泛的論述——我如果已經做起来就好了！

（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德国历史》
柏林狄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624—
625頁譯出。熊偉譯，李稼年校）

① ② 原稿边上几个字被裁去，現在按意义加入。——編者注

四

恩格斯手稿

〔論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資產階級的兴起〕

当居于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以疯狂的厮杀喊声响彻了中世紀的时候，被压迫階級的默默的劳作却正在破坏整个西歐的封建制度，結果造成了一种形勢，使封建主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固然，封建主在农村依然作威作福，对农奴肆行虐待，拿他們的血汗尽情揮霍，踐踏他們的庄稼，蹂躪他們的妻女。可是，在农村四周已产生了城市；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及萊茵河畔，古代羅馬的自治城市已死灰复燃起来；在其他地方，特別在德意志内部則建立了許多新城市；它們为了防卫自己，全都圍以城墙和濠堦，它們的城堡較貴族的柵寨更难攻下，要夺取这些城堡已非用大量军队不可了。在这些城墙濠堦的内面发展了中世紀的手工业（固然，这些手工业都完全浸透了小市民的行帮习气和狭隘性），开始蓄积着資本，产生了各城市間以及城市与其余世界間互相交往的要求，和这种要求同时又产生了保护这种交往的方法。

15世紀的城市市民在社会上已变成比封建貴族更不可少的了。虽然广大居民群众还都从事于农业生产，因而农业仍旧是生产的主要部門，但在哪里那里却有着这样为数不多的自由农民，他

們忍住了貴族的橫征暴斂而保存下來，這一事實就令人信服地證明：在農業中本質的東西，根本不是貴族主的寄生和勒索，而是農民的勞動。而且貴族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並不斷變化，以致他們自己也變得離不開城市；還應該知道，他們只是從城市才取得他們的唯一生產工具——盔甲和武器的。國內生產的呢絨、家具和裝飾品，意大利的絲、勃拉邦的花邊、北方的毛皮、阿拉伯的香水、東方的水果、印度的香料等等——所有這一切（肥皂除外），貴族都取得之於城市的市民。世界貿易在某種程度內產生了；意大利人往來於地中海，並橫跨地中海沿大西洋岸直達佛蘭德斯。儘管有荷蘭人和英國人的競爭，北海及波羅的海仍全在漢薩同盟控制之下。海上交通線匯聚的北部港口與南部、中部港口之間的聯繫由陸路來維持，而維持這種聯繫的道路是都要通過德意志的。當貴族日益變成一種多餘的階級並阻礙着發展的時候，城市市民卻成為體現生產和交往、文化教育、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進一步發展的階級了。

生產和交換的這一切成就，從我們現代的觀點看來，都還是非常有限的。當時的生產完全限於行會手工業，而實質上它還保存着封建的性質；貿易也只在歐洲的領海上進行，而沒有遠伸到與遠東交換產品的近東沿海各城市以外去。雖然行會手工業及與其同時產生的市民手工業者都很幼小，且活動範圍有限，但他們卻有足夠力量在封建社會內從事變革，並且至少他們還在前進，而貴族階級則純然是停滯不前的。

此外，城市居民還有一件反對封建主義的更加強有力的武器——貨幣。貨幣在中世紀初期的典型封建經濟中幾乎完全沒有地位。封建主或者以勞役的形式，或者以實物的形式，從農奴那里

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婦女紡織麻、毛并縫制衣服；男子耕田；兒童則為主人放牧牲口，替主人采香菇、野果、鳥窠和牲畜用的草蓆；除此而外，全家還須獻納谷物、菜蔬、蛋、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許多東西。每一個封建經濟單位完全自給自足，甚至軍事供應也由征集實物得來。那時沒有貿易和交換，貨幣也是多餘的。歐洲的水平低落到一切都得从头開始的地步，以致那時貨幣已很少社會的职能，只剩下政治的职能了，即用它來繳納賦稅，并且它主要是靠搶劫而來。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改觀，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此貨幣量大有增加。而貴族也同樣不能沒有貨幣。但他們可以出賣的東西很少，甚至完全沒有，而打家劫舍現時又不是那樣輕而易舉的事了，因而他們不得不向城市高利貸者借貸。騎士柵寨的圍牆，在被新式大炮轰開以前很久，其牆腳即已為貨幣所破壞。事實上，可以說火藥簡直是為貨幣服務的執法官；貨幣則是市民在政治上促成平等的巨大工具。凡是人的關係為貨幣關係所排斥而實物貢賦變成貨幣貢賦的地方，那里資本主義關係也就奪取了封建關係的位置。在大多數農村中雖然還存在有古老樸素的自然經濟，但已經有許多整片的地區，比如在荷蘭、比利時和萊茵河下游，農民都不用徭役和實物獻納，而以貨幣向領主繳付；領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們自己分別變成地主和佃戶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步驟，并從而剝奪了封建主義政治制度在農村中的社會基礎。

在15世紀末，貨幣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礎，并从內部侵蝕封建制度已到何種程度，可以明顯地從西歐在這一時期對黃金貪求無厭的心理中看出來；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個遠東地區搜尋黃金；黃金這兩個字變成了驅使西班牙人遠渡大西洋而到美

洲的符咒；黃金也是白種人剛踏上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追求的头一項重要的東西。這種對於遠洋航行和冒無數艱險尋找黃金的強烈願望，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進行的，然而它必竟在根本上與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因為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農業，而其掠奪性的遠征的目的，本質上在於獲得土地。而且航海事業是一種毫無疑義的資產階級的企业，這種企业的反封建的特性也在一切現代艦隊上打上了烙印。

因此，15世紀時，封建制度在西歐各處都呈現徹底土崩瓦解的狀態；在封建統治的地域內處處都被劈刺似地插入了有其反封建利益、有其自己的法權並擁有武裝市民的城市。它們已經使封建主部分地由於貨幣的原故而在社會上處於依賴地位，有些地方甚至在政治上也處於依賴地位；甚至在有些因特別良好的條件而農業水平較高的農村中，舊式封建聯系也由於貨幣的活動而開始松弛起來；只有在貨幣剛侵入的地帶，如易北河以東的德意志或其他遠南通商路綫的落後地區，舊式貴族的統治才能依舊維持於不墜。但是，無論在城市或鄉村，這樣的人却越來越多了；他們首先希望結束那些無休止的無意義的戰爭，希望結束那種甚至當外敵已經入境還要不斷引起內戰的封建主們的爭吵，希望結束那整個中世紀期間不曾間斷過的漫無目的的破壞狀態。這些人既然本身還過於軟弱而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他們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國王——尋求有力的支援。這裡，對於社會關係的研究已把我們引到對於國家關係的研究，我們於是就從經濟領域轉到政治領域。

中世紀初期各部族(Volkergewirr)的雜居，逐漸發展成為一些新興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在這種發展過程中，如所周知，大多

教曾經是羅馬行省的各地的被征服的居民，即农民和城市市民，把胜利者日耳曼貴族同化了。因此，現代的民族也是被压迫階級的产物。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产生了民族的融合，怎样又在別一个地方发生了分离，門基所編制的中洛林区地图^①可以給我們一个明确的概念。只要考察一下这个地图上罗曼語地名和德意志語地名的分界綫，就可以知道：它在比利时和下洛林的一段基本上符合于百年前法兰西語与德意志語的分界綫。在划有細綫的一些地方就是两种語言爭夺优势的地方；然而哪一种應該是德意志語，哪一种應該是罗曼語，大体上还是一目了然的。地图上大多数地名之用古代下法兰克語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的事实证明他們是屬於9世紀的，最迟也当屬於10世紀，并因此证明，分界綫是在加洛林王朝末期基本上就已經划分出来了的。

在罗曼語那一方面，特別是在靠近上述語言分界綫所通过的地方，我們可以找到由德意志人名和罗曼語地理名称合并拼成的許多混合地名，例如繆司河以西靠近凡尔登一带的地名主要便是如此：Eppone curtis, Rotfridi curtis, Ingolini Curtis, Teudegisilo villa，即今天的易庇庫尔、列庫尔·拉·克列、安勃列庫尔·苏尔·埃尔及茨叶維尔。它們都是在罗曼語地区建立而先后經過罗曼化的法兰克封建主的府第(Herrensitze)和一小块一小块的德意志殖民地。在若干城市中或国内某些个别地方则有若干較大的德意志殖民地，它們在比較长的时期内都还保存着自己的語言；例如在9世紀末从这类殖民地还产生了魯得威希歌謠(Ludwigslied)，但是842年各国国王和封建主(Grossen，直譯为“大人物”)的宣誓

① 石普雷納尔—門基：《中世紀及近代史地图》，第92图，哥达1874年第三版。

证书——在这证书里罗曼語已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官方語言——证明：大部分法兰克貴族在比这更早以前便已經罗曼化了。

語言集团一旦开始区分（把后来的掠夺性战争和那些以彻底毁灭为目的的战争，例如为了反抗易北河沿岸的斯拉夫人的战争，撇开不谈），就表明它們已为組成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也表明民族已开始发展成为国家民族（Nationen）。洛林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的迅速崩溃，說明早在9世紀的时候这种自发过程已是如何的强烈。的确，在整个中世紀中，語言的分界綫和国家之間的分界綫彼此很不一致，但每一个民族，也許意大利除外，畢竟是都以欧洲的大国家为代表，它們愈来愈明显而自觉的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意向，却是促进中世紀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中世紀这些大国的每一个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級制的頂点，是最高的首脑，諸侯們沒有他就不可終日，但他們也不断向他兴兵作乱。整个封建經濟的基本关系——分封采邑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貢賦——甚至在其最初和最简单的形式中也为爭吵造成了充分的口实，而在有这样許多人蓄意寻衅的时候，更是如此。那末，在中世紀末期，当所有各地采邑的关系因賜給的、剝夺的、重新恢复的、因过时而終止的、加以改变或以任何其他方法加以限制的权利与义务而形成一团乱絲的时候，怎样能避免許多冲突呢？例如无畏的查理（Карл Смелый）在他自己的某一部分領地上是神圣羅馬皇帝某采邑的受封主，在別一部分領地上是法兰西王某采邑的受封主；但在另一方面，法兰西王——无畏的查理的君主（Lehnsherr）——又同时在某些領地上是其原来藩屬无畏的查理某采邑的受封主。既是这样，怎么能避免冲突呢？这就是为什么在那纵横捭闔的漫长世紀中，有使諸侯归附中央王权的向心力

(因为只有中央王权才能保护他们不受外敌及其他诸侯的侵略),也有由这种向心力不断地、必然地变成的离心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抢劫是取得自由身分的骑士为取得生活资料唯一可行方法的整个漫长时期,王权和诸侯之间要不断斗争,他们的野蛮的厮杀喊声淹沒了一切;这也就是那种永无穷尽的紛至沓来的一大串背叛性杀害、纵毒、阴谋詭計和种种卑鄙行为发生的原因。而这些勾当掩盖在骑士精神的詩意底下,并且不管怎样总是被称为荣誉与忠诚的。

显而易见,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das Königtum)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在漫无秩序中它代表秩序,它代表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而和叛乱不已的各诸侯国家的分崩离析状态形成一个对比。在封建主义外衣下所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之倾向王权,也正同王权之倾向他们一样。王权和中产阶级(Bürgertum)的联盟开始于10世纪;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并非永远形成联合的形势;王权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屡为冲突所中断,但终能变得更牢固、更强有力,从而帮助王权取得了最后胜利,而王权反以奴役和掠夺来报答它的同盟者。

— 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影响日见增长的法学家这一阶层(Stand)找到了强大的支援。当他们重新发现《罗马法》时,僧侣、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以及不属于僧侣阶层的法律学者之间,便确定了分工。自然,这批新法学家本质上一开始就是属于市民阶级的;而他们自己所研究的、以之教授别人并加以运用的那种法律,又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的。《罗马法》既然是这么一部反映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生活关系及其冲突的古典法律,一切最新的立法都不能使它有任何重大的改进。然而,中世纪时市民所有权还深深为封建的限制所束缚,例如,它

主要是由特權組成的。由此可見，《羅馬法》比起當時的資產階級關係要前進得多。資產階級所有制更進一步的歷史發展只能是向純粹的私有制發展，而它也恰恰是這樣發展的。這種發展本可以《羅馬法》為強有力的杠桿，因為在《羅馬法》中已經以很成熟的形式包含了中世紀後期市民階層還不是自覺地所渴望達到的一切。

誠然，在很多場合下，《羅馬法》是貴族殘酷壓迫農民的口實，例如當農民想為自己免除通常的租稅而提不出書面證明時便是如此，可是，這並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貴族不靠《羅馬法》，也找得出許多便利的借口，而且這類借口也確實天天被他們找到了。對封建關係極端格格不入而又完全預見到現代私有制的《羅馬法》之付諸實行，無論如何該是一大進步。

如上所述，我們知道封建貴族在中世紀後期的社會中怎樣在經濟上變成了多餘的，甚至變成了直接的障礙；知道它怎樣在政治上變成了城市和在當時還只能採取君主制形式的民族國家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儘管如此，由於封建貴族直到此時為止還保持着軍事（Waffenführung）的壟斷地位，沒有他們就不可能作戰或發動戰爭。這一情況也必須改變，即必須採取最後步驟使封建貴族明白，他們在社會和國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時期應該結束，至於騎士這種資格，即使是在戰場上也再無他們用武之地了。

那時兵士自己就還是封建性的，他們與其直接領主的关系要比與指揮國王所屬軍隊的主帥的关系更為密切。以這種軍隊來進行反對封建經濟的鬥爭，顯然必陷入絕境而不能自拔。從14世紀初起，各國國王力圖擺脫這種封建的軍隊來建立自己的軍隊。從這時起，我們就看到國王軍隊中征募來的兵和雇傭兵的成分日漸增長。在開始時，大部分是步兵，是由城市的游民、逃亡的農奴、倫

巴底人、热那亚人、德意志人及比利时人等组成的；他们主要被用于卫戍城市或围城，最初几乎不用于野战中。可是，早在中世纪末期我们即发现有一种带领着他们的、不知用什么方法征集来的属从（Gefolgschaften）为外国君侯充当雇佣兵的骑士，这便宣告了封建军事制度（Kriegswesens）无可挽救的崩溃。

同时，在城市中和在各地原有的或新产生的自由农民间，有战斗能力的步兵的基本条件也正在形成。在此以前，骑士及其骑士属从与其说是组成军队的核心，不如说就是军队本身，跟随在后面走的农奴辎重队是不算数的，他们到战场上来只是为了存心溃逃和劫掠。在封建制度极盛时期，即在13世纪末以前，由骑士担任并决定一切战斗。自此以后，情况到处改变了。英国农奴制度的逐渐消灭，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自耕农（yeoman）或佃农阶级，他们便是善于使用当时英国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式步兵的来源。不管这些永远徒步作战的弓箭手在移动中是否使用马匹，他们的出现乃是英国军队在战术上起本质变化的动力。从14世纪起，只要在地势和其他条件容许的地方，英国骑士都宁愿采用步兵战。在弓箭手——往往由他们发动战斗并粉碎敌人的反抗——的背后，有由徒步骑士所组成的环形密集阵势来防御敌方的袭击或者伺机进攻，而一部分骑士则仍然留在马上，以便在紧急关头实行侧翼增援。正是由于在军队中恢复了防守的因素，才大大造成了当时英国人在法国的接连不断的胜利。这些战斗大致同威灵敦在西班牙和比利时所进行的战役一样，它们是与出击相结合的防守。自从法国人采用新战术（从他们以雇佣的意大利弩手来代替英国弓箭手的位质时起，采用新战术就有了可能），英国人的胜利便告終了。

同样，只是在14世紀之初，佛蘭德斯各城市的步兵才敢于在野战中抗御法国的騎士，并且时常取得胜利，而奥尔伯特皇帝想把隶属德意志帝国的瑞士农民出卖給奥地利大公（他本人便是奥地利大公）的企图則推动了贏得全欧洲荣誉的最初的现代步兵的建立。由于瑞士人对奥地利人、尤其是对布尔貢人的胜利，步兵终于打败了以铁甲为护卫的騎士（不論是在馬上或地面上均如此），萌芽状态的现代军队迎头击破了封建军队，市民和自由农民战胜了騎士。瑞士人为了一开始便为欧洲第一个独立共和国确立下资产阶级的性质，立即把它們的军事光荣鍍起鍍来。一切政治得失的考虑全不在話下了：各州都变成了征募雇佣兵的事务所，而这些雇佣兵是誰出錢多就給誰出力的。在別的地方是如此，特別是在德意志，到处都响起了募兵官的鼓声；但是該国政府——其存在好像只是为了出卖臣民——的厚顏无耻，直到德国处于最深重的民族耻辱中时还不曾有任何德意志王公赶得上它。

后来，也是在14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药与火炮的使用經過西班牙傳进了欧洲。直到中世紀的最后，应用火药的枪炮，其作用还是不大。这是因为，大家都曉得，克勒西战役中英国弓箭手的弓跟滑铁卢战役中的枪射得一样远，也許还要更准确些，虽然在效果上有所不同。野炮也还在幼稚时期；反之，只有重炮已經在騎士的柵寨上打穿了許多窟窿时，这才向封建貴族宣告他們的統治已随火药的产生走到了穷途末路。

印书术的推广、古代文献研究的恢复、以及从1450年起日益有力和日益普遍的各种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市民及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这些年复一年愈趋有力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于它們向同一

方向日益有力地交互影响，决定了15世纪下半期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虽然它还不是市民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王权在欧洲各处——包括尚未走完封建制度的穷乡僻壤——都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上两个说罗曼语的部落联合成了西班牙王国；这又使说普罗旺斯语的阿拉贡接受了卡斯提利亚的语文；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语言所统治的区域（加利西亚除外）联合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伯利安半岛上的荷兰；它丢开了内地，并以其在海上的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

在法国，在布尔贡这个缓冲国(Zwischenreichs)灭亡以后，路易十一终于在当时还非常偏小的法国领土上建立了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统一，并使他的继位者有能力干涉意大利的骚动，而这个统一只不过一度因宗教改革暂时受到危险而已。

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唐·吉訶德式的掠夺战争，这个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使它流更多的血；封建贵族企图以玫瑰战争为自己取得补偿，并且他们所得到的多于所求的；他们在相互火拼的内战中葬送了自己，从而为都铎王朝奠定了空前绝后的权力。斯塔的纳维亚各国也早就完成了统一。王权尚未式微的波兰自从和立陶宛联合以后便进入了它的光辉灿烂的盛世；甚至远如俄国，它对分封王侯的征讨也和它的挣脱缰勒的枷锁同时进行，到伊凡三世而最后得到巩固。在欧洲这时就只剩下了两个国家：它们或者根本没有王权和在当时的无王权便不可能有的那种民族统一，或者仅存在于纸面上，这两个国家便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譯文原載《历史問題譯叢》1953年第6期，王曉鈴、張書生譯，謝家、樊以楠校。轉載時有改動)

關於《農民戰爭》

路德的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第1號；農民戰爭是這個革命的批判的插曲。封建制度的解體和城市的發展——二者都有促進地方割據的作用；因此專制君主制成為維系各民族所直接必需的了。由於一切成分的離心性，這個君主制不能不是專制的。然而這個專制却不可用庸俗意義來理解；這個專制君主制是在時而與等級議會，時而與叛亂的封建貴族及城市的不斷鬥爭中發展出來的；這個君主制從未廢除等級；這樣，這個專制君主制寧可稱為一種等級的（也可稱為一種封建的，主要是封建制度胚胎中的資產階級的）君主制。

這個革命第1號的歐洲性質比英國革命多，而且它在歐洲的傳播比法國革命快得多——這個革命第1號的勝利在瑞士，在荷蘭、蘇格蘭、英格蘭，有幾分在瑞典（早在古斯塔夫·瓦薩時代）並且在丹麥都固定下來，在丹麥到1660年才以正統的專制主義形式固定下來。

I. 革命第1號所以發生在德國的各種原因。從開頭起的德國歷史。德國在民族大遷徙的英雄時代以後殘破了。查理大帝才由法國重建德國。於是也恢復了羅馬帝國思想。以後鄂圖鞏重復了這個思想。這個思想與其說是德意志思想，毋寧說是非德意志思想。德國由於霍恩斯陶芬王朝的這種政策——對意大利城市進行掠奪

的政策而陷于瓦解。因此大大加深了分裂局面——在革命情况下更不待言。从空位时期^①到15世纪的发展。城市的兴建。在诸侯重压下在德国从未达到全盛的封建制度之衰微（皇帝作为一邦诸侯是反对帝国骑士的，作为皇帝则是赞助帝国骑士的）。农民们逐渐得到解放，到15世纪又有反复。在物质方面，德国与当时各国完全处于同一水平。有决定性的是，在德国，由于各地区分裂局面并且长期免受外族的入侵，它对全国统一的要求不像在法国（百年战争），在刚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来的西班牙，在刚把鞑靼人赶走的俄国，以及在英国（玫瑰战争）那样强烈；也有决定性的是，当时皇帝的权力也那样薄弱。

II. 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然后跟着出现许多民族的君主专制政体——只有德国和意大利没有专制君主制。

III. 宗教改革的特征是一般要求之唯一可能的普遍表达方式。

（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历史》
柏林秋英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279—
280页译出。熊俾译，李稼年校）

关于德国的札记

I. 小引。1500至1789年

15世纪末，德国越来越分裂，中央削弱，而在同时，法国和英国都已或多或少地中央集权化并已形成民族国家。这在德国是不可

^① 指1252—1273年没有德意志皇帝时期。——编者注

能的,因为 1. 封建制度在这里比在各被征服国^①发展较晚; 2. 德国曾有法兰西和斯拉夫领地, 德国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属地并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心——这样, 德国当时不是一个民族的集体; 3. 主要的是: 当时各地方和地方集团还真正是互相隔绝的, 彼此之间没有来往, 等等(参看农民战争)。汉萨同盟、莱茵城市同盟、士瓦本城市同盟代表着自然发生的但各个分离的组织。

……西班牙, 法国, 英国都在 15 世纪末叶逐渐结合成立宪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巩固是 15 世纪划时代的事情。(在西班牙——加达鲁尼亚民族和卡斯提尔民族联合起来, 在葡萄牙——意卑里亚各民族联合起来, 荷兰靠着航海事业赢得单独存在的权利, 法国靠着逐渐吸收了整个民族的王朝权力赢得单独存在的权利, 英国在消灭宫廷贵族的玫瑰战争中巩固起来了。英国是在不得不放弃它在法国的狂妄侵略计划——类似德国的远征罗马计划——以后, 才巩固起来的, 否则英国就会在这个计划上像德国那样耗尽力量而灭亡。) 这时德国如果没有这些情况: 1. 罗马皇帝的称号及其连带的统治世界的要求使一个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 而力量却被浪费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远征中(其后果在奥地利一直达到 1866 年!), 而这些远征向来是违背德国利益的; 2. 存在着选帝制度, 这个制度从来不容全国归于皇室权力, 而向来是, 特别是在有决定性的 15 世纪, 诸侯一感到皇室权力过大, 就改换朝代; 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 尽管德国在经济方面缺乏联系, 也会达成中央集权, 而且更要早些(例如在诸鄂图时代)。在法国和西班牙也曾存在经济上的分裂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在这两国都靠武力克服了。

① 指曾属于罗马帝国版图而在从 3 世纪到 6 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被日耳曼部落侵占各国。——编者注

在中世紀，皇帝与教皇之間的“文化斗争”使德国与意大利都陷于分裂(在意大利，教皇是民族统一的障碍同时又常假装是民族统一的拥护者，然而却是这样：例如但丁就把異族皇帝看成意大利的救星)，而在1500年左右，教皇作为中等諸侯所有的領地已橫貫意大利并使統一成为物质上不可能了。

2. 然而因为世界通商大道通过德国，德国会由于通商的合乎自然的发展和由于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以及由于失去在法国的領地和意大利而統一起来，假使不是此时发生了两种有决定性的事件：

(a) 德国市民阶级举行了革命，这个革命合乎时代地以宗教的形式，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但是多么糟糕呵！沒有帝国骑士和农民阶级参加，不可能进行这个革命。但所有三个等级都由于利害冲突而无法联合行动，骑士們常常是搶劫城市的强盗(請看蒙哥尔德·封·埃伯施泰恩^①)和农民的压迫者各城市也同样是压榨农民的(烏尔姆市政府与农民^②)。骑士首先起事，被市民遺棄，归于失敗；农民起事，遭到市民的直接打击。同时，这个市民神学革命遭到了这样的閹割，以至革命可以适应諸侯而諸侯把領導权拿到手。16世紀的德国革命的特殊神学理論性质。对于不屬于此世的事物有压倒一切的兴趣。从不光彩的现实中来的抽象，构成后来从莱布尼茲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的理論优势的基础。

① 在恩格斯手稿中此名字无法认清。大概是曼哥尔德·封·埃伯施泰恩，此人是烏尔利希·封·胡登的舅父，是弗兰茨·封·济金根的战友，由于他曾与帝国自由市經倫堡敌对(1519—1522)而知名。他于参加济金根反对特利尔大主教兼选帝侯之役中战死。——編者注

② 当农民們在1524年起义的时候，士瓦本城市同盟的首府烏尔姆市政府答应給“遭臣民威胁的君主們”迅速支援。——編者注

(b) 世界商道移到德国以外，德国被挤到一个孤立的角落中，于是市民的势力瓦解，宗教改革的势力也瓦解。

(c) 結局是，在誰的国家信誰的教，而事实上德国就分裂为大多数信新教的北部，大多数信天主教但两教极为混杂的西南部和完全信天主教的东南部。这里面已包藏着从1740到1870年的发展(普魯士，南北分裂，终于出现小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原因。在法国是相反的过程。胡格諾派被镇压下去(参看札記第2頁①)。

3. 德国在产业上一被注定消极和退步，就必然比在产业上积极而进步的各国更受政治局势的影响(这是一般的說法)。分为两派就把內战提上日程。列举1648年以前各次战争——內战。法国利用这个机会，与新教諸侯联盟而且出錢支援新教諸侯和德国雇佣軍。这些情况在三十年战争中登峰造极(在三十年战争中有爱尔兰人在德国参战，1693年和1806年有德国人在爱尔兰参战②)。描写战争的破坏作用。在經濟、社会、政治方面的結果：丧权于法国；瑞典和丹麦得以在德国立足；各担保国有干涉权；中央权力完全崩溃；欧洲担保德国諸侯有反对皇帝的反叛权、內战权和叛国权。

4. 1648至1789年

(a) 政治状况。德国諸侯們利用威斯特发里亚和約，爭先恐

①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未发表过的《关于德国的札記》，1789—1873年。恩格斯在此札記第2頁上談到法国在胡格諾战争期間王室权威的增漲。参看下文《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篇手稿。——編者注

② 在三十年战争期間有天主教爱尔兰人在瓦楞斯泰茵統率的皇軍中参战。1693年英王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用普魯士雇佣兵来镇压支持1688年被逐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斯图亚特)的爱尔兰起义者。英国利用1806年与德意志各国的联盟来使用普魯士雇佣兵反对为爭取自由而战的爱尔兰人。——編者注

后地将自己出卖给外国……法国（还有土耳其）利用德国的衰弱，来逐渐吞并德国一切在法国的领地并补足阿尔萨斯。法国的历史权利和条约人的喊叫“掠夺”。语言边界（参看门克^①）大约自纪元1000年以来，除佛日山左面各区而外，都没有改变。这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一个对奥地利竞争的强国勃兴和北方的帝国：普鲁士的勃兴。开始实现南北分立。普鲁士历史的批判。腓特烈二世。俄国的兴起与腓特烈二世。屈服于俄国政策之下。德国的各次战争和內战这时都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竞争的战争。

（b）经济方面。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市民阶级却从三十年战争的后果中慢慢恢复并重新爬起来。只有具备无耻的本领才可能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重新兴起。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却只有通过政治干涉，通过诸侯们的无耻行径，通过由外国付给他们的金钱，才可能获得进步。这就证明，德国在经济方面堕落到如何深沉的地步。这个时代是教长政治的源泉。1648年以后国家实际有担负各种社会职能的责任而且是为财政困难所迫而有这种责任；凡在国家没有发挥社会职能之处，就陷于停滞状态（威斯特发里亚主教区）。堕落到什么样子呵！国家的补助又是多么可怜呵！同世界贸易的关系纯粹是受害的，只有在各次大规模世界战争中作为中立国才有利可得（从北美战争和1801年以前的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德意志各邦面对强盗国家却无能为力。（幸亏法国革命消除了欧洲的这个可耻状况。）

（c）文学和语言完全衰落了；神学是乾瘪的教条；在其他学术中德国也陷于衰落，但也有一线曙光；雅可布·波麦（又有将来的哲学的先兆）、开普勒、莱布尼兹。又是从现存事物、现实事物中

^① 指门克编制的《中世与近代历史袖珍地图》。——编者注

的抽象。巴赫。

(d) 1789 年的德国状况。农业与农民状况。(a) 农奴制、鞭打、赋税。(b) 工业——纯粹是忍饥挨饿，主要是手工，但在英国已经有大工业的开端，而德国工业早在充分发展之前就已注定灭亡。(c) 商业——消极的。(d) 市民对贵族和政府的社会地位。(e) 对于发展的政治障碍——分裂。按照门克地图描述一番。关税阻碍内河航运。割据产生以国内疆界为界的自由贸易。关税多半是城市的消费税。

德国诸侯甚至在已经得到启发——如舒巴特的保护主^①和卡尔·奥古斯特——的时候，也是无法为善的，他们全都宁愿加入莱茵同盟，而不愿决一死战。1806 年的入侵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一次考验。而且这一千个诸侯中每一个都是绝对粗野而无教养的恶棍，绝不能期望他们合作，怪想法车载斗量（施路采尔）。在北美战争中的士兵买卖。然而单是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最大的罪恶。此外，在靠东部边界的北方还有普鲁士，在南方有奥地利，都贪婪地伸手要与两国邻近的地区；倘若两国只有一国存在，这些地区还可能得救，但是两国必有的竞争使任何出路都成为不可能。全是死胡同——只有从外面才能有办法，法国革命带来了办法。只有两种生命的标志：一方面是作战本领，另一方面是文学和哲学，忠实而客观的科学研究。当法国自 18 世纪起政治论文，并且是第一流的政治论文已经风行一时的时候——在德国这一切却都引人从现实逃到理想世界中去；“人”和语言的发展，1700 年左

① 恩格斯指的是一些德国诸侯（安哈尔特德意志的利奥波尔德公爵，柯堡的恩斯特腓特烈公爵等）庇护着 18 世纪的著名农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舒巴特并在他们的农庄实施舒巴特的农业建议。——编者注

右文艺还有不纯洁现象，1750年有莱辛和康德，随后不久有歌德、席勒、魏兰德、赫尔德尔、格卢克、汉德尔、莫札特。

II. 1789 至 1815 年

1. 在阿尔萨斯洛林等地的德国封建农民已半处于法国主权之下，参加了法国革命；这就提供了进行战争的借口。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时突然一致。瓦尔密^①。横队战术被密集炮火击败。福列鲁斯与热玛普^②。奥军的警备战术失败？占领莱茵河左岸。农民的欢呼和各城市的自由思想甚至不是个别暴行，不是拿破仑的苛税所能排除的。亚眠和约^③与帝国代表会议^④。主要决战^⑤。帝国解散。莱茵同盟。拿破仑扫除了小国，但可惜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向来是一个反对诸侯革命者，假使这些小诸侯不如此俯首贴耳拜倒在他面前，他就会再进一步。1806年——没有完全消灭普鲁士，这是拿破仑的一个错误。大陆封锁期间德国的经济情况。这个外侮最大时期同时就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时期，贝多芬的音乐登峰造极时期。

(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历史》
柏林狄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562—
566页译出。熊倬译，李稼年校)

- ① 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密进行法国革命军队与8月侵入法国的普鲁士反革命军队之间的决战，普军大败。——编者注
- ② 1794年6月26日法军在福列鲁斯击败反革命联军并将战事移至法国境外。1792年11月6日法军在热玛普战胜联军。——编者注
- ③ 指1802年3月拿破仑与英国締結的亚眠和约。——编者注
- ④ 1803年在拿破仑支配之下由德国较大诸侯召开了“帝国代表会议”，決議取消一大批德意志小国而把它们并入德意志大国家中。——编者注
- ⑤ 指1806年10月14日导致普鲁士崩溃的耶拿与奥尔施塔特两城近郊大战。——编者注

《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篇手稿(摘录)

在胡格諾战争时期，作为民族代表的王国已經受到很大的尊重，只有国王同外国締結的联盟和战争互助条約才被郑重接受并被輿論承认。在公众心目中，所有其他的人总是叛徒或卖国贼。这在亨利三世死后特別明显，当时亨利四世只是依仗国王称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新教在法国終被禁止，对法国并没有損失，——如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所证明的。同样，即使新教在德国被禁止，不会是德国的不幸，那却会是全世界的不幸。各拉丁語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天主教形式就会硬加在德国头上；而由于英国发展出来的形式也是半天主教半中世紀的（大学等等、学院、公学——所有这些在事实上都是新教的修道院），德国的一切新教教育制度（家庭教育，私立寄宿学校，不住校而自选校委会的大学生）就会消灭，而欧洲的知識发展就会单調不堪。法国和英国破除了成見的实质，德国則破除了成見的形式或范型。因此，一部分造成了德国每一事物沒有定形，直到如今还使德国不免有大缺点，例如众多小国制度，但就民族发展能力說来，这却有很大的好处；将来只要这种片面性一被克服，就会发生充分的效果。

再者，德国的新教乃是現今唯一值得批判的基督教形式。天主教在18世紀就已不值得任何批判而只不过是宗教辯駁的对象（那些老天主教徒是何等蠢貨！）。英国新教分成几十个教派，沒有神学上的发展，或者具有每一阶段都以一个新教派为标志的发展。只有德国人有一种神学，从而有了历史的、語言学的和哲学的批判的

对象。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虽则是绝对必要的，但如果沒有德国新教，这种批判就不可能有。只靠嘲笑和諷罵不能消灭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要靠科学，就是要通过历史解釋来打倒它，这是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做到的。

(据《德国农民战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第171—172頁譯出。熊偉譯，李稼年校)

注 釋

- 1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倫敦写的，載于《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 Th. 1—3, Stuttgart, 1841—1843)。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讀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訂《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給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訂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論》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許多札記草稿。——第17頁。

- 2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紀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連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結成的貿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壟断欧洲北部的貿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紀的后半期。——第18頁。

- 3 换租費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賦稅。

死亡稅 (Sterbefall, Todfall) 是領主根据封建權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遺產稅(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 (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稅，作为領主对自己的僕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辯护”的报酬。——第22頁。

- 4 “公捐”(«gemeiner Pfennig») 是人头稅和财产稅合并而成的一种稅。这种稅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24頁。

- 5 上任年貢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羅馬教廷繳納的一次貢賦。此項貢賦在大多數情況下等于恩賜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則向居民橫征暴斂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繳納的貢賦。——第 24 頁。
- 6 恩格斯指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議會中占居多數的德国資產階級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魯士)領導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貴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支柱,他們只用一个自由資產階級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協政策以及和他們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 26 頁。
- 7 指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1532 年由累根斯堡議會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殘酷著称。——第 29 頁。
- 8 韦尔登派是一个教派, 12 世紀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說, 創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貧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張放棄私产, 譴責天主教会积累財富的現象, 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說在瑞士西南部和薩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別流行;在这里它帶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殘余的色彩。——第 33 頁。
- 9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 12—13 世紀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 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華的仪式和教阶制度, 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貴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 他們企图剝夺教会的土地。1209 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曾組織十字軍征伐阿尔比派。經過 20 年战争和殘酷的鎮压, 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 33 頁。
- 10 1251 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謂的“牧童”起义)的領袖之一, 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 33 頁。
- 11 加里克斯地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 世紀上半期)

- 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酒庫看守人）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 34 页。
- 12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贩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 35 页。
- 13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 13 世纪到 15 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贖免罪恶。
- 罗拉德派（直譯是：“咕咕囔囔的禱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 14 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 1381 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 14 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 35 页。
- 14 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 36 页。
- 15 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 Zimmermann, Th. I, Stuttgart, 1841, S. 364—365）。——第 38 页。
- 16 M. Luther.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Wittenberg, [1520 年]。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 39 页。
- 17 奥格斯堡告白 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 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

- 物。他們宣布以領主王公來代替教皇作為教會首腦。皇帝拒絕接受奧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與皇帝所進行的戰爭於1555年以奧格斯堡宗教和平協定而告結束。根據這個協定，每個王公有權自行決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39頁。
- 18 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農民戰爭最劇烈的時候所發表的《Wyder die mörderische unnd reubischenn Rottenn der Pauren》這篇文章的題目。後面所引的話都是利用齊美爾曼書中的引文。——第41頁。
- 19 齊美爾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寫的是這個年代，但根據後來可靠的材料，托馬斯·閔采爾是生於1490年左右。——第42頁。
- 20 再洗禮派是那些要求成年時再洗禮的派別的稱呼。——第43頁。
- 21 “對諸侯講道。解釋先知達尼爾的另一區別，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馬斯·閔采爾在阿爾斯特德宮內對肯丁的被愛戴的侯爵們和薩克森的執政者們進行講解”。1524年阿爾斯特德版（《Die Fürstenpredigt. Auslegung des andern Unterschieds Danielis des Propheten, gepredigt auf dem Schloß zu Allstedt vor den tätigen, teuren Herzogen und Vorstehern zu Sachsen durch Thomas Müntzer, Diener des Worts Gottes》, Allstedt, 1524）。恩格斯引自齊美爾曼的著作。——第44頁。
- 22 恩格斯指的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施特勞斯和其他青年黑格爾派的觀點，按他們早期著作，他們在宗教問題上是個泛神論者。——第44頁。
- 23 指1524年在繆爾豪森出版的閔采爾的文章，題目是：“根據路加對福音的證明來公開駁斥不忠實世界的錯誤信仰，使可憐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drückte Entblöß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ungetreuen Welt durchs Zeugnis des Evangelions Lucae, 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ärmlichen Christenheit zur Erinnerung ihres Irrsals》）。引自齊美爾曼的著作。——第47頁。
- 24 見 Zimmermann, Th. 2, Stuttgart, 1842, S. 75.——第48頁。

- 25 M. Luther. «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urischen geyst». Wittenberg, 1524. —第 48 頁。
- 26 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 閔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轄市繆尔豪森, 1524 年 9 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豪乱又从那里被驅逐出去。閔采尔以后由繆尔豪森到了紐倫堡。——第 49 頁。
- 27 1524 年閔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 标题是: “論据充分的辯护詞和对維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聖經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輕蔑的无神論者的答复”(«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eistlose, sanft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ehrter Weise durch den Diebstah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ä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z jämmerlich besudelt hat»)。——第 49 頁。
- 28 独立派是 16 世紀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別, 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別。在 17 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独立派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 在 1648 年末取得了政权。——第 52 頁。
- 28 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話。——第 54 頁。
- 30 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轄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 1488 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們的独裁政权。該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軍隊。1534 年由于内部糾紛而告解散。——第 57 頁。
- 31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部亚东山区的匈牙利人。——第 63 頁。
- 32 指西西里島上的人民为反抗 1267 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統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 年 3 月 31 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騎士和士兵。——第 64 頁。
- 33 恩格斯指的是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釘在維登堡一个教堂門

- 上的 95 信條。信條中對出賣赦罪符和濫用天主教會的事實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信條中，體現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學說也具有了初步輪廓。——第 66 頁。
- 34 布爾勃斯加 是諷刺文學的體裁之一，流行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義的思想家中間；他們用這種文體來嘲笑宮廷詩歌華麗的風格和封建社會上層的拘泥習俗。——第 66 頁。
- 35 薔薇戰爭(1455—1485)是兩個爭奪王位的英國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間即約克派和郎卡斯特派之間的戰爭。約克人的徽章上飾有白色薔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則飾有鮮紅色薔薇。在約克派方面的有經濟比較發達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騎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則有北部諸郡的封建貴族。這次戰爭幾乎完全消滅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國建立了新的都鐸王朝，實行了專制政體。——第 68 頁。
- 36 奧地利邊區政府 是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屬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區的統治機關。——第 71 頁。
- 37 當貴族已經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時候，士瓦本聯盟的討伐軍的統帥特魯赫澤斯向 1525 年 2 月 15 日赫魯起義的農民發出的最後通牒中的一句話，引自齊美爾曼的著作。——第 72 頁。
- 36 根據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貴的”階層的代表擔任。——第 73 頁。
- 36 南方高原地區 按字面講是高原地區。在這裡是指上巴登，即與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 世紀時，這個地區只有一部分屬於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則屬於奧地利的布萊斯部或是由較小的教會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轄。——第 73 頁。
- 40 指的是 1525 年初在紐倫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冊子：“為說明激憤是否正當以及在和政權的關係方面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和不應該做些什麼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許多地區所有義憤填膺舉行起義的農民的會議的文告。它是根據上帝的聖書，在編寫和闡述時會得到南方高原地區的同僚們的完全同意”(«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Paverschaft, so in Hochtentscher Nation und viel

- anderer Ort, mit empörung und iffruhr entstanden, ob ihr empörung billicher oder unbilliger gestalt geschehn, und was sie der Oberkeit schuldig oder nicht schuldig seind, gegründet aus der heil göttlichen Geschrift, von Oberlendischen Mitbrüdern guter mahnung ausgangen und beschrie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73頁。
- 41 鳩迪加礼拜日(是从 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譯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76頁。
- 42 这个決議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談判的时候在烏尔姆的联合政权會議上通过的。在烏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記載有这个決議。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見 Zimmermann, Th. 2, Stuttgart, 1842, S. 111—112)。——第76頁。
- 43 大什一稅和小什一稅是有利于天主教會的两种不同的稅。这种稅的稅額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 $\frac{1}{10}$ 。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稅,而粮食作物則征收大什一稅。——第76頁。
- 44 維尔茨堡教會是管理維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該会主持人維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78頁。
- 45 条頓騎士团是1190年十字軍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侶騎士团。騎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許多領地,由騎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紀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魯士由騎士团进行統治。东普魯士就成了騎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騎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騎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風騎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騎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領地。——第80頁。
- 46 奧芬堡条約是1525年9月18日布萊斯都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簽訂的,条約規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負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締农民团体和“異

- 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96页。
- 47 根据 1525 年 11 月 13 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 96 页。
- 48 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穆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 98 页。
- 48 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 1848 年 2 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 99 页。
- 50 帝国抵抗——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书末注释 72：——第 99 页。
- 51 堡垒是以车轮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第 101 页。
- 52 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第 103 页。
- 53 这个文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重要关头，即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写的。1850 年 8 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说，1847 年的经济危机已

經過去，因而在經濟開始普遍繁榮的情況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個時期是不可能產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論說，在新的條件下，首先要注意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在思想和組織上鞏固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維利希和沙佩爾反對這種冷靜的分析和依據科學的結論所製定的策略。維利希、沙佩爾和他們的擁護者們用“革命的”詞句代替了對客觀現實的唯物主義的分析，企圖採用冒險主義的策略和聯合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德國舉行新的起義。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在這個基礎上所發生的分歧，早在8月和9月上半月召開的會議上就明顯地暴露出來，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會議上達到了最尖銳的程度，在這次會議上同盟發生了分裂。馬克思在会上闡述他跟維利希和沙佩爾決裂的原因時說：

“少數派用教條主義觀點代替批判觀點，用唯心主義觀點代替唯物主義觀點。少數派不是把現實的關係看成革命的動力，而卻僅僅把意志看成革命的動力。我們對工人們說：不僅為了改變現存條件，而且為了改變自己本身，培養自己進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也許不得不忍受15年，20年，50年的內戰和國際衝突，但是你們卻相反地說：‘我們必須立即奪取政權，不然我們干脆躺下睡大覺。’我們特別向德國工人指出德國無產階級不夠成熟，而你們卻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諛民族感情和德國手工業者的等級偏見，當然這種說法是比較受歡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這個詞變成聖物一樣，你們用無產階級這個詞來玩這套把戲。你們像民主派一樣，用關於革命的高談闊論代替革命的發展……。”（見卡·馬克思《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同盟中央委員會遷到科倫，委託科倫區域委員會組織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員會。投票贊成這項提案的有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亨·鮑威爾，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員；其餘4名中央委員——維利希，沙佩爾，列曼和弗倫克爾表示反對。處於少數地位的4名委員退出了會場，並辭職倫敦區部的盟員，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多數會員也站在維利希和沙佩爾分裂派的一邊，這就促使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退出這個協會。